

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复印报刊资料来源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ISSN 1001-5973

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二〇二一年第一期
(总第二九四期)



2021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1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56 (Bimonthly)

(社会科学版)

1956年创刊 (双月刊)

2021年第1期 (总第294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商志晓

副 主 任：王志民 张文新 万光侠 (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光侠 王 宏 王 玮 王 卓

王志民 毛 锐 任建兰 李松玉

李宗刚 李海鸥 李掖平 杨存昌

杨守森 时晓红 张文新 张宗斌

岳海涛 夏同水 徐继存 高峰强

高继文 商志晓 葛书林 程奇立

魏 建

主 编：李宗刚

副 主 编：时晓红

□ 专题·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百年回溯与发展进路 韩延明(1)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建构的历史考察 张立梅(10)

论苏区文艺工作中的俱乐部制度 李洪华(21)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精神性格新论

——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

..... 曹书文(29)

论《蛙》的未完成的“忏悔” 丛新强(40)

莫言文学创作中的风景书写 翟瑞青(48)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 薛 泉(56)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恩格斯的矛盾观及当代意蕴 徐国亮(67)

世界历史理论开辟的世界统一性 王清涛(79)

□ 经济学研究

以场景红利为核心提升城市品质 魏 建(92)

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与路径 董占军(101)

□ 历史学研究

被动中的抉择

——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原因探析 张礼恒(109)

□ 影视学研究

山东民俗与鲁剧创新 贺彩虹(122)

□ 传播学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现状分析(2007—2019)

——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 金晓艳(133)

跨文化传播的中外认知方式调适与对接 陈 忠(147)

MAIN CONTENTS

Centenary Retrospect and Progression of Forging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Han Yanming(1)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ang Limei(10)

On the Club System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Work in Chinese Soviet Area Li Honghua(21)

New Discussion on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Lin Zhen, Liu Shiwu and Han Changxin
——Rereading of *The Young New 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Cao Shuwen(29)

Study on the Unfinished “Confession” in *Frog* Cong Xinqiang(40)

Landscape Writing in Mo Yan’s Literary Creation Zhai Ruiqing(48)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Panlong’s Consciousness of Alliance and Literary Power Returning
to Langshu in the Ming Dynasty Xue Quan(56)

Engels’ View of Contradi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Xu Guoliang(67)

Unity of the World created by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ang Qingtao(79)

Taking Scene Dividends as the Core to Improve City Quality Wei Jian(92)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rt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 Dong Zhanjun(101)

Passive Choic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ccep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Zhang Liheng(109)

Shandong Folk Customs and Innovation of Shandong TV Series He Caihong(122)

Analysi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2007–2019)
——Based on Bibliometrics Jin Xiaoyan(133)

Accommodation and Interface of Cognitive Pattern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Chen Zhong(147)

英文校译:李玉麟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版面费。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百年回溯与发展进路*

韩延明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建党百年历程即是百年党建传承。红船精神是锻造百年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历经三次伟大飞跃,即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面向 2035 年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须从领导维度(中心点)、思想维度(基本点)、政治维度(支撑点)和组织维度(立足点)实施强力锻造。

关键词: 百年党建;锻造伟大工程;三次飞跃;四维方略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01-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1

世界变局百年交汇,巨擘共擎谋篇布局。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国新百年擘画了一幅催人奋进的璀璨图景。这个以定性为主、蕴含定量的新时代逐梦蓝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未来的远见卓识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从建党的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天斗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来的撼天动地,由我国所发生的梦幻般的伟大历史性巨变,不难预测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处于世界领先方阵的泱泱中国将会以何等的伟岸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领导,根本在党的建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率领中国人民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和核心领导力量。因此,回眸近百年来党的建设的伟大历程和深入推进面向 2035 年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具有独特而深远的意义。

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源:红船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说:“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百年党建伟大工程的始初基因与源头精神——“红船精神”。

* 收稿日期:2021-01-03

作者简介:韩延明(1958—),男,山东肥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原一级巡视员。

①《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1年1月1日。

百年前的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逻辑起点。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可以说,建党之时即是党建之始,建党之文即是党建之本,建党之船即是党建之源。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同志就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向全世界庄严宣示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定政治信念和伟大复兴决心。习近平同志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②,党的建设也由此踏上接续锻铸的百年征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④

中国共产党是在南湖游船上诞生的伟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型政党。1921年7月31日,代表当时全国58名党员和国内外8个基层党组织的一大先驱们,为躲避特务的监视与抓捕,从上海秘密转移到南湖湖心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国的光荣诞生,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郑重书写在自己的红色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华夏热土上敢为人先的伟大壮举,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宛如一位撞钟人撞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使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人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组织领导、坚固的精神支撑和坚实的责任担当,在血与火的岁月中逐步成长为中华民族的擎天柱和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给灾难深重的东方大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党的队伍也在党的建设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最初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成为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已拥有9,191.4万名党员和468.1万个基层党组织,而这一切的成就和发展,都源于南湖碧波上那艘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理想和信仰的革命“红船”。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一路走来的党建工程之基和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根脉,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基础,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船精神如同它的象征载体,体现了中共领航、依水行舟的深刻内蕴,从启航之时就劈波斩浪、扬帆远行。“红船精神”的提出,肇始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2005年6月21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红船精神”的概念、内涵、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弘扬路径,论述并完善了中国革命精神链条的历史渊源和逻辑起点,使党的发展奋斗史和精神创建史高度契合,使建党的辉煌原点和党建的伟大开篇相映成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建工程和中国红色精神谱系的丰富发展与独特贡献。他指出:“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⑤他认为“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

④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⑤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①。

百年来,“红船精神”体现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和党建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和继续成功的红色密码,也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精神支撑、道德力量和终生追求。党的一大通过的15条约700字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立了党的奋斗目标、基本政策、党员发展和组织运行原则等,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建经典文献,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基、之本、之源,更是“红船精神”在跌宕历史中的初心坚守。

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三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绝境重生、玉汝于成的苦难辉煌史,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接续锻造、守正出新的铸就践行史。从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都蕴含了组织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等基本要素,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指示和举措。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也发生了三次伟大飞跃。

(一)第一次飞跃:“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

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来。1937年9月,他发表了言辞犀利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成为从思想上建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原则;1939年10月,他在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这一党建思想的经典文献中,首次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一世界政党史上罕见的自我革命壮举豪迈地称为“伟大的工程”。^②这一伟大工程,先后经历了以组织建设、理论建设、思想作风建设、政治建设为重心的四个阶段,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此后,党的建设步入一个开放、健康、协调发展的快车道,朝着建设成“全国性、群众性、先进性的大党”的目标大步迈进。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并称为党的“三大法宝”,而党的建设居于核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等。大浪淘沙,20世纪20年代挤占在中国社会舞台上的360多个政党逐渐销声匿迹,唯有重视党建工作、敢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难以计数的腥风血雨、战火硝烟中奋然崛起。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有效解决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特殊矛盾和复杂问题,成功地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顽强斗争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擎天柱和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尽管其间也曾遭遇重大挫折和牺牲,但由坚定理想信念锻铸而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百折不挠,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由此,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和必然使命。

(二)第二次飞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提出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的思想和经验,在其创新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党建理论。他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

^①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①特别是他在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从严治党反对腐败等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为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也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性任务和指导原则。这是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大决定。要求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这不仅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政治方向,而且为实施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前进动力。

在我们党面临尖锐复杂的“四种考验”和“四个危险”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求全党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第三次飞跃:“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提出

百年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坚定的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政党,是一个为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和巨大贡献的伟大政党,是一个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勇于进行社会革命而且敢于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政党,是一个具有强大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的既有家国情怀又有世界眼光的伟大政党。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是指“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着力于先进性、现代性和革命性的三者统一。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他反复强调,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伟大工程,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确保“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既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成果,为新时代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展示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切实号召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78页。

力、远大信念力的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也向全世界昭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光明前景。

三、锻造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是历经百年栉风沐雨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擘画的新时代逐梦蓝图和决战方向。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时代制高点上,只有深入推进锻造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切实完成“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个百年的党建积淀、经验与创见,正是第二个百年的党建动力、能源和支点,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百年贯通。只有高质量锻造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才能确保我们党在世界风云激荡的变局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深入推进面向2035年锻造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强基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战略布局也要战役攻坚,既要把握关键环节也要形成贯通长链。就其方略而言,须从领导、思想、政治、组织四个维度,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领导维度: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面向2035年锻造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中心点

毛泽东曾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①党的全面领导是指在治国理政中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全覆盖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步入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的中国发展必须严格恪守的一条政治红线。百年中国共产党历经数次攸关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历史节点,总能处变不惊、破解危局,彰显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所具有的全面的治党治国治军能力和高超的领导水平。就此而言,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世所罕见的危难时刻战胜风险、迎难而上的“定海神针”和根本依靠,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坚强保证和锻造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首要前提。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是几代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多年接续奋斗、励精图治的初心使命。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1949年3月,他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②1959年12月,他在与人通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一次对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完整表述,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③据此,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希望“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④。此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0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了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①改革开放后,邓小平1979年多次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预言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明确了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

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设计者和引领者,是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制度、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等体制机制)的统领者。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党的建设工作的常态化、根本性、轴心性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和水平的实践要求。“基于此意义上可以说,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巩固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经验在制度层面的彰显。”^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开辟,拓宽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模式和人类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实质上是一种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开启和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二)思想维度: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面向2035年锻铸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点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也是党的光荣传统、政治优势和基本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具有最广泛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基础、指导方针和根本动力,“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创造性的鲜明品格,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④。必须在党的建设中真学、真思、真践、真悟,因为奋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当代中国人,不仅要成为“当代历史的同代人”,也要努力成为“当代思想的同时代人”。在锻铸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中,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是以常态化制度化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对全党进行“心灵性拷问”。初心,就是起点、本色,是党性之根、人民之本,是精神之钙、力量之源。概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民族复兴的信心和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入党为什么?入党干什么?为什么出发?出发到哪里去?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灵魂深处刻下的精神契约和一辈子人生路上的心灵拷问。只有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才能提高知行合一能力,在党建中思路清、方向明、谋在新处、干在实处,才能铭“来时路”之难、强“脚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23页。

③张迪、谭虎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理论、历史与实践维度分析》,《学术前沿》2020年第14期。

④《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2月26日。

下路”之责、逐“未来路”之梦,在中国巨轮航行的海图中找准自己的坐标和职守,对表对标,争做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的时代先锋。

二是以常态化制度化的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对全党实施“革命性锻造”。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坚定的理想信念做起。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部分党员由于理想信念不坚定、革命意志不坚强而没有经受住不同时期的严峻考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成了人民的敌人和历史的罪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灵魂和支柱。苏共在拥有 20 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在拥有 200 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在拥有近 2000 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根本原因是苏共党员最终丧失了原有的理想信念。因此,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立志修身的“扣子”,打好廉洁奉公的“底子”,扛好干事创业的“担子”,走好行稳致远的“步子”,熔铸党性之魂,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为民之基,做深入推进锻铸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先行者、建设者和实践者。

(三)政治维度:加强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践行人民至上,是面向 2035 年锻铸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支撑点

锻铸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性建设是政治建设。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①党的第一属性是政治属性,党的第一功能是政治功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同志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阐释新要求。他认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他强调指出,“要增强政治意识、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政治方向、承担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敢于奋斗、善于斗争、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更好为党和人民工作。”“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②在深入推进锻铸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中,要做到政治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政治历练和党性锻炼紧密结合,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促进党员与党组织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锻铸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明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勇于刀刃向内的一种刮骨疗伤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品格和无私胸怀,是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是大党老党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路径,是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保障。我们必须坚持自我纠错、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精神,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毒素,并以此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要抓铁有痕、从严治党,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继续扎紧具有硬度、密度和韧度的制度笼子,坚决切除特权意

^①《列宁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8 页。

^②《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持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政治执行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 年 12 月 26 日。

识、潜规则、享乐主义、官本位、官僚主义等毒瘤,“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①,切实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锻铸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旨归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指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人民”二字,是嵌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和价值指向。“人民性包括三层含义:即人民的整体利益需求、集体意志表达以及权利诉求。”^②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代以降,中国人民面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为根本。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④为了解救国家于危难和拯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舍生忘死,谱写了忠诚为民的奋斗之歌。人民至上,才是治国理政的强大根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把“为人民服务”镌刻在灵魂里,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凝心聚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四)组织维度:夯实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面向2035年锻铸新时代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立足点

2020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巩固。”^⑤目前,全国有128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3500万名农村党员。但是,我国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个别地方甚至被宗教、迷信、村霸、不法分子等所控制。因此,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和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党员队伍,推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

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必须建立客观、科学的基层党组织督导机制和评价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严格党内组织生活,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一是要运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形式对基层党组织进行督导与评价。所谓历时性,是指基层党组织在不同时间段内或不同时间点上的状态及结果,偏重于行为过程;所谓共时性,是指在同一时间段内或同一时间点上不同基层党组织的状态及行为结果,偏重于行为结果。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二是要以空间延续性理念和空间全覆盖原则对基层党组织进行督导与评价。所谓空间延续性,是指将不

①杨煌:《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光明日报》2018年7月16日。

②陈曙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学习时报》2019年3月15日。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8页。

⑤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同空间的各级各类基层党组织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种纵切面基本向度;所谓空间全覆盖,是指督导评价的触角深入到基层党组织的每一个个体和全部空间领域,是一种横断面基本向度。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道路上,要在上下互动、全员协同的基础上,将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到内部、沉到下部、覆盖底部,使党的建设成为每一位党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实现从价值的全员认同走向行动的全员自觉,最终形成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大纛猎猎,大业锵锵。百年征程创榛辟莽,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锻造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不懈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着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汙可小康”的美好憧憬变为生活现实。在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清晰谋划和扎实部署的同时,还锚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孕育新机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接续推进,相得益彰。尽管在完成目标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问题,但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所说:“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①伴随着面向2035年锻造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一个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定会以更加伟岸的雄姿阔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继续在人类的伟大实践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

Centenary Retrospect and Progression of Forging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Han Yanm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Provincial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course of the one-hundred-year party building of CPC is the centenary inheritance of party building. The Red Boat spirit is the source of the great project of forging a centenary party. The party building project has undergone three great leap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i.e. from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to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n to the “new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To further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for 2035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leadership dimension (central point), the ideology dimension (basic point), the politics dimension (support point) and the organization dimension (standpoint).

Key words: centenary party building; forging great projects; three leaps; four-dimens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王盛辉

^①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页。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 建构的历史考察^{*①}

张立梅

(临沂大学 教育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 构建学习制度是推进学习取得成效的基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对学习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开始探索学习制度的建立;抗日战争时期为保证学习运动的顺利开展,出台了系列文件,从学习组织、学习内容、经费保障、监督检查等方面初步构建了学习制度的基本框架,保障了学习运动的有效推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斗争形势,大力推进党的学习时代化,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干部准备工作。梳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学习制度的历史,对于加强和深化学习型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1)01-0010-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学习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建立健全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是推进学习取得成效的基本保障;以制度推进学习、以制度保障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学习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学习历程,并探索建立学习制度。梳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学习制度建构的历史,对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萌芽

学习制度的建构要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其成立初期各地党组织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将学习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自觉地把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制定了有关学习教育的系列文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党的创立者所学习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还比较肤浅”^②。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学习。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制定了学习宣传教育的相关规定,对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提出了相关要求。1922年5月《中国

* 收稿日期:2020-11-20

作者简介:张立梅(1972—),女,山东滨州人,临沂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建构及历史演进”(20CX SXJ16)的阶段性成果。

②王炳林等:《学习的力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指出:社会主义的青年要通过“集会讲演,或刊行出版物和小册子”等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① 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要在工人和党员中推销《工人周刊》及《劳动周报》,将《新青年》《前锋》《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材料“通俗化(Popularization)”,各地要设立社会科学的研究会。^②

随着革命的深入,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和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推进,又加上各县的党员大多是农民出身,小农思想、地方色彩比较浓厚,容易犯错误。因此,进行党内教育迫在眉睫。1924年国共正式合作,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国共合作之后,党内极少开展政治教育,很难在党报上“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党内合作”的方式也让中国共产党面临被同化的危机,党员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变得模糊。^③

基于以上问题,1924年《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提出,党内教育问题非常严重,要“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④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又指出,要发挥党支部对党员的教育作用,开办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增进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⑤ 1925年10月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明确把开办党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开办各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和区委之下的各级党校。同时在中央要设立相应的学习宣传机关,去指导和计划收集材料的工作^⑥,并提出了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如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收集整理种种材料等^⑦。1926年《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提出,中宣部应开始编译理论译著、党校的校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大纲、《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的讲授方法等。^⑧ 在党的一系列决议指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党校以加强党员学习活动,强化党内学习气氛。随着全国党校系统的逐步建立,以党校形式组织党员进行组织化学习成为一种固定形式。

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初步探索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教训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从实践中学、从革命中学、从战争中学,开始探索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5—206页。

③王炳林等:《学习的力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9—530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9—530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7—288页。

革命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有文化、懂政治和通军事的干部队伍。当时红四军中,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阶级觉悟不高,影响部队战斗力,因此亟需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指导。“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①当时政治训练方式有讲课、讲演、识字、士兵组会等多种形式。经过学习教育,提高了红军士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了解“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②。

为加强学习,井冈山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纷纷举办党员和干部训练班。其中,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了湘赣边界第一期党团训练班,学习时间近两个半月,学员达300多人。这种短期训练班灵活性好、针对性强,主要就工作中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学习。此后,毛泽东更加认识到系统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案特别强调,“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③,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教育问题是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④古田会议决议案提出了党内教育的十项内容,包括政治分析、组织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并详尽列出了党报、个别谈话、小组会、政治讨论会、联席会议等十八种进行党内学习的方法。至此,党内学习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⑤

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大批党员干部的需求,创办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正规化的干部学校势在必行。1931年4月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苏区各中央分局必须把干部培养纳入中心任务,“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学习计划中,军事训练、政治经济常识、实际工作常识各占三分之一。^⑥中共中央在1931年8月27日作出的《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苏维埃区域要经常利用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举办各种人才训练,满足苏区干部需求,并“能派送干部到苏区周围的主要城市,农村,以及白军中去工作”^⑦。8月3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指出,要“举办苏区干部学校,有系统的训练党的干部”^⑧。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强调,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要注意有系统的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在学习中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灵活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了几种学习办法,如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作政治理论报告;组织研究会;出版简明小册子,收集、编订学习参考材料等。^⑨

把政治教育作为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1933年1月1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指出:各级地方党部及红军政治部要采取各种方法,使每个党员对党的基本理论和主张有个初步认识,在政治上巩固党的组织。中央局、总政治部与省委要提供“党内教育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王炳林等:《学习的力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3-214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1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4页。

的各种材料,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内容”。^① 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又指出,在党员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是“目前非常严重迫切的任务”。中央宣委应立即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和“十二次全会”各种小册子,并刊印斯大林同志与美国工人代表团之谈话的单行本……委托中央宣委考察党内教育系统与概况,且拟定加强党内教育工作的具体建议。^②

为保障学习的深入,根据中共中央的历次指示,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学。学校明确规定了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机构等。同时制定了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以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针对性很强的学习科目;学习六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和共产国际文件;开设学术讲演、开展理论研究等活动;成立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这一系列决议和文件,规定了学习宣传教育的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以及党对学习宣传教育的领导,为此后开展全党范围内的学习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为学习制度的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建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多样,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革命遭受严重挫伤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号召。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斗争,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③。

(一)成立学习机构,组织学习实施

加强组织领导是学习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各级党部、边区政府、民众团体、各类学校也要设立相应的机关,领导学习活动的开展。要在全中国推广学习制度,“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④。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军队的各级学习制度,有组织地进行理论学习。做好干部教育的管理工作,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要设立干部教育科。^⑤

学校是开展学习运动的重要机构。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央党校,并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等30多所学校,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学习。尤其是各级党校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等作了明确规定和安排,为推进学习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为巩固与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要办理党校。其中,中央局各分局办理党校主要训练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2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12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中级干部;县委、区党委、地委办理党校主要训练区级干部;地委、县委开办的训练班主要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此外还规定了党校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学习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习的实效性。^①

(二)规定学习内容,加强教材建设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应作为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宣传培训班学习的中心内容,要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公开宣传马列主义。^②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学习的主要课程进行规定,设置了初级课程、中级课程、高级课程、时事政治课程及军事学习课程等,涉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联共党史、社会科学常识等内容。^③

把策略教育列入学习内容。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出,“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必须“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各省委、区党委、各政治部,尤其是这些环节的宣传部,须经常地计划、指导、组织并检查这一方面的工作。^④

教材供给是学习活动顺利开展的首要保障问题。张闻天在马列学院内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编译部,并指导出版“马、恩丛书”10册、《列宁选集》20卷,满足了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需要。此外,中央专门为各地编写和出版了课本提纲和参考材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结合实际编辑了适合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各级党组织为在职干部提供学习书籍等资料;在预算中列出在职干部的学习费用等等。^⑤ 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指出:中宣部应在明年出版计划中保证必要的在职干部读物及文化课本的出版,并从中央津贴延安各干部学校基金中,拨出一部分为发展在职干部教育经费之用。^⑥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要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教材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地编印或翻印。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出版机关及财政机关制定一九四二年有关教育的出版计划及经费预算,交中央批准实行”^⑦。

(三)丰富学习形式,确保学习时间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9-14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6-30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9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4页。

关于如何学习,中央规定,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学校及党的各级组织,要发挥知识分子党员在干部学习教育中的作用;党内负责同志要视情况担任教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设置各科学学习顾问,以指导和帮助学习。

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学习方法以教员指导下个人自学为主,以小组集体研究为辅。……引导帮助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阅读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党委选择教授人才要慎重,学校中配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须经常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要担任教课。要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研讨党中央及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指示,经常邀请各地负责同志做时事报告及实际工作经验介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校可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五天上课,一天党日)。^① 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制度,如小组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教育干部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② 在各种大课指导员外,添设策略教育指导员,由行政负责干部充任。

为保证学习时间,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保持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③ 10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党小组兼有学习小组的作用,规定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组会议作为学习会,或者每次小组会议设有学习时间。在自愿的条件下,党小组以外可以单独编立学习小组。^④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又指出,学习教育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特殊情况下学习时间可以伸缩;要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把“学习情况”作为鉴定干部的标准之一。^⑤

(四) 建立督促检查制度,保障学习实效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督促学习、推广经验,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检查、监督及考核制度,并开展总结评比活动。

1938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民学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讲话中提出:各机关自本月1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由上而下的检查,要在1月25日前开展总检查。中共中央在1939年5月的《关于检查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全党要建立工作检查制度。根据要求,总政治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及若干学习分会,负责各单位的学习督促与检查工作。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强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经常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以保障学习质量的提高。1940年4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对在在职干部学习进行一次大检查,并选出模范小组,总结好的学习方法,供各根据地参考。194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问题的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8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通知》指出,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目的是规范学习组织,各地要根据此条例对学习组织加以审查。^① 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又指出,总政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及中央直属党委宣传科负责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直接组织、检查、督促与领导,中央宣传部通过它们实现学习的统一领导。^② 1942年6月《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中提出,总学委及各系统的学委会,要派出巡视员,巡视和帮助下面的学习。^③

中央以及陕甘宁边区等制定了考试等制度督促学习。1941年11月4日《中央学习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指出,各组长要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并解答阅读中的疑难。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要实行“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并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的标准之一”^④。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会议通过《在职干部学习应明确规定定期考试制度,随时检查其成绩案》,建立促进和保障干部学习的长效机制,把考试作为一种刚性制度确立下来。考试的方式有日常考查、临时试验、学期考试和毕业考试四种,其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整理和综合学习内容,提高党员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为推进学习运动的有效开展,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将5月5日马克思生日定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学习经验并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予以激励。1940年6月11日,《新中华报》报道了中央宣传教育部召开学习运动总结大会的特讯,并对评选出的中央各部门“学习模范小组”进行公布。^⑤ 1942年6月5日《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指出,要“组织各机关学校的相互参观,作为推动学习的办法之一”;要“奖励那些学习得努力的、有成绩的,批评那些学习得不努力、无成绩的,安慰那些因为学习得太积极而影响健康的”。^⑥

由此可见,党的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学习制度的建构,有了从学习机构、学习内容、教材、教员,到经费、时间,再到督促、检查、总结评比这一整套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保证了学习运动迅速展开并深入持久进行下去。学习运动促进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凝聚了党的战斗力量,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夯实了思想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演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和平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既要学会在暂时和平局面下,如何进行非武装斗争、利用合法的政治斗争来解决政治问题,又必须提高警惕,继续教育人们认清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以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形势,党内一些干部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战争,理论学习虽然重要,但并不急需,只要英勇奋斗、不怕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0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9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⑤王炳林、张立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活动的组织机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3期。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9页。

牺牲,认真完成党的任务就可以了。出现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党内很多干部本身的理论水平很低。他们虽然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但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不能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些,“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①。

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46年1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规定了战时教育的内容与组织形式,如,史地课“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的历史传统,及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国语、政治课“着重培养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坚决勇敢、拥军尚武的精神”,理化、自然或卫生课“增添防空防毒,急救看护,熬硝练磺,制造火药和地雷等实用知识”,体育课“增加简单的军事训练”。为了使学生逐步树立“一切服务战争”“一切为着胜利”的思想,增加了战时教育和社会活动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6年12月19日明确指示:“各地可以公开印刷和出售”“七大通过的党章以及刘少奇关于党章的报告”。这样,就把党内理论学习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加强了党的学习的时代化。

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干部准备工作,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提出,中央直接创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系统地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每期学习时间,最短暂定一年半;主要学习中外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并开设语文课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② 1948年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的方针,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指出:各区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两级要“开办党校,或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党校”,并抽调各级各类干部到党校进行学习。^③ 为了把马列学院办好,调杨献珍任马列学院教育长,抽调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的干部任教。如调艾思奇、王学文、何其芳分别担任哲学教员、政治经济学教员、语文教员等。马列学院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主张以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为主、以学生自学为主,重视历史学习,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联系实际。

为了规范各级党校的学习,1948年9月中央专门颁发《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要求各县级及县级以上中级党校开办的学习班,“学习期间在半年以上者,在正式课本未编出以前,必须教授阅读和讨论下列书籍和文件,作为一般的临时教材。其他属于专门性质(如青年、职工、妇女、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新闻工作等)的教材由各负责部门另定之。其中党内文件,关内由中央编印,将纸型送各局,关外由东北局编印。其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由各局自己编印”^④。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干部要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的要求。^⑤ 解放军出版社用一年时间将这套书目全部出齐,为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学习提供了重要资料。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0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

五、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建构的当代启示

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建构,有利于保障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领导带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突出问题意识,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学习制度不断发展创新的基本要素。

第一,学习制度创新,领导干部带头学。“干部是连接党与群众的中间环节,是党与社会的结合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是群众的组织者和服务器,是实现党的纲领的中坚力量。”^①开展学习运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是形成良好学风、保证学习效果的关键。“高级学习组(即中心小组)同志一定要分头参加中级学习组,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②延安时期,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是其中杰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身体力行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广泛阅读各类哲学书籍,学习研读了马恩列斯的原著,阅读了西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等书籍,写读书心得体会,汲取各种哲学思想的精华,把解决党的思想认识问题作为学习研究的出发点和着重点。1943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规定,在组织上,必须建立各级学委会,最好由党委书记或常委负责。学委会是在党委领导下计划执行学习并检查督促学习的直接负责的机构,它对党委及对上级一切学习指示负有完全执行的责任。在学习的领导上,应以实事求是方式贯彻上下,不但要有思想动员组织领导,而且必须要有实际领导。即各级党委必须掌握部分同志,是自己机关及身边同志的学习,首先从这里严格学习要求,首先实施计划,创造经验,考验自己计划,改正自己计划,并不断向下级及各地介绍,从自己做起,从自己机关做起,以实际学习来推动学习,领导下级学习,这一办法为最切合实际。^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带头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是“新形势下提高执政能力、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④。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43次集体学习,内容涉及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学习形式是主讲和自学相结合,既邀请学者及相关领导主讲,也采取政治局自学;学习场所,既有固定的会场学习,也有针对性的现场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提高了全党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能力。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意识。根据学习活动的需要,紧紧围绕党的建设及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加强对学习制度的系统化建设,围绕中心任务设置学习内容、学习任务、学习方式、学习考核等,是构建学习制度的基本要求。

学习制度的演进是随着学习的深入、随着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构建和完善的。构建学习制度必须紧密联系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并随着任务的变化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出发,“围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学习讨

①赵长芬:《转型期党的社会凝聚力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4-96页。

④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09年11月16日。

论”,“在研究解决问题中增强深入学习的紧迫感”^①。延安时期开展的学习运动,是为了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高级学习组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与中国共产党20年历史结合起来,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②。为实现当时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争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总目标服务的理念,紧紧围绕解决本领恐慌,构建了包涵学习内容、学习任务、学习方式、学习考核等制度,达到了学以致用。解放战争时期,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在学习内容设计上,毛泽东号召全党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的内容。为增强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从1948年开始,中央及各中央局与分局及各省委与区党委成立并健全了政策研究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理论学习与研究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并建立了系列制度。

第三,学习制度要具有针对性。学习制度的建构,必须综合考虑党员干部的工作特点和岗位需求,确定不同的学习内容及教育的方式方法。针对学习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对不同的学习对象,要实行分级分类的指导方法,切实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延安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工作忙、没时间学等现状,中央提出了每天学习两小时制、巡回教育制、分级分类学习制等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保证了干部学习工作的有序进行。中共山东分局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环境的紧张性与多样性,制定了不同的学习制度。如在山东根据地内,比较固定的环境中要建立正规的学习制度,定期上课、组织报告,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并定期开展学习检测。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学习的组织与计划要合乎战斗环境。要善于挤时间、找机会,计划不能过长。在游击区,开展分散学习与自修。但学习制度要健全,要有领导、有检查,特别发扬干部间相互帮助的精神。在敌占区、顽固区及友军区,应特别注意秘密,除必要的党的会议外(但亦应尽量减少),应尽量利用公开与合法的机会与方式来学习,如研究科学、文化及各种技术等。尤其在敌占区,可尽量利用敌人的技术学校开展党员的技术与科学知识的学习。地县以下,没有固定机关且干部不集中的,要着重于小组学习和自修,发扬同志间互相帮助、互相教育的精神。^③

第四,设计科学合理,推进制度有序落实。制度制定必须目标明确,易于操作,要考虑能否落实和如何落实。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健全和落实常态化、多样化的学习制度,“加强日常学习、脱产学习、短期集中培训,科学安排岗前培训、业务培训、晋职培训、理论培训等,并在培训对象、培训时间上作出制度性规定,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④。延安时期,中央针对学习运动中存在的“没有功夫”“看不懂”等问题,提出用“挤”和“钻”的办法分别解决,每天挤出两个小时来学习。毛泽东提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看不懂”用“钻”的办法来解决,像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用“钻”来对付。^⑤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形式,在陕甘

①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09年11月16日。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

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9-240页。

④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09年11月16日。

⑤王炳林:《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宁边区先后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4万多名优秀的党员干部。此外,运用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对干部学习进行引导;通过音乐、舞蹈、诗歌、小说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学习活动的有效展开。中共山东分局建立了写作研究制度,每人每月保证写两篇文章,字数多少不限,为了鼓励写作,酌发奖品,定期举行座谈会,研究讨论写作技术。为鼓励推动干部学习、查找学习资料,组织学习竞赛,对测验成绩好的予以奖励。^①

习近平同志指出,理论修养在干部综合素质中居于核心地位,“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②。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能够历经艰难困苦不断创造新的辉煌的经验之一就是重视学习并构建了一系列的学习制度,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形成了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推进学习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持之以恒加强理论武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长期政治任务,是不断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的重要保证。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ang Limei

(School of Education,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system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rted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learning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its founding and the Great Revolu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 series of learning documents were issued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ing movement, with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learning system constructed preliminarily in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learning content, financial guarante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thus ensuring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the learning movement.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aling with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struggle,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rty's study, and made good preparations for cadres to seize the state power of the whole countr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oriented Party, improv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advancing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rning system; historical study

责任编辑:王盛辉

^①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论苏区文艺工作中的俱乐部制度^{*①}

李洪华

(南昌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330031)

摘要: 苏区俱乐部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借鉴吸收早期工农运动中的俱乐部工作经验,在苏区军民俱乐部运动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看,苏区俱乐部属于“干部制”半官方群团组织,主要采取主任领导下的委员会负责制,在功能特征上强调通过文化娱乐的方式教育和动员群众。党的组织领导、文艺大众化路线、因地制宜的工作策略,是苏区俱乐部制度建设及其文艺工作广泛开展的成功经验,对于后来的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新时代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苏区文艺工作;俱乐部制度;苏区俱乐部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21-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3

苏区通常是指自1927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苏维埃”,到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更名改制期间,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工农武装割据”方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区域。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群众致力于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的同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作为苏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苏区文艺工作得到了苏维埃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革命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苏区文艺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既有大量相关史料的整理,譬如汪木兰等选编的《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瑞金市委组织编撰的八卷本《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等,也有不少研究著作,譬如钟俊昆的《中央苏区文艺研究》、周平远的《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史进程》等。在已有研究中,苏区文艺的重要意义不断凸显,苏区文艺既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滥觞”^②,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苏区中央政府全面展开并领导文艺工作的最初尝试”^③,但这些观点或结论是基于如下基础之上的:一是在现代文学史框架内的苏区文艺创作研究;二是在革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苏区文艺运动研究,而缺乏在制度层面对苏区文艺工作进行深入探讨。因而,本文试图以苏区文艺工作中的俱乐部制度为对象,梳理分析其形成过程、功能特征,并进而分析其价值经验及启示。

一、苏区俱乐部的制度化形成

俱乐部(Club)最初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原本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民间社交场所,后来逐渐

* 收稿日期:2020-12-05

作者简介:李洪华(1971-),男,江西瑞昌人,南昌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苏区文艺工作的制度建构与当代价值研究”(JD18020)的阶段性成果。

② 颜敏、李伟:《苏区文艺:当代文学的滥觞》,《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③ 周平远:《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史进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

衍变成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交际、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场所。从发生学意义上讲,苏区俱乐部并非单纯的文艺机构,俱乐部制度也非单纯的文艺工作制度。在苏区各类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文献中,俱乐部被定义为“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①或“文化娱乐教育领导机构”^②。因而,在已有相关研究中,苏区俱乐部通常是被作为“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③来展开讨论的。但事实上,苏区各类俱乐部主要以戏剧、歌谣、讲演、墙报和晚会等文艺活动为工作内容,全民参与的俱乐部制度是苏区文艺工作得以广泛开展的重要基础。当然,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苏区俱乐部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渐进式发展而不断完善成熟的,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战争过程“创制”出来的,是由苏区多种社会资源、力量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俱乐部活动滥觞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从事工人运动时就学习借鉴了苏联苏维埃文化建设的经验,组建了俱乐部。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影响很快遍及全国各地。在此之后,济南津浦大厂工人夜校俱乐部、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俱乐部相继成立。1922年6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汇报了上述俱乐部的组织情况。^④此外,大革命时期,由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也开始尝试组织俱乐部开展乡村文化活动,譬如1927年7月《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的《武昌农村文化之曙光》,便详细介绍了武昌县农协组织农民识字和组建俱乐部的经验。^⑤这些革命初期的工农俱乐部以文化娱乐形式团结员工农群众,既是培养工农党员和革命骨干的学校,也是党的活动机关。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城市武装暴动的失败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俱乐部运动开始转向农村,以军人和农民为主体。苏区俱乐部最初是在军队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和文化宣传工作,各连队在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还设立了军人活动室。^⑥1928年前后,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开始设立俱乐部,同时在士兵委员会内设有娱乐科。^⑦这些军人活动室、俱乐部或娱乐科都是中央苏区军人俱乐部的前身。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在强调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时,明确提出:红军部队中,“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办起来”,要“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⑧古田会议后,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逐步建立起“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的红军俱乐部体系,“有计划的切实的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帮助地方上群众俱乐部的工作”。^⑨譬如,1931年初成立的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赵品三、

①《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

②《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

③邱泉:《群众教育阵地:中央苏区俱乐部研究》,《苏区研究》2017年第1期。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2-53页。

⑤闽浙赣湘鄂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闽浙赣湘鄂苏区革命文化纪事·人物录》,南昌:闽浙赣湘鄂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1997年,第8页。

⑥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老年文艺家协会编:《江西文艺史料》1988年第2辑。

⑦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⑧《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7-29页。

⑨《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20页。

危拱之等先后任俱乐部主任,内设文化、体育、戏剧等管理委员会,每周都举行晚会和演出话剧,除全校学员参加外,四周的群众也都来参加,原本主要负责以文化娱乐的“形象教育方式辅导学员”的俱乐部,很快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①再如,1932年初成立的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胡底、宋发明先后为主任,主要任务是“领导红军中的文娱工作”,“最多的工作还是组织晚会”,演出新剧。1933年总政俱乐部被撤销后,又成立了总直(直属大队)俱乐部。^②据石联星回忆,当年瑞金红校俱乐部“每到礼拜六室内成为我们的舞台”,“乡亲们每次都来参加晚会”,“到处都站满了人”,“嘹亮的歌声与欢笑声显得非常热闹”,“这里洋溢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愉快”。^③可见,各类红军俱乐部广泛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

1929年至1934年间,随着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苏区工农群众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以中央苏区为例,1929年12月,共青团闽西特委提出,“每乡要设一俱乐部,一区要有比较大规模的俱乐部”^④。1930年2月,永定县工农代表大会提出,“每乡苏须办一俱乐部”^⑤。1931年6月,寻乌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各级政府应尽可能的设立游艺场或俱乐部”^⑥。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要求省、县、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在各个圩场上及村庄上建立俱乐部”^⑦。据《红色中华》报告,1932年11月,苏区江西省有俱乐部712个。^⑧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668人”,而这还只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⑨1934年9月,《红色中华》刊载的《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说:“到今年3月为止,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有了一千九百七十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余人。”^⑩以上虽只是中央苏区的情况,但其他苏区也可见一斑。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具有“法规”性质的《俱乐部纲要》,提出“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是每一级政府机关或一个大的工厂企业、每一地方的工会、合作社之内的组织”,要求“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并对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经费来源等进行了明确规定。^⑪

美国新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通常是在发展变迁中逐步形成的,既有连续性变迁,也有非连续性变迁。由于大量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⑫。在特定的革命战争时期,从早期俱乐部的滥觞,到“古田会议”广泛建立俱乐部的政治动

①《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23-324页。

②《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49-351页。

③《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

④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330页。

⑤《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⑥《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⑦《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⑧《江西省苏区报告》(二),《红色中华》1932年11月28日。

⑨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页。

⑩《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⑪《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

⑫[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员,再到《俱乐部纲要》的颁布实施,苏区俱乐部制度经历了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的渐进式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明确的创制意图、健全的组织机构、详实的操作规程和显著的实践成效的俱乐部体系及其比较规范的制度化建设。

二、苏区俱乐部制度的功能特征

通常而言,制度是一套人为设计的规则和规范体系,规定了特定组织或机构成员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秩序性和工具性特征,它常常根据自身的价值系统寻求力量的整合,排斥异己因素的进入。文艺制度一方面以各种方式规范和引导文艺的生产实践和传播接受,另一方面对那些与文艺制度规范不相符合的因素加以排斥或整合。苏区俱乐部初期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群众工作的指向性不够明确,活动多偏向文化娱乐。针对上述情况,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特委通过布告、训令、法规等形式对其进行逐步引导和规范。以俱乐部发展迅速的闽西苏区为例,1930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布告,批评闽西的俱乐部“都是单独娱乐场所,很少有革命意义”,没有“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的功效”,要求俱乐部必须健全地建立起来,不能单纯地娱乐,要以群众为对象,将俱乐部建成群众的革命教育机关。^①对此,中共闽西特委也在“宣传问题草案”中指出,本区俱乐部存在“单纯的胡琴锣鼓之错误”,未能发挥俱乐部“在娱乐中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政治认识”的作用。^②上述问题也很快引起了苏维埃中央的高度重视,1933—1934年间,中央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俱乐部纲要》《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等“苏维埃教育法规”,从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等各个方面对苏区俱乐部进行整顿和规范。

通常而言,组织制度可分为“科层制”与“干部制”两种类型。科层制(bureaucracy)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制度模式,它是“一种以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体现的是权力分配的制度化、等级化和非人格化”^③。干部制组织(Cadre Organization)是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罗斯坦(Bo Rothstein)在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政府组织制度时提出的概念,它“不是以正式的规则、经济激励为基础的,而是以干部对组织特定的政策学说的承诺为基础。干部不是中立的,而是对组织的政策学说有很强的忠诚感甚至热情。干部关键的技能是理解、皈依组织的政策学说,并在各种环境中执行它”^④。根据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苏区俱乐部大致属于“干部制”组织,而非“科层制”组织,俱乐部干部的工作热情不以经济激励为基础,而肇基于革命信仰和苏维埃政策学说。虽然苏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成员有大致的职权分工,但俱乐部并非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权力体系,而是一个半官方的群团组织,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较为自由灵活。俱乐部内部管理一般采取主任领导下的委员会负责制,即管理委员会是领导俱乐部的组织,设主任一人,委员二至四人,管理委员会下设运动、游艺、集会、出版、展览等五种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本乡或该管机关党的

①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②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

③唐小平:《浅析科层制组织设计的集权、分权与授权》,《中共珠海市委党校 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Bo Rothstein, The Chinese Paradox of High Growth and Low Quality of Government: The Cadre Organization Meets Max Weber, Governance, Oct, 2015, Vol. 28 Issue 4, pp.533-548.

支部推荐”,委员则由“本乡村或该管机关俱乐部会员选举”产生。^①在苏区机构序列中,各俱乐部直接由该地苏维埃教育委员会下属的社会教育科管理^②,并接受各级党委宣传部的领导^③,同时还遵循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系列内上级指导下级的管理方式^④。红军俱乐部与地方大致相同,实行主任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制度,通常设主任一人,由政治机关委任,管理委员由各单位列宁室干事会主任兼任,列宁室干事会及其主任由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在连政治指导员、师俱乐部领导下展开工作。^⑤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明确的创制意图和功能定位。在特殊的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一切工作和制度建设都紧紧围绕“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⑥而展开,俱乐部制度更是如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明确提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创办红军俱乐部的意义就是“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⑦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俱乐部纲要》在界定苏区俱乐部的功能性时更是开宗明义:“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学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所以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⑧

苏区时期,俱乐部的文艺工作是被纳入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宣传体系中展开的。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所颁布的“俱乐部纲要”的规范和引导下,俱乐部的一切工作都“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反对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的战争”。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苏区俱乐部主要组织开展五个方面的工作:运动(包括体操、拳术、田径赛等)、游戏(包括戏剧、歌舞、音乐等)、集会(包括演讲会、讨论会、晚会等)、出版(包括墙报、刊物、传单等)、展览(包括革命纪念品、教育用品、特殊生产产品等),其中墙报和戏剧工作尤为突出。墙报被认为是“群众直接斗争的工具”,是“俱乐部主要的刊物”,既“应当反映一般的政治问题”,也“要包含艺术作品”;戏剧“不但要一般的宣传红军战争革命,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⑨。不难发现,虽然苏区俱乐部通常被认为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机关,但它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是以戏剧、歌舞、音乐、墙报、演讲、晚会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文艺活动,它所突出的功能特征是通过文化娱乐的方式达到教育和动员群众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俱乐部制度是具有苏区特色的革命文艺工作制度。

三、苏区俱乐部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苏区时期,在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尽管各方面条件非常艰难,但文艺工作仍然取得了令人

①《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②《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80页。

③《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④《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6、97页。

⑤《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20、121页。

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⑦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24、25页。

⑧《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

⑨《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4、99、100、106页。

瞩目的成就,这与俱乐部运动的广泛开展及其制度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因此,总结苏区俱乐部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是苏区俱乐部制度及其文艺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苏区俱乐部的早期发展多处于自发为状态,俱乐部组织不健全、不普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形式化和娱乐化的倾向。有些地方俱乐部“虽已老早提倡开办了,在事实上则等于零,不过是一个挂名招牌罢了”^①，“大多数地方的俱乐部,虽有些工作,但只是演戏”,“有些地方开晚会,只做老戏、打花鼓、唱京调、跳舞,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新剧和歌曲很少表演”^②。针对上述情况,各级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调查走访,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是“各地党团力量缺少对俱乐部工作的指导”,于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并对俱乐部的文艺演出提前进行审查,规定“新剧本须经区以上之政府审查方得表演”^③。在管理体制上,各俱乐部在由该地苏维埃教育委员会下属的社会教育科管理的同时,还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党的组织领导。1933年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宣传部提出整顿和加强乡村俱乐部工作,“组织管理委员会”,“加紧督促文化部对俱乐部的工作领导”^④。1933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明确提出:“各级党的宣传部(或科)须对俱乐部列宁室工作予以讨论,并经常检查其工作。”^⑤1934年4月,中央教育部颁布的《俱乐部纲要》明文规定,俱乐部采取主任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本乡或该管机关党的支部推荐”^⑥。由于党对俱乐部工作及时采取了引导和规范,后期俱乐部工作得到健康蓬勃发展,并成为苏区革命文艺事业的坚强阵地,充分体现了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组织领导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全面推行文艺大众化路线是苏区俱乐部制度建设及其文艺工作广泛开展的坚实基础。丁玲曾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说,苏区文艺工作“显示了独特的明快的作风”,苏区文艺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爱”,它们像“这初初的蔓生野花”,“实实在在是生长在大众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途”。^⑦文艺大众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艺发展的方向,20世纪30年代初更是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和苏区革命文艺实践中得到大力提倡。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⑧,并成立了大众工作委员会,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然而,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和缺乏党的正确组织领导,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大多体现在理论口号上,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实质性成效。正如鲁迅当时所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⑨真正广泛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是苏区革命文艺实践,这充分体现在俱乐部的制度建设及其文艺工作中。《俱乐部纲要》明确规定,俱乐部是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俱乐部的管理委员会由部员大会选举产生,俱乐部的工作计

①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印刷,1995年,第95页。

②《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③《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7、33页。

④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⑤《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8页。

⑥《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7页。

⑦《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91-293页。

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1931年11月15日。

⑨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划“须向部员群众定期报告”。^① 俱乐部的墙报、戏剧、游艺、歌舞、讲演等各种文艺活动都围绕着联系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来展开,深受群众欢迎,取得了显著成效。譬如,墙报的“文艺栏”,包括山歌、童谣、小调、歌曲、活报、革命故事、谜语等,“登载这一栏,主要的是能代表下层群众的生活情绪”。^② 戏剧及一切表演,“内容必须具体化,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群众的生活的材料”。^③ 歌舞晚会,不单单是俱乐部工作人员的演出活动,而且常常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和苏区军政领导参加表演。^④ 如前所述,随着苏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俱乐部的文艺大众化工作不断深入,群众加入俱乐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俱乐部文艺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文艺大众化路线在苏区俱乐部制度建设中的成功实践。

广泛实施因地制宜的文艺工作策略是苏区俱乐部制度建设及其文艺工作广泛开展的又一宝贵经验。苏区时期,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俱乐部的制度建设及其文艺活动的开展面临各种困难。对此,苏区政府努力采取因地制宜、多方协作的策略积极推动俱乐部建设,广泛开展文艺活动。为了解决经费紧张和物资短缺的困难,俱乐部经费主要采取民间募集和政府津贴相结合的策略,“设法到各处募捐,如没法时,由苏维埃酌量供给”。^⑤ 针对俱乐部的场地、布置和设施问题,主要采取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和购置扩充的办法予以解决。在选址上,由于俱乐部的主要功能是动员和教育群众,因而俱乐部的地点要求设在群众集中的地方,“要适中而热闹”,“有圩市的乡村最好在圩市上,没有圩市的乡村也要在人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决不可设到静僻的地方去,使群众不愿意来”^⑥;在房屋方面,由于经费紧张,俱乐部通常就地取材,利用“祠堂或没收土豪的房屋”作为各种文艺活动的场地,“其中设有能容纳二三百人至少也能容一百人的大厅用来做群众大会的会场,此外还要有书报社、展览室,乃至乒乓室、弈棋室”^⑦;在室内布置方面,按照简洁明亮、适当有序的原则自力更生。“俱乐部内如果太黑了,光线不足,一定要用纸糊起来,使来的人觉到一种美观而又光亮”,“壁上要贴上标语、壁报、政治简报,以及各种宣传品”,“俱乐部内要多放各种报纸和浅白的革命书籍、宣传品等”,“各种东西要安置得非常适当而有序,决不可拉杂堆,使人讨厌”;在乐器上,采取征集和购置两种方式,一方面征集登记“私人所有乐器”,另一方面“设法随时购置扩充”^⑧。当然,苏区俱乐部在文艺工作上的因地制宜还有很多,尤其是充分利用山歌、小调、地方戏、民间舞等各种地方文艺形式表达革命进步思想,取得了动员和教育群众的显著成效。总之,即便是在条件十分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俱乐部的制度建设及其文艺活动由于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正确策略,仍然广泛而有效地开展起来,为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工作积累了许多丰富成功的经验。

显然,苏区俱乐部制度及其文艺工作经验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文艺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不断加强。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文艺事业繁

①《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4、105页。

②《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③《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

④《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

⑤《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⑥《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⑦《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⑧《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8、19页。

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

荣发展的根本保证”^①，“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②。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努力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不断推进新时代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大力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On the Club System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Work in Chinese Soviet Area

Li Honghua

(Research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 The club system in Chinese Soviet Area during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is the club work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ained in its early Worker-Peasant Movement and is graduall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lub movement in the Soviet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ode, the club in the Soviet Area belongs to the semi-official group organization of the “cadre system”, which mainly adopts the committee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irector, and emphasizes the educ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through 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 terms of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he popular l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work strategy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r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ub system in the Soviet Area and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art work, which are of grea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later liberated area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ve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literary and art work in the Soviet Area; club system; clubs in the Soviet Area

责任编辑:孙昕光

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13页。

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精神性格新论

——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①

曹书文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对王蒙笔下的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三个人物性格的不同内蕴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却相对忽视了其精神性格中无形的“血缘”联系。林震面对现实大胆干预的激情有着刘世吾青年时代的性格侧影,刘世吾精神性格上的成熟与敏锐是林震性格未来的发展趋向,韩常新对林震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的指点迷津和批评帮助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在对厂长王清泉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或过于激进或趋于保守或等待时机的个性特点。人物之间思想性格上的复杂关系是小说矛盾、惶惑叙事情感生成的主要诱因。对党的不同类型工作者思想性格多重关系的探究,有助于引发人们对“十七年”文学复杂性内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代际文化;官僚主义;政治智慧;叙事情感;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29-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4

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要艺术贡献在于作者以自己丰富的从政经验和艺术才华塑造了不同类型革命者的典型形象。长期以来,学界较多地聚焦于他们各自思想性格的深入挖掘,相对而言,对刘世吾、林震、韩常新三个艺术形象思想性格间相互关系的探究则远远不够。其实,这三个看似对立的人物身上,存在着思想性格上有形和无形的“血缘”关系。林震面对现实积极干预的激情有着刘世吾青年时代的性格侧影,刘世吾精神性格上的成熟与敏锐是林震未来性格的发展趋向;在事关组织与人事问题的认识上,他们可以进行思想情感的深度交流,都欣赏对方主要的思想性格。相对于林震与刘世吾思想性格之间的“血缘”关系,林震与自己的直接领导韩常新之间的联系则显得更为复杂,尽管林震对老练的韩常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经验颇有微词,但韩常新对青年人林震从幼稚走向成熟过程中具体工作上的指点迷津、思想上的批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在对麻袋厂厂长的处理方式上,他们三个人都存在着或过于激进或趋于保守或等待时机的问题,都应对这一事件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党的工作者,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精神性格上的异同,既与其所置身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不同的代际文化和自身的工作经历有关,又根植于相似的民族文化土壤。

林震与副部长刘世吾之间的不同,既表现为下级与上级的等级差别,又有不同生理年龄所呈现出的代际文化差异。青年人的青春朝气、浪漫激情、不满现状、幼稚冲动与中年人身上的那种

* 收稿日期:2020-10-06

作者简介:曹书文(1964—),男,河南封丘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七年’文学评论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文学批评精神建构研究”(18BZW121)的阶段性成果。

理性、客观、成熟、沉稳构成两种不同的性格景观。林震初次走进区委组织部时那种抑制不住的内心激动、对党组织的神圣憧憬、对新的岗位建功立业的渴望、浑身洋溢的青春激情都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林震的紧张、迫切与刘世吾的“热情而得体”、从容老练形成鲜明的对照。林震说话时的不自然、不知如何表达的朴拙与刘世吾作为领导的自然随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到麻袋厂开展工作,林震非常虔诚地准备调研提纲,在路上飞快地骑车,唯恐迟到耽搁。他对工作的积极执着与基层领导的随便应付、无精打采、牢骚满腹形成巨大的反差。工作的挫折既使林震感到失落,同时“也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是激励”。为解决自己在基层单位遇到的问题,他“迫不及待”在午休时间找韩常新汇报情况,“杂乱地叙述”在基层的见闻,不管别人是否疲倦、情绪如何,他心里只想着革命工作。林震大胆批评没有按党章做事的行为,与同事争执时不讲情面、慷慨激昂。作为有经验的领导,刘世吾一方面肯定林震作为年轻人的热情,一方面尖锐指出他的那种对生活理想化想像的“虚妄”：“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做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林震听后“像被打中了似的颤了一下。”^①刘世吾对林震作为年轻人弱点的批评之所以能击中对方的要害,主要源自于刘世吾年轻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年轻人的幼稚与冲动。因此,他对林震生理、心理的了解是感同身受的,批评起来自然较有针对性,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同。

如果说林震在生活、工作中留给人的印象是幼稚的话,那么,刘世吾表现出来的则是成熟和老练。“他的缺点很难让人察觉,他‘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作为组织部的领导,处理干部很有人情味,给王清泉处分以后,他的心‘很沉重’,觉得‘党的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他思路清晰,也平易近人……但是让年轻人林震感受压抑却又说不出来的正是这种似乎无可挑剔的‘出色’与‘成熟’。”^②正像小说所述,“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③。与林震的幼稚不成熟相比,刘世吾的老练也是经过诸多坎坷磨炼的结晶,是一步步在与现实问题斗争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是总结失败教训后逐步寻找到处理问题规律的积淀。“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彩,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像。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④青年人对平庸现实的反叛与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向往在林震身上有着程度不同的体现,他刚到新单位不久就萌生了人生的感悟:“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⑤因此,他才有不满现状、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冲动,希望以自己的热情、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他的追求往往因不切合实际而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比如,他勇敢披露麻袋厂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和鼓励,反而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与年轻女性赵慧文的初恋刚刚开始,便因领导的提醒而受挫。他所渴望经历的“功勋”“创造”“冒险”“爱情”一个也没有

①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②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54页。

③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

④[捷]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

⑤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05页。

圆满,他的生命史上仍然是一张白纸,唯一的收获是天天面对生活的复杂性。

中年人的冷静、世故与青年人的躁动不安相映成趣。林震随身携带着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走进组织部,希望自己能按照书中主人公“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但他并非娜斯嘉,较之娜斯嘉的美好和圆满,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林震更缺少经验,遭遇到更多的人生困惑和烦恼。比如小说中本该对有关问题承担责任的领导不仅刻意回避,而且慷慨激昂地总结麻袋厂工作的教训,仿佛这些错误与自己毫无关系。^①此时,林震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情不自禁地打断领导的话:“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他没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②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原本应受到鼓励肯定的林震,结果反倒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青年人特有的激情与青春期的冲动使林震不能容忍某些领导对生活的麻木、缺乏热情,他的青春气质使他注定难以成为英雄人物。正如作者当年所说:“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③

如果说幼稚与成熟主要体现为生命气质、精神心理不同的话,那么,林震与刘世吾在生活工作上既呈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又表现为双方思想性格中的某种契合。在对党组织工作的认识上,他们显示出更多的一致性。刘世吾对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职能的认识与林震对党组织工作的神圣责任感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小说从两人都喜欢阅读苏联小说这一点上昭示出他们之间共同的文学爱好,刘世吾告诉林震:“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④我们透过刘世吾与林震之间的坦诚对话,不难发现他们都向往一种单纯而又透明的生活,不同的是刘世吾较之赵慧文、林震更富有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刘世吾一方面批评林震那种“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的理想化的生活态度,一方面又认为林震作为干部“比韩常新强”,对他在常委会上批评自己的意见表示接受,对其敢于坚持自己立场的精神给予肯定。与之相应的是,林震对刘世吾的“就那么回事”的处事态度、“条件成熟论”的工作作风“抱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但他们之间有很深入思想和情感交流。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⑤。他们彼此之间一定程度的认同彰显了理想与现实、历史与现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

林震与刘世吾精神性格上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体现为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对组织部存在问题认识上的沟通交流,对各自优点的相互欣赏;另一方面在对麻袋厂厂长王清泉有关问题的处理上,都表现出相对简单化的个性特点。如果说林震对生活理想化的态度将原本属于批评教育

①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②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③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王蒙在相关文章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表述有所差异。

④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⑤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的问题诉诸行政处理的话,那么刘世吾对生活麻木冷漠的态度延缓了问题的及时解决而任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事件。尽管他们都意识到了王清泉身上的问题所在,但因性格热情主动造成的对问题的过度干预与因性格沉稳成熟造成的等待时机都无助于事态的良性发展,二者均应对王清泉问题承担责任。但长期以来在有关王清泉的问题上,学界大多把责任归咎于刘世吾的官僚主义,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年轻人林震与刘世吾的反对者魏鹤鸣的主观过失。重新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王清泉官僚主义问题的成因既有当事人自身缺点的原因,又有其下级魏鹤鸣的报复动机与林震对魏鹤鸣行为支持的原因。

在王清泉的问题上,作为麻袋厂的支部委员与生产科长,魏鹤鸣是一个关键性人物。有关王清泉的情况,大多由他介绍、因他而起。这里既有领导角色、工作方式不同造成的误解,又有作为下级因对领导不满将客观事实主观夸大、借助群众与组织的力量进行报复的不良动机因素。而林震作为一名年轻干部,对原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进行过度干预,将基层单位领导之间的私人纠葛上升为一种政治问题,借此实现自己成为“娜斯嘉”英雄的梦想。林震这一行为无疑火上浇油。

魏鹤鸣是麻袋厂支部委员,分管党员发展工作,但他对这项工作缺少应有的热情与责任。当林震向他询问相关问题时,他说话的腔调是粗声粗气,“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心不在焉,“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①。在组织部干部面前尚且如此,平时工作上的表现由此可略见一斑。作为单位的生产科长,他并没有兢兢业业做好领导交付的工作,却对厂长因为质量问题给予的批评怀恨在心。对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不反思自己作为生产科长的管理责任,反而厉声质问厂长的问题,丝毫不尊重领导的权威,“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②。作为生产科长,他根本没把厂长放在眼里,自然厂长提高产品质量的要求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即使是厂长有好的管理理念,遇到这样的下属不予配合且从中作梗,要顺利开展工作几乎不敢设想,更不可奢望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魏鹤鸣对本职工作没有热情,而一旦涉及自己的反对者王清泉,便情绪激动、不加节制地向林震倾诉起来。魏鹤鸣对厂长因质量问题的批评不但不接受,反而千方百计地对厂长进行攻击。刘世吾与韩常新对组织部的许多问题看法不同,但唯独对魏鹤鸣的评价较为一致。韩常新认为“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见人就告厂长的状”^③。刘世吾对魏鹤鸣的看法是,“魏鹤鸣是个直性子,他一来就和王清泉吵得面红耳赤”^④。因此,这样一位对工作不思进取、只想着如何打击报复的人,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客观性就不能不打一定的折扣了。

王清泉在作品中显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干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听从组织安排潜入国民党军队做情报工作,为此不自觉地沾染上了国民党军人的一些不良习气。做了厂长后,由于过于重视质量问题,多次严厉批评下属与工人,因而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魏鹤鸣不止一次写告状信,且以工厂部分群众的身份向党报反映,从而使问题逐步升级。本来王清泉的问题由来已久,组织部也曾了解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但由于年轻干部林震的介入和支持,魏鹤鸣便召集对厂长有意见的工人召开座谈会,将部分群众的意见整理起来,从而使得问题趋于复杂。应该说,在对王清泉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刘世吾的意见相对客观。他告诉林震,王清泉是对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

①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

②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

③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

④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4页。

的人,他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事实。但是,林震支持魏鹤鸣开座谈会,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魏鹤鸣本人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由他来召集对王清泉有意见的人开会,其客观性难以保证。刘世吾的提醒并未引起林震的重视,林震私下鼓励基层给党报写信反映问题。而党报所依据的,仍然是对王清泉有意见的个别人的看法。在这里,没有当事者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辩解和说明,谁又能保证党报反映的问题的真实性呢?况且类似王清泉这样有问题的干部不止一个,本来可以通过批评教育解决的问题却采取了行政撤职手段加以解决,这对王清泉显然是不公平的。林震的工作热情值得肯定,但这种工作热情背后不排除急功近利的成分。按照刘世吾的人生经验,“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①。作为过来人的刘世吾敏锐地看出了林震在王清泉问题上的失误之处。

王清泉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尽管在林震的支持及党报的干预下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林震是反官僚主义者,而刘世吾是官僚主义的典型。作为一名年轻的党的工作者,林震的热情、责任感是值得肯定的,遇到困难敢于斗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是难能可贵的。问题在于,林震搞不清楚,“对坏事绝不容忍”是正确的,还是刘世吾式的“条件成熟论”更正确。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林震借助组织部干部的身份支持了与王清泉有矛盾的魏鹤鸣执意报复的行为。尽管王清泉被撤职处理了,但不管是麻袋厂还是魏鹤鸣的现状都难以根本改变。王清泉本身有问题,但并非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王清泉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所导致的矛盾扩大化;鉴于林震作为青年人的工作热情和想做“娜斯嘉”式英雄的初衷,因而,王清泉无形中成了林震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在对待王清泉的问题上,刘世吾与林震有着不同程度的失误。前者没有及时对王清泉进行思想教育,后者则因过于热情而借助党报的力量将一般问题进行特殊处理,借此实现其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失误不能看作是二元对立的是非之争。一个是过于强调理想,一个是考虑客观现实;一个是过度干预,一个是等待时机。虽然,他们的初衷相同,但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能把林震视为激进的反官僚主义者,也不能把刘世吾看作官僚主义典型。

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问世以来,学界对青年人林震与其直接领导韩常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忽略。不少研究者认为,刘世吾与韩常新虽同为官僚主义者,但“韩常新是更加‘组织化’了的刘世吾”^②。整个小说明显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情节冲突,一边是林震,另一边是韩常新与刘世吾。作家刘绍棠、从维熙也认为,王蒙笔下的韩常新与刘世吾“这两个人物是如此可信,如此有说服力”^③。应该说,学界大多是将这两个所谓的官僚主义者相提并论的,且对韩常新给予了较多的否定性评价,极力表明刘世吾与韩常新之间思想性格上的不同,凸显林震与韩常新的思想对立。这极易造成人们阅读上的困惑,似乎韩常新与刘世吾是截然分明的两个思想阵营。其实,他们的思想立场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林震与两个领导思想性格之间的冲突、矛盾,更多的体现于组织部内部工作作风的不同,也就是基于不同生活经验和对同一事物认识上的差别,而非思想观念之间的对立或人格上的优劣高下。学者陈晓明在谈到这篇小

①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②夏义生:《王蒙小说流变与当代政治文化》,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

③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常新则有着自觉的党性原则。

从林震的个人成长历程来看,作为林震的直接领导,韩常新对于青年人的成长进步尽到了应有的帮助指导之责。从林震初次进企业调研党建工作提纲的撰写,到调研回来的问题反馈,韩常新主动带林震进行调研并亲自指导工作简况的书写,韩常新对初学者林震做到了知无不言。他及时提醒林震不要有急躁情绪,耐心地教育林震如何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灵活使用调研的数字与案例、如何注重工作细节。林震对组织部的印象是最初连自己也分辨不清好坏。这里有他自身对区委会组织生活“不怎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的不理解,有他对党组织生活神圣的想象与实际组织生活本身之间的反差,自然也不排除其对韩常新作事风格情感上的排斥。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因未经组织同意支持基层支部开座谈会而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会后,他反思道:“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内的事情做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①。林震对自己因冲动而“越轨”干预厂长王清泉问题导致错误行为的反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初韩常新对他提醒与教诲的必要性。最初,林震曾迫不及待地向韩常新汇报过王清泉的问题,韩常新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告诉林震:“王清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提醒林震在对具体情况没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不要介入此事,“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林震,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讲究工作策略与轻重缓急。可以说,在林震由最初对组织部工作一无所知到逐步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工作者的过程中,不管林震对韩常新认识上有无偏差,但韩常新对于年轻人的成长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具体的工作方式来看,林震由个人奋斗式的孤独作战到在实践中受到批评后的真正反思,最后终于明白了组织工作单靠个人奋斗、“按照娜斯嘉的方式生活”是行不通的道理。经过几个月的挫折与磨练,林震也逐渐地认识到与韩常新们认识水平、工作能力之间的差距。出于对党的工作负责的本意,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青年人林震,迫不及待地想改变组织部工作落后的局面。但作为一名刚从事组织工作的新同志,他的想法与建议较之韩常新来说呈现出了幼稚和不成熟。韩常新针对具体问题对林震的建议与提醒,确实是一个基层领导对年轻同志的肺腑之言,而非消极的应付之举。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一直盼望着自己的行动获得‘上级’的支持,始终希望得到在‘上级’面前表达意见的机会”^②。不管是鼓动魏鹤鸣遇挫时向上级反映问题,还是建议女同事赵慧文将自己的工作想法给上级谈谈,还是主张将材料投给党报的作法,都昭示出他对上级领导的尊重与期待。在小说的结尾,林震“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③,预示着年轻的林震已融入组织部的集体,并且逐步走向“成熟”。作为林震的直接上级,韩常新对有关麻袋厂王清泉问题的所有做法都是在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才付诸行动的。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党的工作者,在开展工作之前,必须得到上级领导的准许而不允许个人擅自做主。在这方面,他们最后都达成了共识。

从具体的工作成效来看,作者既否定了刘世吾与韩常新的拖延和等待时机的“条件成熟论”,也未赞成林震激情大胆地自下而上的干预。最终,王清泉官僚主义问题的处理仍然是年轻

①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2、317页。

②曹清华:《权力的表达、运作与想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它“逆流小说”》,《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③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32页。

的党的工作者与富有政治经验智慧的上级之间共同协作的结果。这些经验和教训成为林震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宝贵馈赠。在王蒙笔下,“单独行动的林震一到麻袋厂便碰了钉子,而秉承‘条件成熟论’的刘世吾,在没有得到林震、魏鹤鸣等人的勇于冲击的条件下,也是拿王清泉没有办法。而惩治王清泉的成功,恰恰是‘成年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冲击‘协作’的结果,正如小说结尾所定格的,‘他的敲扣领导同志的房门,也标志着孤军作战阶段的结束’”^①。由此可见,作者对年轻的林震与老练的党的工作者都是有条件的认同。刘世吾语重心长地告诉林震,“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②。尽管刘世吾对韩常新不大读小说表现出少有的嘲讽,但充满诗意与理想的心态显然有违组织工作的要求。在这一点上,韩常新显然更符合组织工作的素质要求。韩常新到麻袋厂调研后,很快写出了让林震吃惊的“年报”。韩常新们的缺点与成绩交织在一起,这让林震感到困惑。但林震对韩常新与刘世吾在处理王清泉问题上负有责任的看法,则有一定的道理。林震从严冬到初夏在组织部的成长历程表明,他作为年轻干部的激情与大胆、韩常新和刘世吾身上所富有的成熟与老练都是区委组织部工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双方,而是组织工作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源头活水,他们对组织问题的争执,只不过是工作中对同一件事不同看法的正常表现。

四

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思想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和作者的叙事情感密切相关。不管是林震对组织部存在问题的大胆干预,还是刘世吾、韩常新对明知问题存在而等待时机的“条件成熟论”,都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并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尝试加以解决。因此,两种行为在文本中并不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立场,至多是对同一问题不同的情感态度或者是互补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作者并未在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之间表现出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而更多流露出的是矛盾和惶惑。正是由于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精神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才造成了作者在文本中呈现的两种矛盾而又互有联系的叙事声音的存在。

尽管学界对王蒙 20 世纪 50 年代的小说主题界定为“青春加革命”,其基本特征是“以革命政治时代为大背景,以历史进取精神、革命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为主旋律,以‘青春’作为主体形式或意向,具有强烈的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颂歌特点和浪漫主义抒情色调”^③,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审美意蕴上较之同时期的创作显得更为复杂。这部作品并非明确地表现出或歌颂或批判的鲜明指向,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个年轻作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混沌而困惑的思考与感悟。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林震、赵慧文与刘世吾、韩常新的纠葛是被好几个因素组成的:其中有最初走向生活的青年人的不尽切合实际的、不无可爱的幻想。有青年人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娜斯嘉的影响,有青年的幼稚性、片面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幼稚性、片面性的珍视和保卫,有小资产阶级的洁癖、自命清高与脱离集体,有不健康的多愁善感;有作了一些领导工作的同志的成熟、老练,有在这种老练掩护下的冷漠、衰退,有新的市侩主义,有把可以避免的缺点说成不可避免的苟且松懈,也有对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甚至不是缺点)的神经质的慨叹……多

①徐刚、徐勇:《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历史语境中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论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③曹书文:《新时期小说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么复杂的生活!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波流’”^①。很显然,作家的创作初衷是表现“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对生活复杂性的艺术感悟”^②。从小说发表之后所引起的争议,到若干年后其作为50年代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恰恰说明文本主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共同指向的是现实社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小说表现主题的多义与作家叙事情感的复杂是相辅相成的。在作品中,存在着至少两种不同的叙事立场,这两种叙事情感的相互交织构成文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从相对单纯的学校走向事务繁杂的区委组织部,怀揣着对工作的诗意思象,于是才出现“新来”者与固有空间环境的不和谐。因此,作为青年人在对现实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与批评的同时,自然就构成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与现实本身的矛盾。作家并未把青年人林震塑造成“娜斯嘉”式的英雄,而是既写出他的青春激情,对现实矛盾问题的忧患和批判,也描写他幼稚与不成熟的想法,自己因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慷慨陈辞以及受到严厉批评的自我反思。作者一方面对青年人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单纯正直的工作热情表示欣赏、肯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怀疑与困惑。作为年轻人的林震,不仅对自己的新环境说不清楚是好是坏,而且对现实问题“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的认知,一旦与刘世吾交流、与韩常新碰撞之后,“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更加惶惑了”。在受到党小组的批评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过一场反思:“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幼稚,再加上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③。在一定程度上,他对自己的怀疑,意味着对刘世吾、韩常新生活方式、工作经验的认同。当林震在生活中遭遇了挫折,他提醒自己按苏联小说中主人公“娜斯嘉的方式生活”,并不自觉地发出了生活“真难啊!”的人生感叹。而“娜斯嘉”的方式即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于与现实的脱节受到了刘世吾的批评,而受挫后林震对此的反思意味着年轻的林震已从理想走向现实、由幼稚逐步走向成熟,作者至少在情感态度上是认可的。

如果说作者对林震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在肯定中有所怀疑的话,那么,对刘世吾、韩常新的态度也并非只是怀疑,而是怀疑中有肯定。就像林震面对刘世吾一样,作者一样存在着无法做出价值判断的惶惑。个中原因在于刘世吾、韩常新性格本身的复杂性与作者情感的矛盾性。王蒙无意把刘世吾、韩常新塑造成官僚主义者形象,他认为刘世吾也有许多正确的地方。刘世吾正确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正如笔者在《新时期小说专题研究》中所说:“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了作者对官僚主义较早的觉悟,在这一点上他与林震并无两样,不同的是,他在党内工作时间较长,对党内生活中不正常现象司空见惯,他那句‘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表现出他对革命工作松散状态的习惯性疲劳,同时又未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圆滑和无力回天的悲哀。他对革命工作那种提不起劲头的精神状态,既是他革命意志衰退的征兆;又是对党内不正常现象的消极抵抗。”^④作者对浮在生活表层的韩常新的思想性格是不认同的,但对他的党性原则、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与业绩,还是借年轻人林震与赵慧文之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肯定和欣赏。与林震单纯幼稚不同的是刘世吾、韩常新的成熟与复杂。作为一个刚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王蒙当时并没有更多的从政经验,对组织部的问题并没有看得很透,所以才有对林震、刘世吾、韩常新情感上的惶惑。一方面,他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有敏锐的直觉,同时也意识到过于清晰的表达可能有违艺术含蓄模糊的审美要

①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②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③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短篇小说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5、317页。

④曹书文:《新时期小说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求;另一方面,他尚未成熟到能够对刘世吾、韩常新的问题作出准确把握和深入分析的地步,或者他潜意识里感觉到明确判断表达多少会冒些政治风险。于是便有了主人公林震式的惶惑、刘世吾与韩常新形象塑造上的多样性。正是由于年轻作家王蒙缺少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经历与经验,对组织部的诸多问题没有琢磨透彻,所以才将自己对组织部领导刘世吾、韩常新复杂的精神世界、对年轻人林震、赵慧文面对刘世吾与韩常新时的矛盾态度、青年文化与中年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全部诉诸字里行间,由此形成了小说的叙事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作为经典作品的审美基础。

通过以上对林震、刘世吾、韩常新三人看似思想个性差异明显,实则存在精神性格“血缘”联系的分析,不难看出“十七年”文学人物之间同质化倾向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内蕴。尽管不少学者对“十七年”时期作家笔下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同质化倾向进行了深入阐释,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回避每一个人物形象不同内蕴的存在。即使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卡里斯马”^①式的英雄人物,作家创造英雄人物时依然难以超越特定时代的环境制约,但由于创作主体受到各自不同的童年经验、生活阅历、性别身份、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呈现出相对复杂的思想性格,这些正面英雄人物不只是与引导其成长的精神之父有思想性格的不同,与抚养其长大成人的血缘父母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即使是在其思想成长过程中扮演反对者角色的落后或保守人物,他们之间有时也会因生活环境与文化语境的关联而对其思维方式和精神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承认英雄人物身上主要思想性格之外的精神内涵,至少表明置身于一体化文学格局中的当代作家在激情燃烧的时代叙事上呈现出相似的情感基调,但他们对融入其丰富情感的现实生活的文学想象却难以做到整齐划一,“即就对农村生活的反映来说,有昂扬地歌颂当时轰轰烈烈的合作化,但也有作家用十分冷静的眼光从生活的琐碎片段中以优美、隽永的笔调去描绘农村千年传统积习的顽固性以及在今天生活中褪去之不易……即使同样描写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创业史》、《山乡巨变》那样正面去反映运动过程的作品”^②,尤其是“那些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以及在今天看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极端政治化的作品,而是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生活丰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政治和文学(人)的复杂关系的作品”^③。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多重联系、作家文化性格与审美情感的个性差异等是“十七年”文学复杂内蕴生成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的事实本身昭示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尽管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在某些研究领域也陷入了困境。从整体来看,无论是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细读基础上的“症候式”分析、对影响当时作家生活与创作的丰富史料的甄别整理、对影响“十七年”文学生产的中外多重关系的圆形透视,还是阐释者当下语境中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等,这些都为“十七年”文学复杂性研究的空间拓展与深度挖掘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①“卡里斯马”指“在社会各行业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质”。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20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②陈美兰、汪树东:《历史理解与历史发现——陈美兰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③李蓉:《论“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文艺争鸣》2013年第5期。

**New Discussion on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Lin Zhen,
Liu Shiwu and Han Changxin**

——Rereading of *The Young New 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Cao Shuw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xiang Henan, 45300)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academic circles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of Lin Zhen, Liu Shiwu and Han Changxin in Wang Meng's works, but relatively ignored the invisible “blood relationship” in their spiritual character. Lin Zhen's passion for bold intervention in the face of reality has the character profile of Liu Shiwu in his youth, and the maturity and acuity of Liu Shiwu's spiritual character is Lin Zhen'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on Lin Zhen's way to growth and maturity, Han Changxin's guidance, criticism and help is a fact. The reactions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are either too radical or conservative or just abiding their time when confronting the handling of the matter of Wang Qingquan, the factory directo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haracters is the main inducement for the novel contradic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confusion emotion of narration. This paper, which explores the multipl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Party workers, would be helpful to arouse people's further thinking on the complexity connotation of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e; bureaucracy; political wisdom; narrative emotion; Wang Meng; *The Young New 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孙秋英

论《蛙》的未完成的“忏悔”^{*①}

丛新强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蛙》中的姑姑创造并供奉泥塑娃娃的行为,属于“认罪”之后的“自我”赎罪方式,是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具有“忏悔”精神的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提供忏悔契机的收信者杉谷义人和作为“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蝌蚪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意识;但在后续的代孕事件中发生的“共同犯罪”的层面上,又显示出“罪恶”的再生和“忏悔”的未完成性。

关键词:《蛙》;忏悔;无罪之罪;共同犯罪;莫言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1)01-0040-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5

从1985年的中篇小说《爆炸》到2009年的长篇小说《蛙》,莫言对计划生育题材的思考和写作经历了并不短暂的时期。虽然在《爆炸》中已经出现作为妇科医生及手术负责人的“姑姑”,也出现了回乡动员妻子执行计划生育的当事者“我”,但其主导精神仍然是一种“爆炸”式的感觉和情绪。这也是莫言在那个特殊的中国文学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色。其中,计划生育事件至多是展开叙事的一个虚化的背景。而在《蛙》中,计划生育事件已经走上前台,成为所要反映的对象本身;其主旨在于“写人”,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和返乡的“我”也就成为所要表现的主体。

—

《蛙》以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结构故事和人物,与写作内容相得益彰。小说所讲述的正是计划生育中的“中国故事”,所表现的正是计划生育中的“中国人”。“中国故事”以其独特性不一定融入“世界”,而“中国人”必将凭借其普遍价值而融入“人类”。莫言在这部作品中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独特的女性形象——姑姑,这是一个处于历史语境与伦理叙事裹挟中的悲剧式人物。本是接生过无数新生命的妇产科医生,而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历史叙事中,却成为不断限制甚至扼杀新生命的“计生主任”。相应地,姑姑也就从一个让人有口皆碑的“活菩萨”转换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活阎王”^②。

在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姑姑为什么能够义无反顾、残酷无情,甚至大义灭亲、不惜流血,哪怕面对一连串的生命死亡也毫不动摇?其实,除了对于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坚决贯彻外,从

* 收稿日期:2020-07-20

作者简介:丛新强(1974—),男,山东临朐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活研究”(20BZW144)、山东大学文学院科研项目“鲁迅对于莫言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② 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姑姑的革命出身、蒙冤受屈、血书明志、平反回归、感恩戴德、践行血书这样的生命历程中也可以找到端倪。姑姑说:“我告诉你们,姑姑尽管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①这里,显然是对此前“血书”的再次重复和强调。而且,计划生育事件中的当事人如蝌蚪的妻子王仁美等也都体会到这一点。

对于姑姑来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当年的“血书”也就成为一纸空话和谎言,也就很可能再次发生革命出身受怀疑、蒙冤受屈被迫害的经历,这是姑姑内心深处最为恐惧的情形。所以,连蝌蚪的父亲都无法理解姑姑所表现出来的职业行为。“责任心强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②

总是神圣地迎接新生命、也疯狂地限制并剥夺新生命的姑姑,在退休来临之际,本应期待生活趋于平静,期待安度晚年,却意外地发生新的精神危机。在宣布退休的夜晚,醉酒后的姑姑独自回家,偶然间陷入“蛙声一片”的包围中,切身体会到痛彻肺腑的恐惧与战栗。惊恐万分的姑姑,几乎赤身裸体地相遇制作“月光娃娃”的郝大手。冥冥之中,姑姑走向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

姑姑的人生的确复杂。一方面如其所总结的,“五十年来,姑姑没吃过几顿热乎饭,没睡过几个囫囵觉,两手血,一头汗,半身屎,半身尿,你们以为当个乡村妇科医生容易吗”;另一方面也如其自觉意识到的那样,“姑姑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就是这同一双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人间,也将数千名婴儿送进地狱。姑姑将自己沉浸在“有功”还是“有罪”的分辨中不能自拔。每当失眠的时候,姑姑就恐惧地认为“是报应的时辰到了”,“到了他们跟我算总账的时候了”;每当失眠的时候,姑姑就回顾自己的一生:“按说我这辈子也没做什么恶事……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到底算不算“恶事”,到底是不是“罪人”,成为姑姑能否继续活下去的心结。所以,蝌蚪说:“姑姑,那些事算不算‘恶事’,现在还很难定论,即便是定论为‘恶事’,也不能由您来承担责任。姑姑,您不要自责,不要内疚,您是功臣,不是罪人。”^③人活着总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姑姑遇到郝大手,也就找到了活下去的方式。所以,蝌蚪在信中希望杉谷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愚昧”认知,尤其应该理解姑姑们的心理选择。“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就像您熟知的鲁迅小说《祝福》中那个捐门槛的祥林嫂,清醒的人,不要点破她的虚妄,给她一点希望,让她能够解脱,让她夜里不做噩梦,让她能够像个无罪感的人一样活下去。”^④

研究者往往一般性地认为姑姑具有忏悔意识,并从忏悔意识的层面去理解姑姑焚香供奉泥娃娃的行为。但仔细追究,姑姑的心理和行为选择其实一直属于“有罪”和“无罪”的范围。即便最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并不必然就同步具有或者导向忏悔意识。因为真正的忏悔文学“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不认罪的问题”,“而是人的隐蔽的心理过程的充分展开与描写”。^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蛙》并没有充分展开姑姑的隐蔽的心理过程,它展示的仍然是一个认不认罪的问题。自始至终,姑姑并没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本身产生理性的质疑,至多有某些情绪或牢骚,而且无比坚信自己的工作对于中国发展乃至人类进步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虽然导致意想不到的甚至不应有的非人道的负面结果,但姑姑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任何反思性的心理,哪怕是在事后也没有。尤其对于自己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同寻常的意志,

①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②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③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7、323、338页。

④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

⑤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导言”第19页。

也基本归因于党的号召,归因于对党的忠诚。即便一般群众都感觉到她已经不是人而是神、妖、魔,甚至认为她是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嫉妒心理和不平衡心态,姑姑也丝毫没有对自己行为的内在动机有过任何的思考和反省。相反,她一再强调的是自己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①既然如此,为什么退休后的姑姑开始畏惧“青蛙”,开始恐惧“地狱”?又为什么开始寻求并走向所谓的“唯心主义”?显然,姑姑的内在心理动机及其转换相当复杂,但又特别遗憾地缺乏基本的表现和揭示。

二

姑姑的思维和行为其实一直停留在“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外在层面,看似无比正当、大义凛然,实际上缺乏内省、南辕北辙,因而终究是以模糊价值判断来寻求心理安慰。

在执行张拳妻子耿秀莲的工作中,因为耿秀莲之死而受到视察计划生育工作的省领导的过问调查,姑姑的反应异常激烈:“我们出力、卖命,挨骂、挨打,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发生一点事故,领导不但不为我们撑腰,反而站在那些刁民泼妇一边!你们寒了我们的!……张拳一棍打破了我的头,算不算犯法?我们跳到河里救她,我为她献血500CC,算不算仁至义尽?”^②在姑姑眼里,孕妇的死亡也就属于“一点事故”,对方属于“刁民泼妇”,而受害者却是自己。而且通过自己献血,已经“仁至义尽”,还清血债。姑姑从来没有想到,对方却是鲜活的生命消逝。在执行蝌蚪妻子王仁美的任务中,面对王仁美在手术中的死亡,姑姑说:“怪我责任心不强……我听候上级处理。”^③而公社书记则表示,姑姑“没有错”,“这是个偶然事件,是你女儿的特殊体质决定的”。^④那么,谁又有错呢?难道是死者的错误导致自己成为死者?结果,姑姑被王仁美的母亲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用剪刀捅伤大腿。这时候,姑姑的反应是:“王家嫂子,我为你女儿抽了600CC,现在,你又捅了我一剪子,咱们血债用血还清了。……我要感谢你呢,你这一剪刀,让我放下了包袱,坚定了信念。”^⑤还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但是二者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况且,姑姑用血能抵偿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吗?在执行陈鼻妻子王胆的任务中,面对王胆的死亡,姑姑若有所思,并且和小狮子一起救活婴儿陈眉。等到日后陈鼻讨要孩子并且指责“你们欠着我一条命”的时候,始终信奉姑姑的小狮子的回答也肯定符合姑姑的意思:“王胆那情况,根本就不应该怀孕,你只顾自己传宗接代,不管王胆的死活!王胆死在你的手里!”^⑥甚至,姑姑直接定性陈鼻“你犯了遗弃人口罪”,反倒使得陈鼻“认错,认罪”。^⑦

我们并不否认姑姑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和牺牲精神及其表达的真实情形,也并不否认耿秀莲之死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因素、王仁美之死有特殊体质的原因、王胆之死更有身体缺陷的实情,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她们都并非第一次生育。所以无论如何解释,三位孕妇的死亡都与姑姑的行为脱不了干系。那种无所顾忌的围追堵截和各方施压所带来的当事人的胆战心惊

①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

②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③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④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⑤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⑥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⑦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和无处安身,至少也是危及生命的重要原因。但在姑姑那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层面的对于造成意外结果的良心发现,看不到任何程度的对于她们之死的自责表示,反而一再地强调对方自身的因素使然,更谈不上所谓内在灵魂的自我挣扎和潜在对话。假如姑姑没有遭遇“蛙声一片”的包围,没有感受到“蛙声一片”的恐惧,那么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罪感”,也就不会寻找什么解脱。所以,姑姑创造、供奉泥娃娃的行为主要还是属于意识到自我“有罪”之后而进行“自我”赎罪的方式之一,而且这种方式也更多地表现为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如果说姑姑通过割腕而实施的第一次自杀让人刻骨铭心,也让获救后的姑姑锤炼了此后的坚强意志,那么姑姑通过上吊而实施的第二次“自杀”,则明显属于象征性的“行为艺术”,不能不说正好与话剧舞台的表演性相类似:既是真实的动作,又是虚假的心理;既表露自己的态度,又掩盖自己的内心;既得到了他人认可的满足和安慰,又实现了自我解脱的诉求和愿望。获救后的姑姑也就可以自然而然甚至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了,不仅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忏悔”,甚至连“赎罪”也已经终结。

我们毫不否认而且高度评价姑姑的绝对忠诚、为国奉献和自我牺牲,但也不能拔高乃至神化姑姑的精神境界和灵魂向度。其实,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一点:“尽管我已经在某些方面尽量地‘为长者讳’了,但还是将许多令她伤心的事情披露出来。”而且,“怕万一发表之后,会惹姑姑生气”。蝌蚪当面说姑姑不是“罪人”,是“好人”;说姑姑的手“不但是干净的,而且是神圣的”;说耿秀莲的死、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都不能怨您!绝对不能”。但是,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蝌蚪又明确表示“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不过是自我安慰”。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所谓的“赎罪”不过是虚妄,而又绝对不能点破。而且,蝌蚪进一步发出追问:“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①这已经不再是针对姑姑而言,而是针对自己发难了。真正的“忏悔意识”,是“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意识”。“它不是把罪归于‘替罪羊’,而是反思共同的人性弱点和共同责任。这也不是追究‘谁是凶手’,而是从良知上感受到自身是在一个人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里,一切苦难与悲剧都与我相互关联,在这种甚深的感知中领悟到灵魂的不安,听到灵魂的呼唤。”^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忏悔意识”的反倒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作为计划生育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甚至还包括未出场的收信者和故事倾听者杉谷义人。

三

《蛙》通过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讲述姑姑的故事,也同步把自己的故事带入其中,既可以充分圆融地作为姑姑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完全独立地构成不可替代的自我表达。相对于姑姑生存状态的外在行为表现,蝌蚪内在心路历程的自我揭示更为明显。

蝌蚪,也就是“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自始至终受到姑姑的无私关爱。“我”和王仁美的婚姻,姑姑竭力支持。在女儿出生之后,姑姑特别叮嘱“我”和妻子要更加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得知妻子计划外怀孕并被举报到所在部队后,“我”陷入无法选择的重重矛盾。

面对母亲的忧伤劝说,“我”也表示愿意接受,“但谁能保证就是个男孩呢”?当母亲说即便再生个女孩也是依靠的时候,“我”说:“部队有纪律,要是生了二胎,我就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回家种地。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才离开庄户地,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把一切都抛弃,这值得

^①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79、338-339、281、281-282页。

^②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导言”第19页。

吗?”母亲的回答是:“党籍、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有人有世界,没有后人,即便你当的官再大,大到毛主席老大你老二,又有什么意思?”^①

面对妻子王仁美的以死相威胁和不要党员、不当干部、回家种地的劝告,“我”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涉及到我们单位的荣誉”^②。

面对袁颡对“我”未来的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恭维之辞,“我”心里感到莫名其妙的欣慰。“是啊,假如真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③

母亲、妻子乃至袁颡的态度,不能不对“我”产生影响。所以,“我”沮丧地乞求姑姑开一面:“党籍我不要了,职务我也不要了……”没想到,姑姑断然拒绝:“你太没出息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难道你要给我们破例?”^④

显而易见,蝌蚪的矛盾心态暴露无遗:想生又不敢生。“想生”当然是出于个人考虑,“不敢生”更是出于个人的后顾之忧和功名利禄的算计。甚至随着王仁美和母亲的相继离世,本来打算转业的“我”,听说得到杨主任的赏识,可以提前晋职,随即又开始动摇。既承认自己是“名利之徒”,“有攀龙附凤的想法”,也总是能找到借口自我原谅。“所以,当姑姑又来找我谈话时,我的态度就变了。所以,当姑姑提出要我与小狮子结婚,我虽然依然拿着王肝痴恋小狮子十几年说事,但心里的防堤,已经开始崩溃。”又是在姑姑的撮合之下,蝌蚪和小狮子走到一起。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时候,“我”想到王仁美,但随即又想到:“人生一世,许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逆水撑船不如顺水推舟,……我已经害了一个女人,不能再害第二个了。”^⑤其中包含着内疚,更包含着借口甚至冠冕堂皇的理由。无耻至极的是,“我”竟然还把小狮子和王仁美作比较。蝌蚪错了吗?似乎没有,并且自然而然,也是人性的共同特点。这里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蝌蚪的心理过程,也为其忏悔意识的发生提供了前提。

在“我”和小狮子去袁颡的牛蛙养殖场途中,遇到叫卖泥娃娃的王肝,不仅相逢泯恩仇,而且选中的泥娃娃竟然神似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陈眉。后来,被火灾毁容的陈眉恰恰成为他们的代孕者,其实在此已经埋下伏笔。当小狮子抚养的陈眉被陈鼻抱走之后,小狮子的母性大发,所以姑姑说:“姑姑这辈子,已经定了局了,而你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去吧,工作是次要的,先生个孩子出来,抱回来给我看……”姑姑仿佛也变了,而此时,所谓的计划生育形势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只有那些既无钱又胆小的公职人员不敢生”。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势异化为罚款的依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流行。袁颡的公司名义上是所谓的牛蛙养殖场,实际上却是市场潜力无限的“代孕中心”。当生育的愿望彻底无法实现的时候,小狮子也把希望寄托在“代孕”上。“而这个替我孕子的毁容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她的子宫里,正在孕育着我的婴儿。”^⑥这样的既成事实,一度让“我”无法接受,甚至产生沉重的犯罪感。连曾经追随姑姑严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小狮子,也完全转向另一方面:“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你着想。你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是绝户。我没能为你生儿子,是我的遗憾。我为了弥补遗

①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3-114页。

②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③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

④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⑤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4、159页。

⑥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1、228、231页。

憾,找人为你代孕,为你生儿子,继承你的血统,延续你的家族。你不感激我,反而打我,你太让我伤心啦……”^①毫无疑问,“我”担心的仍然是相继而来的现实困难(如何落户)、面子问题(如何见人)、伦理纠结(如何称呼陈鼻以及是否属于乱伦)和个人名誉(如何面对组织)等。而这一切,都随着李手的不容辩驳的解释得到逐步消解。“只要有钱,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事”;“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在关心你的事”;“你跟陈眉毫无血缘关系,乱的哪门子伦”;“组织没那么多闲心管你这事。你以为你是谁”;“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一个携带着自己基因的生命诞生,他的诞生,是你的生命的延续”。及至经历后续的被辱骂、被追打、被误解之后,“我”在婴儿广告牌前“顿悟人生”,仿佛听到最神圣的召唤,仿佛受到庄严的灵魂洗礼,刹那间激发出对于生命的无限热爱。“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给我的赤子!”而且,“我”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羞耻,并且开始理解妻子类似着魔的行为。事到如今,蝌蚪的心理变化尽管已经相当复杂,但基本上还是生存在“罪与赎罪”的层面,需要的仍然是某种自我安慰。“我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断送了王仁美的命,也断送了她腹中孩子的命。……我安慰自己,这个孩子其实就是那个孩子,他晚来了二十多年,但毕竟是来了。”^②其实,任何形式的自我安慰都无法达成救赎的目标。“自我”救赎的实现,还需要外来“他者”的介入,这个“他者”形象就是通信者杉谷义人。

不管蝌蚪是不是对应着莫言本人,也不管杉谷义人是不是对应着大江健三郎,尽管他们在现实层面确实有着诸多相似性,但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事件的缺席者杉谷义人对事件的当事者蝌蚪到底产生了怎样的生命影响。作为侵华日军的后人,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却以一己之力代表过世的父亲向“我们”谢罪,使“我们”深受感动。“您父亲驻守平度城时,您才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您父亲在平度城犯下的罪行,没有理由让您承担,但是您承担了,您勇敢地把父辈的罪恶扛在自己的肩上,并愿意以自己的努力来赎父辈的罪,您的这种担当精神虽然让我们感到心疼,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当今这个世界最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③这种精神就是“忏悔精神”,是对于“无罪之罪”的自觉确认和自我承担。显然,如果没有杉谷义人的替父赎罪精神,也就激发不出蝌蚪的内在“忏悔”意识,蝌蚪也就依然停留在内心愧疚与自我安慰的层面,因为其自身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杉谷义人提醒我们,受害者也同样可能有罪,更不用说受害者有时候同时还是迫害者。蝌蚪就是如此。“王仁美和她腹中孩子——当然也是我的孩子——之死,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鳃,甚至推给王仁美自己——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④“忏悔”不再是去寻找“替罪羊”,而是领悟到灵魂的不安,接受内心的拷问,自觉彻底地归咎于“自我”;“忏悔”并不必然地导向救赎,所谓的“自我安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四

作为一名剧作家,蝌蚪期望通过写作的方式而实现救赎,“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感非但

①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8页。

②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9-251、265、268页。

③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7-78页。

④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①。为什么“更加沉重”?因为自己参与其中的新的“罪恶”已经再度发生。如果说计划生育事件中的“罪恶”还是“无罪之罪”的话,那么“代孕”事件中的“罪恶”已经是“共同犯罪”了。围绕着“代孕”而发生的对陈鼻父女尤其是陈眉的“共同犯罪”中,“忏悔”又在哪里呢?

九幕话剧《蛙》既是姑姑故事的有机组成和自然延伸,更是集中展示人性“共同犯罪”的舞台。为了彻底消除代孕者陈眉与新生儿之间的情感纽带,“我们”合谋并精心制造孩子一出生就死亡的假象。不仅抢走孩子,而且顺便扣掉应有的劳务费。殊不知,本来打算代孕结束、偿还父债后就自杀的陈眉,却因为与胎儿的情感而重新燃起生的希望。于是就有了陈眉的不断登场和不停地呼唤,但却被定性为精神病患者而陷入无边的苦难。就是这样的“惊天大案”,在现代中国社会体系中也得不到任何的渠道平反,甚至发展到“伪造现场”和“杀人灭口”的边缘。本来属于出淤泥而不染的善良女子,却陷入人性之恶而施加的无底深渊。第六幕的“金娃满月盛宴”,众人煞有介事地表演,假戏真做,而完全无视受害者的痛苦挣扎。满月喜宴变成真相的曝光,变成一场建立在罪恶基础上的虚伪的盛宴。苦难深重、靠着堂吉诃德式的假想生活麻醉自己才能活下去的陈鼻,深刻地反思自己:“爹害了你们,爹是罪人,爹是废人,爹是一半死了一半活着的死活人……”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好人”,是“老天报应我”。但是,对于女儿陈眉的不幸命运,他却发出震撼人心的追问:“女儿为你代孕(怒指蝌蚪),赚钱为我偿还住院费,可是你们,你们这些老同学,你们这些伯伯、叔叔,你们这些剧作家,你们这些大老板,竟然编造谎言,说她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你们赖掉了她四万元代孕费……头上三尺有青天啊!老天爷,您怎么就不睁开眼睛看看呢?看看这些横行霸道的坏人……”这是喜庆背后的人性之恶,与袁鳃的说法正好形成相反的对照:“咱们都是品德高尚的正派人,怎么能干那种丑事呢?”^②平心而论,这些人也的确不是“横行霸道的坏人”,但人人都是“罪人”,包括姑姑和小狮子,更包括蝌蚪。

“许多当年做梦也梦不到的事物出现了,许多当年严肃得掉脑袋的事情变成了笑谈。”^③历史已经变迁,然而苦难如影随形。陈眉从诞生时的悲惨弃儿到青春年华时的悲苦命运,人生之艰难、悲凉与辛酸,无疑也是历史掩盖的永恒侧面。怀抱孩子的陈眉被追赶着而进入民国戏的拍摄现场,她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判案。殊不知,剧组走的是市场路线,导演和演员已经不是古代的包青天,只要赞助金钱,一切都是糊涂案件。剧中的“高梦九”,依然是“昏官”。这一幕类似于前面的“金娃满月盛宴”,文中文,戏中戏,众人假戏真做,继续作恶。传统的道德,人性的罪恶,最终都抵不过流通的金钱。电视戏剧片的拍摄转换成现实生活的舞台,人人都是演员,人人都是“罪人”。与此前如出一辙,蝌蚪同样参与其中。

当姑姑刹那间意识到“演戏归演戏,现实归现实……我们亏对了陈眉”的时候,蝌蚪的意识竟然回归到姑姑当初的表现:“姑姑,您千万不要为这事内疚。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给了她双倍的补偿,还送她进医院治疗,包括陈鼻,我们也没亏待他。”^④又是那么熟悉的“仁至义尽”,姑姑那里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到蝌蚪这里,转换成万能的金钱。九幕话剧的最后,又是一个所谓的“大团圆”,所谓的“母子”终于相安,所谓的“乳汁”犹如喷泉。殊不知,这样的团圆却又掩盖了多么可怕的悲惨。一切的大团圆,无不伴随着受害者的无言,受害者的声音再也不会出现。

①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②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4、325、326、321页。

③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④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6-337页。

“蝌蚪口口声声地说要忏悔、要赎罪,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辩解,进行开脱。为了要由陈眉代孕所生的孩子,他从生物学、法律、伦理等方面为自己寻找借口,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无理。”^①不知蝌蚪是否想过,如果没有“我们”的“共同犯罪”在先,陈眉的病又从何而来,又谈何“送她进医院治疗”?《蛙》提供“忏悔”的契机,又把“忏悔”推向远方,终究属于未完成的“忏悔”,而“罪恶”的再生乃至循环则预示着“忏悔”的任重而道远。

在关于《蛙》的众多研究中,莫言女儿管笑笑的文章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实际行动上的无所作为,文字意义上的虚伪忏悔,蝌蚪的赎罪可谓苍白乏力。但罪孽不曾因为我们刻意的淡忘和漠视而消失,它悖论般地因赎罪衍生出新的黑暗幽灵。”^②从蝌蚪的角度来说,《蛙》的叙述比较充分地呈现出其曲折的心理过程,也深刻揭示出其隐秘的灵魂状态,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精神;但在代孕事件中发生的“共同犯罪”的层面上,又显示出“罪恶”的再生和“忏悔”的未完成性。真正的“忏悔”与彻底的“救赎”,还是漫长的人性革命。

Study on the Unfinished “Confession” in *Frog*

Cong Xin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In *Frog*, the behavior of Aunt who created and worshiped clay dolls was a way for herself to atone after “pleading guilty”, and it was a self-consolation to lessen her fear, which was far from the real “confession” consciousness. The person who had the real “confession” consciousness was not Aunt, an executor of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but the addressee named Sugitani Yoshishito who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confess and the playwright named Tadpole who was the “victim”. Tadpole had the real “confession” consciousness at the level of “the crime of the innocence” in the family planning event, but he showed the rebirth of “crime” and the unfinished “confession” at the level of “joint crime” in the subsequent surrogacy event.

Key words: *Frog*; confession; the crime of the innocence; joint crime; Mo Yan

责任编辑:孙昕光

^①张学军:《反复叙事中的灵魂审判——论莫言的〈蛙〉的结构艺术》,张学军:《文学本体的阐释与批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4页。

^②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蛙〉》,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莫言文学创作中的风景书写^{*①}

翟瑞青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103)

摘要: 与其他作家相比,莫言是能把风景、心景、声景有机结合起来的著名作家,其创作中的风景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和情怀。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原始野性的自然风景、惨败绝望的民生风景,还有神秘灵动的幻化风景,但这些风景都不是外在于创作主体的客观存在,而是蕴含了莫言20多年的故乡生活和童年体验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不仅表明了莫言对民间文化立场的回归与坚守,还标志着莫言在写作风格和表现方式方面走向成熟。

关键词: 莫言;风景书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1)01-0048-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0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莫言是描摹自然风景的圣手。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声雷动、电光石火、一年四季、天上人间、神话传说、妖魔鬼怪等世间万事万物无不进入莫言的创作视野,从而营造一个丰盈驳杂的风景世界。仅从其作品名字来看,莫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一道道极其别致的风景:《春夜雨霏霏》《石磨》《枯河》《大风》《秋水》《黑沙滩》《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白棉花》《怀抱鲜花的女人》《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冰雪美人》《金鲤》《红耳朵》《红高粱》《红树林》《红蝗》《丰乳肥臀》《锦衣》等等,几乎没有一篇小说不包含极有特色的风景,甚至连他的散文集谈都取了一个颇具风景意味的名字——《会唱歌的墙》。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消费文化的掣肘下,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已开始大面积消失”^②的背景下,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尽管中国现当代小说大都注重风景书写,其中有许多出自著名的小说作家,但莫言的风景书写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可以这样说,他是能把风景、心景、声景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家。在莫言笔下,无论是哪一种风景的呈现,都是随着人物心理的变化而变化,既有声音,又有画面,甚至还有气味。风景在莫言的作品中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和背景,还带有莫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其农村生活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显现,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

一、原始野性的自然风景书写

莫言作品中对原始野性自然风景的呈现,是最摄人魂魄的一种风景书写。此类风景常常以狂野的姿态扑面而来,对人呈压倒性趋势,充溢着一种压制不住的旺盛生命力,极具艺术冲击力

* 收稿日期:2020-10-21

作者简介:翟瑞青(1966—),女,山东莘县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童年经验和莫言的文学创作”(13CWXJ15)的阶段性成果。

②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和想象感染力。一片红色海洋般的高粱地，一浪高过一浪像野马一样狂野不羁滔滔奔腾的河流，成片的向日葵、玉米地、红树林，广袤无垠的草甸子，浩浩荡荡的芦苇，白茫茫的盐碱地，用酒瓶子垒成的会唱歌的墙；炎炎的夏日，凛冽的严冬，皑皑的白雪，震耳欲聋的雷声，呼啸而至的大风，火球一样滚动爆炸的闪电，淹没了所有的暴雨，形态各异的月亮；成群成串的苍蝇蚊子，铺天盖地的蝗虫，叫声一片的青蛙，遮天蔽日、色彩斑斓的鹦鹉，还有牛、马、狗、鸡等等，均成为震撼人心的风景。

尽管莫言的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孙犁风景书写的风格，但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之后，莫言则常常不再以单纯的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价值取向去呈现自然风景，其笔下的自然风景尽管极其鲜明生动，但是很难给人以美感和诗意，更谈不上是人们心灵可以栖息眷恋的精神家园。他既不像古代山水田园作家乃至现代作家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那样，用浪漫唯美的表现手法，展现一幅幅静态美丽的风景画，歌颂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情调，塑造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让人在美丽而宁静的风景陶冶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心灵的安宁；也没有像同为山东作家的张炜那样，面对工业文明的兴起，感叹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自然已经无法和谐共处，风景不再“如画”，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美丽自然“风景”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为此而对标志着自然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葡萄园”常怀思念之情，希望“融入野地”。莫言常常让充满动感、色彩、声音、气味的风景以极为原始野蛮甚至恶劣残酷的姿态矗立或者横亘在人们面前，与人缠绕扭结在一起，犹如一道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延宕着人们的心智与行动，成为阻挠人们实现愿望、达成目的的拦路虎。这种原生态的风景在与人们进行纠缠的过程中，不仅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还为人们制造了种种麻烦，磨耗着人的神经，让人产生诸多烦恼甚至心理恐慌，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苦苦抗争以至于无法剥离的“命运挣扎”般的风景，同时伴有鲜明的政治、历史、民族、文化印记，因而，让人难以发自内心地去热爱与欣赏。

抗日战争时期，夏秋之际，华北平原上茂密的高粱、玉米所形成的青纱帐，很好地掩护了抗日队员的活动，从而成为他们极好的隐蔽之所。然而，莫言笔下的青纱帐却是：

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加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①

这里的高粱地，在“父亲”面前，不是捉迷藏的好玩之地，而是潜藏着即将爆发战争的巨大危险。如烟似梦的朦胧雾景，不仅成为影响视野阻止“父亲”看清周围环境的障碍，还成为他顺利进入高粱地的巨大阻力，并且带给他身体极大的负担和痛苦。人与高粱碰撞后，高粱发出的“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导致雾气在高粱叶子上凝结形成的水珠“扑簌簌落下”。这种带着声响的“声景”，带给“父亲”的感受是因雾气浓重而前行艰难，还有像刀子一样的高粱叶片锯割着面颊所形成的沉重“心景”，在潮湿阴冷雾气笼罩着的高粱地风景中呈现着。

我抱着她踉踉跄跄、戚戚怆怆地从葵花地里钻出来。团扇般的葵花叶片嚓嚓地响着，粗

^①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硬的葵花叶茎上的白色细毛摩擦着我的胳膊和脸颊。出了葵花地我就出了一身汗,被葵花茎叶锯割过的地方鲜红地凸起鞭打过似的印痕。好像,好像被毒虫蜇过般痛楚。更深刻的痛楚是在心里。明亮的阳光下,包裹婴孩的红绸子像一团熊熊的火,烫着我的眼,烫着我的心,烫得我的心里结了白色的薄冰。^①

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葵花地即使不开花,也会煞是好看,应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是作家并没有远观或者近看,而是在烈日当头的炎炎夏日,让回乡劝说偷偷怀孕的妻子堕胎、心情郁结的主人公军官直接钻进密不透风的葵花地,干了一件不愿意干还不得不干的事情:捡拾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计划生育风声正紧,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堕胎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命运)。明亮的阳光、葵花叶子的响声、孩子的哭声、像火一样映入眼帘的包裹孩子的红绸子(画面、声音),与“我”被叶片割锯得疼痛难忍的皮肤,尤其是出了一身汗的外表的“热”和像“结了白色的薄冰”的内心的“冷”所形成的强烈感觉产生错位,组成了一幅声景、心景、风景缠绕在一起而又充满矛盾的丰富画面。

(上官寿喜:引者注)这个四十二岁的小个子男人,俯在孙家的墙头上,专注地观看。他感到孙大姑的目光横扫过来,冷冰冰的,宛若一柄柔软如水、锋利如风的宝刀,几乎削掉了自己的头颅。哑巴们和他们的狗也转过脸转过眼睛。哑巴们眼里放射着几近邪恶的、兴奋不安的光彩。狗们歪着头,龇出锐利的白牙,喉咙里滚动着低沉的咆哮,脖子上的硬毛根根直立起来。五条狗,犹如五支弦上的箭,随时都会射过来。^②

在此,莫言运用对比的手法,把上官寿喜的弱小、猥琐与眼光像刀子一样的孙大姑、孙大姑充满邪恶眼神的哑巴孙子们,以及孙大姑家的五条凶悍无比的恶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说人的精神状态的表现都是通过对他们眼神的不同修饰进行呈现的话,那么对狗的呈现除了眼神之外,还有形状(歪着头、龇出锐利的白牙、喉咙里滚动着的叫声、脖子上的硬毛根根直立起来、犹如五支弦上的箭)、颜色(白色)、声音(滚动着低沉的咆哮),共同组成了一个惊骇可怕的风光画面。

二、残败绝望的民生风景书写

莫言曾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中的内容。”^③由此可见,故乡的河流、沼泽地、田野、草甸子、高粱地、养殖场、牲口棚(牛棚、马厩、猪圈)、磨坊、农村大集、教堂、破庙、小学校等,既是莫言的空间叙事场所,也是他展现民生风景的重点所在。20岁之前,莫言是在农村度过的,农村带给莫言的不是丰饶和富足,而是伴随着饥饿、孤独、贫穷、屈辱等创伤性情感体验,这一切成为莫言极为深刻而痛苦的成长记忆。因此,当他离开农村之后,农村这块土地上的河流、沼泽地、田野、牲口棚等等一切风景,像一张张清晰可见、立体可感的电影胶片,无法阻挡地闯入了莫言的创作视野。

“文革”期间,《筑路》中的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本来就是边缘人的来书在筑路过程中将意外得到的一坛金银财宝埋在白桑树下,本想在一个“闪电蓝白夹杂,抖得天地如筛糠般惊悸”的夜晚挖出来,结果不知何时被人挖跑了。莫言用各种各样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稀奇怪异的比喻,把

①莫言:《白狗秋千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

②莫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③莫言:《故乡往事》,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来书痛苦至极的内心世界与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自然界缠绕扭结在一起尽情展示：“雨点抽到他身上，像抽着一段朽木。闪电簌簌地亮，亮开黑暗时，他就感到胸膛裂开，哗然有声，好似裁缝扯布。冰冷的雨点像坚硬的鸡嘴，把他的心脏啄成一个千麻百坑的烂萝卜。闪电熄灭，胸脯合拢，心脏凝成一个冰坨子，一丝温热被冰坨子挤压上升，变成打呃般的哭泣从鼻孔里溢出。雨打头颅声空洞优雅，像打着干葫芦。从他周围有若干种声音扑来：风吹柳叶笛，火燎芦苇席，驴啃枯树皮……”^①《大风》中“我”与爷爷在大风裹挟着漫天尘土的河堤上艰难地拉着车，爷孙俩辛辛苦苦割的四大捆草，最终被大风刮得只剩下卡在车栏里的一根草。《秋水》中，在被无边无际的浑浊泥水包围着一个小山丘上，逃婚至此的奶奶正处在生孩子的痛苦折磨中，爷爷在一旁焦灼不安却束手无策。《黑沙滩》这个在每天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色彩（清晨是温暖的玫瑰红，正午是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下又蒙上一层紫罗兰）的美丽海滩，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驻扎在此的解放军战士视这里为禁地，村子里的大人孩子整日饥肠辘辘、食不果腹，像饿狼一样盯着战士手里食物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得像豆芽菜。

“高粱地”尽管有傲然不屈的壮美，有旺盛狂野的生命力，为抗击日寇提供了天然屏障，但更有雨后的泥泞难行，夏日像蒸笼一样的燥热难耐，高粱叶片像鞭笞一样对人的皮肤毫不留情的伤害，还有高粱收获后难以下咽和果腹的悲哀。美丽的向日葵地里，隐藏的却是人们不愿意抚养被遗弃的亲生女儿（《弃婴》）。耀眼无边的绿色带给农民的并非是富足安乐，而是老农在烈日下抛洒汗水、辛苦劳作，却依旧是苍蝇横飞、落后贫穷、肮脏和愚昧，交不起孩子学费的农村社会现实（《欢乐》）。村边的小石桥，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展现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面影。在战争时期，遭受的是日本汽车的碾压（《红高粱》），见证着各种历史势力的较量搏杀（《丰乳肥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铁匠们在此锻打农具，挖河的河工们在此躲避风寒（《透明的红萝卜》）；即使在新时期之后，颓败的小石桥上，走过的也不是光彩照人的姑娘的情影，而是家有四个哑巴的暖姑，背着一筐葱绿、新鲜、沉甸甸的高粱叶子，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上桥头，“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她用一只手按着搭在肩头的背棍的下头，另一只手从颈后绕过去，把着背棍的上头”^②，在她的颈子上、头皮上闪着亮晶晶的汗水。所以，莫言笔下的这类风景展示的就是一幅幅生活多艰的“民生风景”。《白狗秋千架》《欢乐》《天堂蒜薹之歌》《蛙》等作品，尽管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生活与六七十年代一穷二白、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改观，但他们的生活和处境（物质条件、环境卫生、精神状态、政治生态）依然不容乐观，城乡之间还有鸿沟一般的差距。如果美好生活（高考改变命运；生一个健康的能说话的孩子；卖掉蒜薹改善生活；找一个喜欢的人结婚过日子；撞死了人给一个满意的说法，等等）无法实现，那么，风景在他们的眼中就是绝望的风景。即使在工业文明时期，莫言笔下的风景依然是环境肮脏不堪，道路坑洼不平，法律的公正公平无法实现，贫富悬殊，贪官巧取豪夺、荒淫无耻，百姓卖儿鬻女，令人厌恶绝望（《酒国》）。

临近煤矿时，黑色的路面坑坑洼洼，疾驰的卡车不得不把速度放慢。车底的弹簧板嘎嘎吱吱地怪叫着；头不断地碰到驾驶楼的顶棚。

路越来越糟，卡车从一个陷坑跌入另一个陷坑，颠颠簸簸，咯咯吱吱，像一头即将散架的巨兽一样爬行着，终于接在了一大队车辆的尾巴上。

①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②莫言：《白狗秋千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路两边是几株遍体畸瘤的矮树和生满野草杂花的路沟,树叶和草茎上,都沾着黑色的粉末。路沟两边,是深秋的枯燥的田野,黄色和灰色的庄稼秸秆在似有似无的秋风中肃立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时间已是半上午。高大的矸石山耸立在矿区中,山上冒着焦黄的烟雾。矿井口的卷扬机无声无息地转动着,有几分神秘,有几分古怪。他只能看到卷扬机轮的一半,余下的一半被黄河车挡住了。

通往矿区的道路肮脏狭窄,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肠子。卡车、拖拉机、马车、牛车……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长串咬着尾巴的怪兽。

卷扬机绞着银灰色的钢丝绳,哧溜哧溜转动着,因为生锈,也许是油漆,铁架子在阳光下呈现出暗红的颜色,很脏。那巨大的定滑轮是黑色的,很严肃。川流不息的钢丝绳放射着虽不耀眼但十分吓人的银亮,让他联想到盘结在一起的毒蛇。眼睛感受色彩和光芒的同时,听到定滑轮唿隆隆的转动声、钢丝绳嘎嘎唧唧的抽动声以及从地下发出的沉闷的爆炸声。^①

即使在一些书写美丽风景的篇章中,也难掩作者悲哀感伤的情绪。如散文《音乐》中美丽而宁静的风景,难以缓解主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以下这些风景描写往往优美感人,也不乏诗情画意,却掩饰不住充溢其中“民生之艰”的哀伤情调。

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犹如一朵肥硕的鲜花。月光犹如鲜花馥郁的香气,洒遍了辽阔的原野。田野里刮着春四月里特有的温暖干燥的风。数月滴雨不落,大地焦渴,农民的嘴唇开裂;庄稼生锈,正在抽薹的蒜苗垂头丧气。^②

这是春天的风清月明之夜,明媚的月光洒满了辽阔的原野,温暖怡人的四月风,吹拂到人的脸上非常舒服。然而,忙碌的人们无暇欣赏这美好的景色,因为老天数月无雨,农民不只没有喝的水,还有干旱的土地、生锈的庄稼、正在抽薹的蒜薹,都急需雨水的滋润。高马正等待着井里渗出水来,好让蒜薹喝够水,盼望丰收的蒜薹给自己带来好的利润,以便把心爱的姑娘金菊娶进家门。

月亮上来了,暗红色,边缘混浊不清。院子里有了些亮色,沿墙种植的洋金花开得正盛,影影绰绰的花朵像一簇簇白色的蛾子。花的药香味与厕所里的粪便味斗争着,此起彼伏。^③在收、卖蒜薹的关键时刻,妻子临盆,高羊不得不卸下车子上的蒜薹,把妻子拉到乡卫生所,这里书写的是在排队等待进产房时候的月夜景色。高羊无法也无心欣赏这月色美景,收卖蒜薹的急切心情,被妻子生孩子的事情打乱,妻子能否给他生个期盼已久的儿子,也是高羊心里无法平静的重要原因。对儿子的美好期盼,希望蒜薹卖个好价钱,等待孩子出生的难熬时间,眼下的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一切带给高羊内心的是五味杂陈。花的香味却混合着难闻的厕所气味冲击着人们的嗅觉神经,让人无法安静。当老婆进了产房,高羊一人走到杨金花前:

他怔怔地站在它们面前,嗅着它们奇怪的香气,看着它们翩翩起舞的花瓣,不由得弯下腰去。他用指尖触触那些白茫茫的肥大叶片,叶片冰凉,露水滚下来。他的心颤抖了一下。后来,他把鼻尖触到花蕊上,花的奇怪香味爬进他的鼻孔,他抽搐着脸,望着月亮,猛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④

①莫言:《酒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4、6、6页。

②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③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④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

三、神秘灵动的幻化风景书写

“仅仅从人的世界角度不足以理解乡土中国的丰富性，乡土中国是一个人、神、鬼和各种精灵共生共处，现实和想象、事实和传说杂糅的世界，从人与自然对抗与和解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生命世界与乡土中国的关系。”^①莫言深知乡土世界的丰富驳杂，为此，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让位于神、鬼和各种生物精灵。这类小说人物的生存空间或者说生活空间，突破了现代人对具体生存空间的限制，对接了传统魔幻小说如《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作品在空间观念上的自由理念，人物可以自由出入于天界、人间、冥界，人不仅有无限的活动空间，如孙悟空一般，还具有超长能力的发挥，来去自由，瞬息万变。人与鬼、神、动物和谐相处，相互切换。这类风景的呈现带有浪漫、神秘，甚至唯美的特点，具有鲜明的魔幻主义色彩。

蛙声一片的《蛙》；月光变换着各种神情的《生死疲劳》；传说天上的织女把织布梭子掉到人间，在地上砸了一个坑，如今成为银光闪闪如镜的青草湖；月光下，一对祖孙网鱼，网起了一条泛着金色光泽的金翅鲤鱼，还有鲤鱼变媳妇、金枝姑娘变鲤鱼的神秘传说（《金鲤》）；八月中秋，晚风习习，秋虫鸣叫，皎洁的月光蓝幽幽的，雾气笼罩着高粱地，“我”与九叔提着马灯去河里捉蟹，结果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吹着树叶的九叔冰冷刺骨，月亮钻进了一朵黄色的、孤零零的云中，河沟的水面上挺出一枝带着淡淡幽幽香味、洁白的会移动的荷花，突然出现的鬓角别着大白花、满脸微笑、额头正中有粒黑痣子、身穿长袍的神秘长发女人，用一根带穗的高粱秆快速捉到了两麻袋螃蟹，还有那莫名其妙的四句话，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奇遇（《夜鱼》），亦真亦幻，真真假假；月光下，月明风高，月亮鬼里鬼气，暧昧不清。另如公鸡变人的《锦衣》、人鬼偶遇的《奇遇》、人与动物相互切换的《生死疲劳》、鸟仙飞上树枝的《丰乳肥臀》、饥肠辘辘的孩子钻入地下饕餮各种美味的《嗅味族》，等等，上天入地，亦人亦鬼，创造出一个神奇瑰丽的文学艺术世界。这些都是作者大胆丰富的想象力和幼年所受神话传说影响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作家试图抵抗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心灵和精神暂时解脱的写照。

这蕴含着莫言对变幻无常、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敬畏。莫言童年与动植物亲密接触，自由相处的既有《聊斋志异》中神秘的传统经验，也有作者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各种神话传说的记忆。如莫言祖母曾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种能模仿人说话的小动物，模样很像黄鼠狼，经常在月光皎洁之夜，身穿着小红袄，在墙头上一边奔跑一边歌唱。”^②作者就把这个情节运用到《生死疲劳》中。

在莫言看来，“大自然是有灵魂的，一切都是通灵的，而这万物通灵的感受主要是依靠着童年的故乡培育发展起来的”。“故乡的风景之所以富有灵性、魅力无穷，主要的原因是故乡的风景里有童年。”^③但对这些风景的描写，与现实生活中的风景描写相比，在表现手法上，显得更加灵动、灵活、自由，毫无拘束，不像现实生活中的风景那么沉重、压抑，而是带有一种孩童般新奇、好玩、探险的心态。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学艺术世界中，作家才能摆脱童年生活所带给他的创伤性情感体验，摆脱痛苦的情感记忆的缠绕，进入到一种澄明自然、活泼灵动、自由自在、神奇有趣的风景世界中，使心情变得舒畅而轻松。

①何平：《在回归中重建乡土中国——〈果园城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②莫言：《恐惧与希望（代自序）》，莫言：《月光斩》，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莫言：《超越故乡》，《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67、269页。

四、别样风景书写的意义

莫言之所以在1985年开始声名鹊起,原因就是在这一年他集中创作了《白狗秋千架》《秋水》《枯河》《大风》《金发婴儿》《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等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些作品中,莫言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开始追求一种不同于以往且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别样风景书写,并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自此,真正属于莫言的创作风格开始确立,显示出莫言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首先,实现了作家创作主体的回归。莫言对风景的感受,最早是从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和切身体验中得到的,而不像有些作家是从想象中得到的。莫言11岁辍学,直到20岁离开故乡,其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为生产队放牛,或者在无法沟通交流的成人队伍中从事生产劳动,大自然的万事万物成为莫言交流和沟通的对象,因此,莫言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有心理活动。他不仅是用眼睛观察自然,用耳朵倾听自然,更是在用心体验自然。他心中的自然,不是平面的、静止的、孤立的、单色调的,而是立体的、多声部的、杂糅的、多姿多彩的,是由各种声音、色彩、形状、味道交互变幻而成的多维画面。其中,既有风和日丽、天高云淡、鸟语花香的惬意,更有风雨交加、严寒酷暑、风刀霜剑的冷酷,自然风光带给莫言的不仅有心灵的慰藉,而且更多的是身心受到伤害所导致的感伤情绪、痛苦记忆。莫言开始把这一切熔铸到文学创作中,呈现出属于莫言的别样风景。

其次,对民间文化创作立场的坚守。“民间的审美形态并不是一个脱离了现实民间生活或者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纯理想境界,否则,民间就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乌托邦。”^①按照西美尔《风景哲学》的说法,风景呈现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莫言之所以与外在于他的这个世界的关系非同一般,源自于他内心充溢着孤独和自卑,以至于强烈感觉到弱小的人类是没办法与之相抗争的。其作品中很多风景的展现,正是作为人在大自然面前软弱与无力的表现。在莫言的笔下,儿时的故乡大地,缺少一种“自然的富饶、丰沛、静美和生生不息、春华秋实的循环,退化为生命怵目惊心的荒野,压抑窒闷,旷冷荒芜,……这生命贫乏的荒野笼罩着一片荒凉苍犷的气氛,乡村在荒凉中只能走向沉沦,生命在贫乏中只能日渐泯灭。”^②这种苍凉的风景是作者对农村百姓悲悯情怀的展示。

与沈从文、郁达夫、萧红、汪曾祺等作家不同,莫言并非自幼就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主动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难以忘怀,而是对自然充溢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伤情绪,甚至有时是排斥与厌恶。可以说,他对大自然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自然界的美丽风景和神话传说,让他不愉快的童年有了心灵上的归属感与慰藉感,从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快乐,暂时缓解了失学和饥饿给他造成的精神和肉体痛苦;恨的是自然环境并没有与故乡的百姓和谐相处,反而成为制约他们行动、发展的不利因素。虽然也有鸟语花香、蓝天白云等美丽风景,但更多的却是大自然的残酷与暴虐、贫瘠和荒凉,以及百姓所遭受的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和摧残,而不是大自然的馈赠。郁郁葱葱的绿色,代表的不是庄稼丰收在望的前奏;滔滔的河水,也没有壮观的美感,而是房塌屋毁人亡、牲畜庄稼淹没的危险;凛冽的严寒和皑皑的白雪,并没有可供观赏的美学价值,而是讨饭或者躲避战争的人行走过程中艰难的障碍。即使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丰富多彩的

^①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②周罡:《犹疑的返乡之路——论莫言民间文化立场的回归与游离》,《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大自然带给乡亲的依然有悲苦,更主要的还有精神生活的贫瘠。

再次,标志着莫言叙述风格的确立。也是从 1985 年开始,莫言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奇特的感觉和汁液横流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带有作者强烈的生命感悟和情绪记忆且焕发着艺术之光的风景书写,从而成为文坛上一道独树一帜的亮丽“风景”。这类将风景、声景、心景杂糅在一起,情景交融,相伴而生的风景书写,使得风景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材料,也不再变得可有可无,而是带有强烈的生命律动,呈现着现实与虚构、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想象、荒诞与真实杂糅在一起的风格特点,极大地调动创作主体和读者的情绪和情感,制约着人物的心理和行动,成为笼罩作品氛围和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与其他作家相比,莫言不是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视角远距离审视、观察和欣赏大自然,而是以一位在农村压抑、屈辱地生活了 20 年的农民知识分子身份感悟自然、敬畏自然、表现自然。他把在自然美景中体验到的快乐和在残酷风景中品尝到的艰辛,运用真实、奇特、荒诞等艺术表现手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斑斓、绚丽多姿的风景艺术世界。

Landscape Writing in Mo Yan's Literary Creation

Zhai Ruiqing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s, Jinan Shandong, 250103)

Abstract: Mo Yan is a master of depicting nature, and also the most famous writer who associatedly links up landscape, heart and sound. Compared with other writers, Mo Yan's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shows a quite different landscape and feeling. In his works, there are not only the scenery of primitive and wild nature, the scenery of people's livelihood of great failure and despair, but also the mysterious and smart unreal scenery. However, these landscapes are not the objective scenery that exists independently outside the creative subject, but a unique landscape that contains his hometown life and childhood experienc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t not only shows Mo Yan's return and adherence to folk culture, but also marks his maturity in writing style and ways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Mo Yan; *Landscape writing*; *Transparent Red Radish*; *Red Sorghum*

责任编辑:李宗刚

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①}

薛 泉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李攀龙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其主要表现为一种自觉的主盟意识。在此意识支配下,他积极主动地聚集志同道合者,结盟立派,确立了其盟主地位。这主要是通过倡导、施行较前七子更狭隘、偏激的文学主张,以及推行更为严苛的行为规范来实现的。在加盟者的配合下,李攀龙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文学轰动效应,明代主流文风为之一变,前七子流失的文学权力,复归于郎署。深入系统地探讨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后期文学生态环境,还能为宏观上把握明后期文学发展演变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关键词: 结盟意识;盟主;文学权力;复归郎署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56-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7

明朝嘉靖后期的主流文风转向,李攀龙的发轫之功不可磨灭。目前,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态势,成果也较为丰硕。然而,却鲜有研究者从李攀龙结盟意识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文学权力复归郎署的探析来揭示这一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李攀龙研究的深入,也阻碍了对明代文学发展演化的深层次体认和整体性把握。因而,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所谓的结盟意识,主要是指行为主体对结盟目的、结盟方式、结盟策略、文学主张的体认,以及盟主、盟员间的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与相互认同)、盟员的归属感等心理过程的总和。文学结盟可以在盟主的号令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整合群体力量,强力推行某一文学主张,制造文学震撼效应和文学景观,赢得文学话语权。嘉靖后期的文学权力^②复归郎署,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李攀龙的结盟意识。

一、自觉的结盟意识与盟主地位的确立

无论何种形式的结盟,都需要有强烈结盟意识的领袖人物,需要有盟主的引领,这在李攀龙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李攀龙多次以“吾党”相标榜,便是较明显的表征之一。他所谓的“党”,主要指文学主张相同或相近者缔结成的联盟,即文社或文学流派。李攀龙的结盟意识,首先表现为一种居高临下的主盟意识。初识王世贞时,他便约之道:“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③其敢为人先、主盟文坛的强烈意图显露无遗。《与王元美》

* 收稿日期:2020-12-02

作者简介:薛泉(1969—),男,山东莒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郎署官与文学权力之关系研究”(14BZW064)的阶段性成果。

② 文学权力的内涵较为复杂,因行文所限,这里不展开论析。本文所谓的文学权力,主要指文学话语权,即掌控文学舆论、引导文学风向以及文学影响的一种特殊文化权力。鉴于此,二者在文中时而互用。

③ 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敏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

则直接宣称:“惟是不佞敢谓与足下狎主齐盟哉!”^①“狎主齐盟”一语,源于《左传》。《左传·昭公元年》:“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②意谓诸侯之势,时有强弱,更相主盟,强者为尊。李攀龙援引此语,其主盟意识之强烈,毋需多言。在《戏为绝谢茂秦书》中,他当仁不让地宣称:“我与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③至于“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于我也”^④一类的话语,表面上看似谦让,实则骨子里蕴涵着浓烈的主盟意识。

李攀龙主盟意识的终极目标是主盟一代文坛。为此,自信与自负,必不可缺少,至少他以为如此。从其“少年多时时言余”“故五百年一名世出”“故能为猷吉辈者,乃能不为猷吉辈者乎”^⑤之类的自白中不难领略。他还“尝慨然称少陵氏没千余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属何人哉”^⑥,本意显然在于“属”己。极端的自信、自负,多易于滑向狂妄,《寄元美》称:“寥落文章事……微吾竟长夜。”^⑦出言如此,可谓狂妄至极,无怪乎朱彝尊以“妄人”^⑧称之。李攀龙本人于此也有清醒的意识,《与许殿卿》:“夫好比文角艺者出于妬,妬出于不自信。龙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动心?”^⑨或许他以为,这正是成为盟主必须具备的。

欲主盟文坛,需要物色一批忠实的羽翼追随自己左右。李攀龙深知其难度之大,尤其是在短时间内使他人舍其所学而从己,可谓“日莫(暮)途远”。况且,那些已有成就者,又“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者乎”。^⑩尽管如此,他还是潜心笼络一己钟意之人选,以及有意向其靠拢的名士。嘉靖二十六年(1547),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后,他利用“曹务闲寂,遂大肆力于文词”,并广“交一时胜流”^⑪,有意识地物色人选。王世贞、徐中行二人很快入其法眼。作为名家“胜流”的王世贞,由李先芳得知李攀龙的志向,慕名造访;于稠人广众中,李攀龙便“心知”王已心向于己,并与之相约“狎主齐盟”。他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对王世贞道:“今乃得一当生”。^⑫徐中行“以进士初官刑曹,即有能诗声”^⑬,李攀龙也颇为青睐之,并很快地网罗其于麾下。他曾非常得意地对徐中行说:“吴越一撮土,乃有两生奉一不佞。”^⑭两生,即王世贞、徐中行。经其奋勉,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人,“皆先后缔交”。^⑮

物色羽翼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李攀龙博得加盟者认同、并被奉为盟主的过程。较早加盟的王世贞对他甚为推崇。初入文坛时,王世贞自称,只服膺李攀龙一人:“记初操觚时,所推先唯一于鳞(李

①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8页。

②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卷三十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8、1219页。

③李攀龙撰、李伯齐点校:《李攀龙集》(卷二十五),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560页。

④李攀龙:《送宗子相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1页。

⑤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

⑥王世贞:《明诗评》(一),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002页。

⑦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⑧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81页。

⑨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二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00页。

⑩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

⑪殷士儆:《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金輿山房稿》(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83页。

⑫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

⑬俞允文:《青萝馆诗序》,《仲蔚先生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8页。

⑭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1页。

⑮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王奉常集·文部》(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9页。

攀龙)。”^①他最伏膺李之诗:“仆生平所伏膺,文则伯玉,诗则于鳞。”^②他以为,李“之于诗,志在超乘,其游吾侪间,矫矫牛耳矣”^③,还诚服其“能称说古昔”,故“以牛耳归之”^④。王氏还称,其“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也是在与李“始定交”后。^⑤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推崇,甚至到了顶礼膜拜之地步:“世贞二十余,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⑥悉焚旧稿,意味着对自己先前诗歌创作的自我否定,也是对李攀龙高度认同的表征。之所以奉李攀龙为盟主,除诚服其文学造诣,还与知恩图报有关。王世贞曾言于汪道昆:

平生知我者三,始则于鳞……余何能修古,夫夫摈之相之,趋则让趋,步则让步,左提右挈,相与狎主齐盟,则于鳞之为也。^⑦

王世贞以为,因有李攀龙的提携与奖掖,自己才能在“修古”路上有所斩获,才有幸“相与狎主齐盟”。由心生感激而奉之为盟主,自在情理之中。

在王世贞看来,其他加盟者也同样视李攀龙为盟主。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序徐中行之《青萝馆诗集》称:

记不佞初识子与(中行)时,子与业已壮,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见于鳞而悦之,尽弃其学而学焉。即有搆,而亡近于建安、三谢、开元、大历弗出也,出而亡当于于鳞之首肯弗存也。^⑧

与王世贞一样,在结识李攀龙后,徐中行也“尽弃其学”而从之。其诗文的存留,也以能否为李攀龙“首肯”为准绳。由此,徐中行显然已视李攀龙为盟主。其他的加盟者,也大抵如此。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载:

其(于鳞)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蓄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⑨

在凸显李攀龙“咸弟蓄之”的同时,双方地位之悬殊,也展露无遗。“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意谓包括王世贞在内的加盟者,皆甘拜下风,奉李为盟主。

那么,王世贞的论断,是否出于其为李攀龙推毂,而心生感激的虚美之辞呢?从当时所引发的广泛共鸣观之,答案应是否定的。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载,李、王“方力为古诗文自振”时,徐中行至,“大悦其说”,遂与之“缔交”。^⑩又,隆庆四年(1570)冬,汪道昆撰《青萝馆诗集序》称:“子与严事于鳞、元美,直将尸而祝之。”^⑪尸祝,即祭祀时主读祝文者,这里借指盟主。汪道昆为徐中行所撰墓志铭称:“于鳞以修古先鸣,盖与元美为桴鼓”,“子与相得甚欢,恨相知晚也。”^⑫

①王世贞:《吴瑞穀文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74页。

②王世贞:《潘景升》,《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208页。

③王世贞:《海岳灵秀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554页。

④王世贞:《书李于鳞集后》,《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556页。

⑤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8页。

⑥王世贞:《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84页。

⑦汪道昆:《祭王长公文》,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八十三),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707-1708页。

⑧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青萝馆诗》(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4页。

⑨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49-850页。

⑩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9页。

⑪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青萝馆诗》(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⑫汪道昆:《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徐公墓志铭》,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五十一),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071页。

“桴鼓”，鼓槌与鼓。语本之《韩非子·功名》：“至治之国，君若桴，臣若鼓。”^①以“桴鼓”称喻李攀龙与王世贞同气相应，而徐中行自愿追随左右，奉李为盟主。其实，徐中行本人早已坦言，《五子诗·李郎中攀龙》有曰：“众星何历历，周环随北辰。遂令同心者，周旋若一身。”^②以众星之拱北辰，喻诸子与李攀龙之关系，盟员与盟主身份之定位，清晰可见。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又称：

比讲业阙下，王元美与余辈推之坛坫之上，听其执言惟谨，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匱罔渝。^③

“听其执言惟谨”，视其文学观念“若金匱罔渝”，表明李攀龙已成为公认的盟主。这也并非徐氏一家之言，当时入盟者，多有如此表白。万历十二年（1584），张佳胤撰《天目集序》：“自嘉靖文事兴，于鳞称盟主。”^④上文提到的汪道昆，又何尝不如此！其《李于鳞》：“足下主盟当代，仆犹外裔。”^⑤自陕西归居济南后，李攀龙的声望益隆，盟主地位愈加稳固，“自时厥后，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⑥，他已由一个流派的盟主，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坛宗主。

如徐中行所言，李攀龙能成为盟主，与他和王世贞等人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隆庆四年（1570）秋，陈有守撰《青萝馆诗序》，也言及于此：“弘德时李献吉、何仲默相叹，大雅久已不作，伊余其力追挽之。天挺李于鳞、王元美，嘉靖中倡廓古风，持鞭弭雄视中原。徐子与前茅后劲。”^⑦钱谦益则更看重王世贞：“（李攀龙）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吴郡王元美以名家胜流，羽翼而鼓吹之，其声益大噪”^⑧。李攀龙对此也不讳言，他向徐中行坦言道：“吴越一撮土，乃有两生奉一不佞，并立中原，比肩千载，图盛事者邪？”事实上，李攀龙能成为一代盟主，是诸子共同拥戴的结果。这从徐中行“众星何历历，周环随北辰”的诗句中不难理会。宗臣誓与诸子“共励斯盟”^⑨，也透出些许这方面的讯息。

作为盟主，李攀龙虽为人孤高，但很注重培养后继盟主，这是其主盟意识的延伸。他深知，要使自己的文学主张发扬光大，必须后继有人。结交之初，他就颇看好王世贞，视之为“吾党后贤”^⑩，欲与其“狎主齐盟”，并大力提携之。王世贞于此也心领神会，称李攀龙于己“趋则让趋，步则让步，左提右挈，相与狎主齐盟”。在过世之前，李攀龙就已视之为二号盟主：“我与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王世贞也自觉当之无愧，在《王氏金虎集序》中，他自诩道：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徐国伦等人，“咸慷慨自信于海内，亡所许可，独称吾二人者千古耳”。^⑪这不能不说，李攀龙的结盟意识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二、狭隘、偏激的文学主张及严苛的行为规范的推出

李攀龙的主盟意识及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凭借的是重申前七子郎署文学旗帜。《明

①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2页。

②宗臣：《宗子相集》（附录），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496页。

③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天目先生集》（卷十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④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⑤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九十七），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980页。

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

⑦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青萝馆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9页。

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

⑨宗臣：《报张范中》，《宗子相先生集》（卷十九），《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2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201页。

⑩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3页。

⑪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176页。

史·文苑一》称,至嘉靖时,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①。不仅如此,李攀龙还奉李梦阳、何景明为宗,且“于本朝独推李梦阳”^②,甚至以不与李氏等生于同时而遗憾。汪道昆曾追忆道:“于鳞谓余:‘吾党亟称献吉,恨不与诸君子同时。不自意结伍从之,取前茅以进,幸也。’”^③“吾党”,表明重申前七子的文学主张,不只是李攀龙个人的心声,也是汪道昆与其他盟员的共同心愿。其实,徐中行所谓“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匱罔渝”,已道明于此。这也是李攀龙与诸子相约“狎主齐盟”、结盟立派的文学主张,但较之前七子,更显狭隘、严苛,也更为偏激。

时间断限上,前七子强调的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尤其是李梦阳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到了李攀龙那里,时段变得更短。殷士儋为其所撰墓志铭称之:“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④钱谦益转引殷之语,稍事改易谓:“高自夸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⑤在此,“两汉”已缩短成“西汉”,“盛唐”改缩为“天宝”。王世贞于此极为认许,干脆称:“李于鳞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⑥他还特别声明,自己在结识李攀龙后,才“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徐中行“遂取旧草,悉焚之,而自是诗非开元而上,文非东、西京而上,毋述”^⑦,也发生在结交李攀龙之后。从中可见李攀龙对诸子影响之深远。

宗法对象与风格上,李、何等虽主要以盛唐为宗,且定格于李、杜等大家,但于盛唐诸家,还各有师取。王征舆即云:“何、李刻意少陵,迪功独宗太白,神到之作,自能成一家言。”^⑧李攀龙等人则集中指向模拟杜甫,即使同宗杜甫,其过分注重“规仿”技法,造成“神理不存”,又甚于李、何。^⑨廖可斌也指出,“前七子也最崇盛唐,但于盛唐各家中还各有所师,后七子则集中于学杜甫”,即便是同宗杜,后七子只学其“骨力风格”,“连任何变体、变格都排除在外,只学一体,只守一格,严重的重复雷同就成为必然结果了”^⑩,洵为不易之论。

技法追求上,李攀龙主张,为文作诗应墨守前人陈规,不越绳墨。嘉靖三十六年(1557),李攀龙序王维桢《存笥稿》,称之“为文章其用心,宁属辞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绳墨”^⑪。这何尝不是其心迹的外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李攀龙的为文技法。李攀龙认为,为诗作文须讲技法,“不以规矩,不能方圆”,古人已“法则森如”,后人意欲标新立异,已无可能,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损”。当下之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学习、模仿而已,能做到“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⑫,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直接启迪了王世贞:“文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07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8页。

③汪道昆:《青萝馆诗集序》,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二十一),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59页。

④殷士儋:《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金輿山房稿》(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82-783页。

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

⑥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3页。

⑦王世贞:《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三十四),《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7页。

⑧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皇明诗选》(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⑨鲁九皋:《诗学源流考》,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58页。

⑩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7页。

⑪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⑫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1页。

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鳞。”^①

在对待宋元诗文的态度上,李攀龙极为排斥,认为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尚不足论,更无论宋元诗文。就诗歌而言,他认为,“诗歌自西京逮于唐大历,代有降而体不沿,格有变而才各至”^②,其后的诗作“格以代降”,一代不如一代,自然不必效法。如李、何一样,李攀龙所以贬抑宋诗,还因其言理不言情。不过,李攀龙批判的对象更明确、更有针对性。他曾点名批评道:“晋江、毗陵二三君子……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③此论主要针对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诸子而发。

文学主张须经宣传与践行方可能实现其期望值。除直接宣传与写作外,李攀龙还借助选本这一媒介增强宣传效果。《古今诗删》为李攀龙“取其独见而裁之”^④的选本,是其文学主张的宣言与践行。是选凡三十四卷,一至九卷为古诗,十至二十二卷为唐诗,二十三至三十四卷为明诗,宋诗则阙如。四库馆臣释之曰:“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⑤以明诗直承唐诗,不选宋元诗,进一步突显出李攀龙诗学主张的严苛。

总体上看,李攀龙的文学主张,在时间断限、宗法对象与风格选择、技法追求、排斥宋元诗文等方面,较李梦阳、何景明等愈发严苛、偏激。宋征舆就指出,何、李“不若嘉靖时七子同境也”^⑥。尽管如此,李攀龙的这一主张还是得到了加盟者的一致认同,且内化为共识,成为金科玉律:“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匱罔渝”。

需要说明的是,李、何的文学主张也很严格,但只是未能很好地落实。尤其是流派成员相对自由,可发表不同的见解,如何、李之争。这从内部消解了流派的凝聚力,从而分化出不同诗学倾向与文学流派。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攀龙因此杜绝加盟者发出不同的声音。确如廖可斌先生所言:

前七子复古派也正因为持论不十分严格,从而分化出六朝初唐派与中唐派,并最终导致了复古运动的自我泯灭。后七子复古派作家鉴于这一教训,持论更严,趋向更专一,然而又因此走进了题材、体裁、风格更加狭窄单一的死胡同。李攀龙在复古派阵营内像一个专横的家长,稍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如谢榛,都要受到严厉处罚。^⑦

谢榛受到严厉处罚,是李攀龙在同盟内部推行严格行为规范的必然结果。为保证文学主张的严格落实,李攀龙对加盟者之要求相当苛刻,严格规范其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王世贞加盟之初,就被告诫,要与吴中派保持适当的距离。王世贞《明诗评》记之曰:

于鳞顾折节与余好,居恒相勉,戒吾子自爱,吴人屈指高誉,达书不及子,子故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谢之。^⑧

由于对王世贞寄予厚望,而王又来自吴中,李攀龙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担心王世贞与吴中文人走得太近,不利于其文学主张的推行。同时,也是在婉转地提醒他,加盟后要尽快脱却吴地文

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3页。

②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1页。

③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1页。

④王世贞:《古今诗删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七),《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135页。

⑤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7页。

⑥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皇明诗选》(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⑦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6-327页。

⑧王世贞:《明诗评》(一),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002页。

风。实际上,这是要求加盟者不得有他涉,要“绝他游好”而“一意行其说”。尽管如此,却博得了多数加盟者的认可,并自觉付诸行动,这从王世贞“愧而谢之”可略见一斑。王世懋更感触良深:“诸君子既刻厉相责课,务在绝他游好,一意行其说。即流辈有时名者,视之蔑如也。”^①为了一意推行李攀龙之说,“诸君子”连时流名贤都不放在眼里。

若有人不守规范,可能会引发不愉快,甚至影响到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吴国伦的排名一度落在徐中行之后,就缘于此。王世懋就告之曰:“以足下有境外交,遂使子与得跻而上。”^②对于李攀龙既不加深究,又不听解释,就认定自己有“境外交”,吴国伦很有怨言,他觉得李文多厚于情。^③吴被认定有“境外交”,尚不止此次,其读《艺苑卮言》,发出“厚与吴中诸词家,而独遗一峻伯,故得微讽”^④之慨叹,就惹怒了李攀龙。后者援引王世贞之言,批驳道:“邵武(吴国伦)近稿辄不振,至乃阿党峻伯,以畔正始,岂其才之罪乎?”^⑤吴则反驳道:“乃于鳞谓之党峻伯,君子亦党乎?”^⑥峻伯,即吴维岳,起初与李攀龙同社,后改学唐宋派,李大为不悦,以此结怨,且难以释怀,尽管吴氏后来主动寻求和解。^⑦可见,诚如吴国伦所言,在李攀龙心目中,文学的分量已远在友情之上。

其实,在结盟之初,李攀龙就已表现得非常刻薄,并因此与李先芳产生摩擦。李先芳选录宋元诗,与王、李抹杀宋、元诸家诗的主张有异,引发李攀龙不满,并多次向人诉说泄愤。《与王元美》:“先是,得寄许殿卿者盈牒……李伯承走示新刻十本,寻为读之,推意就辞,未合而战,遂劣长驱,沾沾自爱也。”^⑧《与徐子与》:“向约李伯承暮春者,我二人于日观之上赋相遇也。其人嫋嫋自爱,终恐三舍引避,安能顾草庐?”^⑨李攀龙推定,李先芳不仅已背弃盟约,还“沾沾自爱”“嫋嫋自爱”。这是他断然难忍的,与徐中行的另一通书札,他愈发出言不逊:“日茂秦寄诗见怀,及伯承所贻新刻,并多出入,畔我族类。”^⑩本为社友,因选诗观念之差异,就出语如此不近人情。谢榛被摒弃,踢出“五子”行列,也是因此。

可以说,李攀龙文学主张的严苛与行为规范的排他性,在一定时期内最大限度地维系着流派的纯粹与统一。但也必须清楚,任何一个社团或文学流派,其内部成员既要在创作上有意识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又要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二者不可或缺,还应尽量追求完美的遇合。若忽视或缺少前者,“则是环境对个体失去价值”,会失去维系社团或流派核心利益的内在动力,以致自我消解社团或流派的建构;若忽略或缺少后者,“个体使自己极度地等同于某一群体时,

①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王奉常集·文部》(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9页。

②王世懋:《与吴明卿》,《王奉常集·文部》(卷三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27页。

③吴国伦:《复王敬美书》,《觚觔洞稿》(卷五十二),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2424-2426页。

④吴国伦:《报元美书》,《觚觔洞稿》(卷五十一),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2352页。

⑤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1页。

⑥吴国伦:《报元美书》,《觚觔洞稿》(卷五十一),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2352页。

⑦据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维岳调任山东提学副使,此时李攀龙正辞官居家济南,吴自动造访,李却称病不复见。王世贞周旋其间,李言于王曰:“夫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吴维岳却不以为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46页。

⑧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7页。

⑨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5页。

⑩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4页。

他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①,就会泯灭创作个性,缺乏独创性。这也是李攀龙及后七子未能摆脱前七子命运的重要因素。

三、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

李攀龙之所以要以重揭李、何文学旗帜,结盟立派,作为主盟文坛的策略,除钦慕之情外,更重要的是其窥破文风转捩的契机。由于前七子及其末流的拟古不化,导致文坛陈陈相因、剿袭拟摹之风盛行,郎署文学权力大量流失。嘉靖初年,六朝派、中晚唐派、唐宋派乘势而兴,文坛呈现出“诸调杂兴”^②的格局。为清除文弊,扭转文风,重振唐音汉响,李攀龙不失时机地重申前七子的文学主张,聚合同道,结盟立派。李攀龙等人一再提及的“盟”,即其组建起的文学社团。文社起初以“五子”的名义亮相文坛;后又以“七子”称之,是为后七子。

“五子”结盟后,名动京城主流文学圈。隆庆五年(1571),徐中行在滇闻李攀龙讣讯时,尚称:“先朝艺苑定宗盟,五子风流满汉京。”^③欧大任《祭李于鳞文》也称:“李君挺起,独亢文宗。原本词骚,扬扈风雅。登坛齐盟,西揖作者。天目维徐,吴郡维王。广陵之宗,南海之梁。五子一时,天衢騷裹。”^④不久,这种影响迅速由京师漫及全国。万历三十一年(1603),李维桢序吴国伦《甌甑洞续稿》称:“自先生与五子中兴,而趋向一归于正,天下翕然从风,非西京以下、大历以上,眈眈唇吻所不及。”^⑤这实表明,经李攀龙等人的努力,“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不齿,已成为文坛主流,前七子郎署文人散失的文权又归于郎署。对此,后七子郎署文人还有更明晰的表述。汪道昆《蓼蓼集序》言:

大方家有言,当世之诗盛矣,顾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不佞既然且疑,尝测其涖。^⑥

“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其潜台词即为文权在郎署。“大方家”,指王世贞。汪道昆《王弇州》即称:“当世斯文,下不在山林,上不在台阁。尝闻长公有是言矣。”^⑦“长公”,即王世贞。汪道昆初闻王氏此言,“既然且疑”,后以为然,《送胡元瑞东归记》曰:“当世作者斌斌矣,顾上不在台省下不在山林。斯元美畴昔之言于余,心若有当也。”^⑧“作者斌斌”,则标明当时郎署文学已蔚为大观。“心若有当”,标明汪道昆已经认同此说。俞安期《愍知》诗小序,论调也相类之:

自丁丑纳交,余始识搦管耳。秋林之业,方勺一蠹,公则知余进未可量,发醢鸡之覆,示解牛之全,命以十年业成相证。甫五年,余先以近业寄公,则已鼓掌大快,遍赞交知,称为速化。是时,弇州王公与公论文,慨我明斯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⑨

丁丑,即万历五年(1577),俞安期与汪道昆“纳交”,在后者鼓励下,文艺大进;至万历十年

①[美]奥尔波特:《人格:正常与反常》引沃纳·沃尔夫语,[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②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45页。

③徐中行:《滇南闻于鳞讣哭之四首》其一,徐中行著、王群粟点校:《徐中行集·天目先生集》(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④欧大任:《欧虞部集·文集》(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

⑤吴国伦:《甌甑洞续稿》(卷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2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7-8页。

⑥俞安期:《蓼蓼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页。

⑦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一百〇四),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163页。

⑧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七十七),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587页。

⑨俞安期:《蓼蓼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2-13页。

(1582)年,已甚有成就。据此,王世贞发表“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的时间,当不晚于万历十年。

关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除后七子外,时人也多是认可的。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陈懿典《郭张虚诗稿序》云:

永陵中,李历城、王娄东六七人执牛耳,而号海内,海内靡然向风。当其时,分宜秉重,自以为作者。所推穀毗陵、晋江,皆一时名流,而竟不能夺王、李六七人之气,而拔其帜。^①

“不能夺王、李六七人之气,而拔其帜”,说明后七子郎署文人已真正成为文权操控者。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图撰《槐野先生存笥稿序》亦云:

盖尝考览国初时台阁文体,类尚明析畅达,而其为诗亦冲夷俊美,颇借途宋人。而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率乞灵秦、汉人口吻,与词林争胜。考其所作,大都刻画皮貌,剽窃影响,竞相涂抹,渐入支离,即所称海内七子,非不高自夸诩,然自历下、瑯琊而外,孰能为词坛执牛耳者。^②

“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即谓文权在郎署。王世贞、李攀龙等以“文必先秦、两汉”为策略,与馆阁争雄,虽不免流于“刻画皮貌,剽窃影响,竞相涂抹,渐入支离”,但“为词坛执牛耳者”,依然当之无愧。天启二年(1622)进士黄道周《姚文毅公集》序所言也大致如此:“方嘉靖之初年,议臣鸷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历下为之归墟。”^③当时于慎行对“今世言文章者,多谓此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说,虽不以为然,谓之“此何说也”^④,但也从反面透露出,文归郎署已为多数时人所接受。

“嘉靖之初年”是“文章之道,散于曹僚”之时,非李、王“为之归墟”之时,即文学权力尚未复归后七子郎署文人。后七子中,李攀龙最早进士登第,时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世贞继之,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他们结盟立派崛起于文坛,尚需时日;二人为文章之“归墟”,当在此以后。李攀龙倡为五子诗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⑤,可视作“五子中兴”的起点,故文权复归于后七子郎署文人应在此后。陈继儒《上王凤洲》称“国朝二百年以来,文章之权,先生擅之”^⑥,以此断限,当时值嘉、隆之际。四库馆臣也如是说:

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⑦

显然,正德、嘉靖之间,就李梦阳、何景明而言;嘉靖、隆庆之间,就李攀龙、王世贞而论。“夺长沙之坛坫”,标志着当时主流文风已经由“诸调杂兴”,重新趋于“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文权已为李攀龙、王世贞为核心的后七子郎署文人所把控,即明代主流文学权力复归于郎署。

①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35页。

②王维楨:《槐野先生存笥稿》(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③黄道周撰,翟奎凤等整理:《黄道周集》(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73页。

④于慎行:《海岳山房存稿序》,郭造卿:《海岳山房存稿》(卷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5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135页。

⑤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628页。

⑥王心湛校勘:《陈眉公全集》,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第193页。

⑦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30页。

四、余论

强调李攀龙的结盟意识,并不等于否认后七子其他郎署文人结盟意识的存在,更不否认其结盟意识也有不同程度的主盟意识。王世贞的主盟意识,并不亚于李攀龙,不过碍于后者的巨大影响力,他多有意识地克抑。即便如此,有时二人也难免因此产生摩擦。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某日,王世贞客于李攀龙家中,李“因酒踞”,谓王世贞曰:“夫天地偶,而物无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王世贞“瞪目直视之,不答”。李攀龙意识到自己出言不妥,遽言道:“吾失言。吾失言。向者言老聃耳。”^①王世贞《艺苑卮言》于此也有记录,但言语稍异:“于鳞一日酒间,顾余而笑曰:‘世固无无偶者,有仲尼,则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摄之,遽曰:‘吾误矣。有仲尼,则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诞如此。”^②表面上看是为凸显李攀龙之“任诞”,实则是王抗议李以孔子自居,而把自己比作为孔子《春秋》作传的左丘明。“向者言老聃耳”,是王世贞认许的,其欲与李攀龙并驾齐驱之意,不自“是日”起,由其“相与狎主齐盟”的言论,即不难得知。吴国伦被李攀龙认定有“境外交”,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李维桢“海内荐绅、布衣、学士羔雁玄纁,不东走弇州,则西走甌瓠矣”^③之语就道出了实情。这一说法,也为一些后人所认同。钱谦益称:“海内噉名之士,不东走弇山,则西走下雒。”^④《明史》本传也称,吴氏“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⑤当然,李攀龙以外的后七子郎署文人的结盟意识,更多地还是犹如宗臣,甘愿奉李攀龙为盟主,欲与诸子“共励斯盟”。

本文所以集中凸显李攀龙的主盟意识,主要因其萌发时间早于其他后七子郎署文人,而且程度相对更强烈。在此意识的支配下,他率先将志同道合者集结于自己周围,并在他们的辅助下,结社立派,激发出显著的群体效应,引领了当时主流文风,促成文学权力复归郎署。就此而言,李攀龙不仅为后七子之盟主,也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坛宗主。当然,文权复归郎署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仅为其一,其作用主要在于导夫先路。李攀龙过世后,郎署文学能风靡文坛至万历年间,主要凭借其培养的第二代盟主王世贞及其他盟员的实力。因此,不可过分夸大李攀龙结盟意识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李攀龙推出的文学主张,较之李、何等人更加狭隘、偏激,因而难免重蹈前者覆辙。尽管后来王世贞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调整,但为时已晚,故只能无奈地慨叹道:“(文权)今当复归台阁矣!”^⑥与王世贞同时的刘凤,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然议者谓伤于袭哉。其所铸词,必范之古,是矣。然途辙尺寸,一将循其故步,是犹且不可,而况抵掌谈说,若优笑之为乎?”^⑦“范古”没错,反对六朝绮靡也没错,错就错在“循其故步”上。从这一角度说,李攀龙尽管煞费苦心,但也未能为明代文学的发展寻觅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①王世贞:《书与于鳞论诗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七),《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245页。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4页。

③李维桢:《河南左参政吴公舒恭人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31页。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3页。

⑤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9页。

⑥王世贞:《答郭太史美命》,《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八),《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74页。

⑦刘凤:《送魏季朗序》,《刘子威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1-32页。

尽管如此,从宏观上看,李攀龙结盟意识下的文权复归郎署,是明代文学权力流转的重要一环。明代主流文学之权力,先由馆阁移至以李、何为中心的郎署,后又逐渐分化、流失,导致嘉靖初的“诸调杂兴”,六朝派、中晚唐派、唐宋派顺势而生,流弊也随之而来。为补纠文弊,李攀龙首发其难,重申李、何文学主张,结盟立派,扭转了文风,促成文学权力复归郎署;因其开创的后七子派及其末流的学古不善,重蹈前者覆辙,万历中后期文学权力又由郎署开始外流,流向山林、市井,对促成晚明文学的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①万历年间所谓的文权“复归台阁”,也与此甚有关联。因此,以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为观照中心,可为考察明后期文学生态环境、文学发展演化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Panlong's Consciousness of Alliance and Literary Power Returning to Langshu in the Ming Dynasty

Xue 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Li Panlong had a strong sense of alliance, which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his consciousness for being an alliance leader consciously. Dominated by 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Li Panlong gathered like-minded writers actively, formed an alliance and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as the leader of the alliance. This was largely achieved by advocating and implementing more narrow and radical literary ideas than those of Qianqizi (the former seven writers) and carrying out stricter code of conduct.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members, Li Panlong's action evoked a wide literary sensation. As a consequence,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changed. Meanwhile, the literary power of which Qianqizi had been deprived returned to Langshu. Thus, in a sense, a deep study of Li Panlong's consciousness of alliance can not only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literary-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 a relatively unique perspective for a macro grasp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of alliance; leader of an alliance; literary power; power returning to Langshu

责任编辑:徐道春

^①薛泉:《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恩格斯的矛盾观及当代意蕴^{*①}

徐国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恩格斯的矛盾观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唯物辩证法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的矛盾观深刻阐述了矛盾的理论定位、重要作用、形式表现、基本属性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内容丰富严整、逻辑清晰缜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立足崭新时代境域,重温闪耀着这位伟大革命导师辩证智慧的矛盾论述,内在把握和深入领会其核心要旨与本真精神,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矛盾观、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以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开创新局、夺取伟大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恩格斯;矛盾观;历史渊源;内容建构;当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67-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8

任何一种真正伟大的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能够经受住历史烈火的淬炼和时间风沙的洗礼,并且能够在历史长河的反复淘洗中越发显现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真理性,从而散发出超越时间限度和跨越空间距离的耀眼光辉。坦率地说,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矛盾观就是一种凭借其自身内在力量在历史的种种考验与诘难中越发印证其真理性 and 价值性的伟大思想。尽管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已有百年之远,但他的矛盾观却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终结而一同退场,反倒在大浪淘沙中越发闪耀出自身的真理性光辉,特别是他关于矛盾的理论定位、重要作用、形式表现、基本属性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性阐释与言说依旧在场,对于作为此在性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瞬息万变、风云诡异”的时代,对于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开创新局、取得伟大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矛盾观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人类思想史上的任何一种伟大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亦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创造物,而是有其生成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基础。恩格斯的矛盾观也不例外,它是在承继黑格尔矛盾观的合理内核、延展马克思矛盾观的精髓要义以及在回应现实问题中出场的。

(一)历史渊源:汲取古希腊和黑格尔矛盾观的有益营养

* 收稿日期:2020-10-20

作者简介:徐国亮(1963—),男,山东莱州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家教、家风历史嬗变及现代转换研究”(17AKS022)、2019年度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五四以来中国家风家德百年变迁实证研究”(19RWZD11)的阶段性成果。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古希腊时期,被世人喻为“七贤”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在谈到自然和艺术时就曾指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東西,它是用对立的東西制造出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東西,例如将雌雄相配,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艺术也是这样做的,显然是模仿自然。”在谈到生死问题时,他又指出:“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①赫拉克利特这些隐喻性的命题无疑以原始朴素的形式呈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以及相互转化的基本命意,从而深入到了矛盾之本质性。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对其保有肯定和信任的态度,他说,在古希腊哲学那里,矛盾观是以原始朴素的形式出场的,这种原始朴素的正确矛盾观最先是由赫拉克利特充分表达出来的。^②有“古代黑格尔”之称的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不仅提出了“矛盾”范畴,认为矛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乃是一种对立,而且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矛盾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相较于以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朴素矛盾观而言,黑格尔对矛盾问题的论述则更加精密和系统。首先,黑格尔以内反身的姿态批判了那种“主张没有矛盾”和“矛盾是不可想象的、无法思维”的错误观点,澄明了矛盾的客观性。他指出,满足于“熟知”状态的人们总是习惯于先把矛盾从事物本身中人为地外在剥离出去,就此武断地宣布事物本身并无矛盾存在,并且在他们看来矛盾乃是一种“偶然的存 在”,是“暂时性的病态的发作”。但实际上,就连普通的经验本身都已证明,“至少有许多矛盾的事物、矛盾的结构等等是存在着的,它们的矛盾不仅包含在外在思维反思中,而且也包含在它们自身中”^③。显然,在黑格尔看来矛盾本身具有客观性,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其次,黑格尔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他说,“一切事物自身都是矛盾的”,“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特性”,“在一切种类的对象里,在一切的表象,概念和理念里,均可发现矛盾”^④。再次,黑格尔肯定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他指出,矛盾不仅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⑤,而且是它自己运动的原则。对于这一点,列宁曾以幽默的口吻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指出:“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 abstru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⑥最后,黑格尔还批评了那种不包含任何差别的抽象同一性,指出任何事物都必然经过“同一、差异、对立、矛盾”四个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创见性地表述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渗透转化的思想。客观地说,尽管这些思想本身建筑在唯心主义的地基之上,但它无疑是黑格尔哲学中“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与其“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所在,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恩格斯矛盾观得以现实出场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理论核心:承继马克思矛盾观的精髓要义

作为一个以改变世界为己任而有别于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满足于纯粹思辨的哲学家,马克思以“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特有批判姿态,在解构黑格尔、回击蒲鲁东以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过程中,阐述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矛盾思想,这些饱含辩证智慧的矛盾思想构成了恩格斯矛盾观现实出场的理论资源。其一,马克思在解构黑格尔唯心矛盾观的过程中给出了矛盾观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并没有以一种简单化的极端姿态对黑格尔的矛盾观加以全盘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③[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66页。

④[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2页。

⑤[德]黑格尔:《逻辑学》(下),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66页。

⑥《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

拒绝。马克思首先肯定地指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开始,并且强调这种对立。”^①然而,马克思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矛盾观却是倒立着的,因为他把现象的矛盾武断地理解为绝对理念的外化,为此必须要把筑基于唯心主义之上的矛盾观倒立过来建筑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其二,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两种不同意义的矛盾:一种是两个极端相通的矛盾,如人的男性与女性、磁的北极与南极的矛盾;另一种是两个极端的矛盾,如人与非人、极与非极的矛盾,其中前者表现为相互吸引,是同一本质的矛盾,后者则呈现为彼此排斥,是非同一本质的矛盾。^②其三,马克思界说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在马克思看来,矛盾双方的联系不是一种外在的偶然的关联,而是内在的、本质的联系,那种将矛盾双方的联系外在化理解的做法是肤浅的,缺乏真理性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发挥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矛盾双方的“积极的相互关系”乃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相互转化,不过这种转化却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对决战的渴望”^③。其四,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矛盾观。对于蒲鲁东在误读黑格尔矛盾观基础上将矛盾歪曲为“好的”“坏的”两个方面的做法,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他从来没有超脱出简单的正题与反题的桎梏,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才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针对蒲鲁东试图以取消矛盾来解决矛盾的武断做法,马克思指出矛盾是无法取消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④。其五,马克思还运用矛盾分析法具体而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货币的产生、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解决等。列宁曾对此作过精辟概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⑤总之,马克思的这些富有创见性的矛盾观点为恩格斯矛盾观的形成贡献了不可多得理论伟力,构成恩格斯矛盾观现实出场的理论基础。

(三)现实土壤:回应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时代的口号,是表征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呼声。任何一种真正深入到历史之本质性的思想理论成果都是对时代问题的自觉聆听与回应。恩格斯的矛盾观也是在深刻洞悉以及反思性地回应当时历史语境下社会存在矛盾问题的过程中生成的,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的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一方面,随着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等推广和应用,原先效率低下的手工工具和生产方式被逐渐取代,并由此催生一些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部门,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提高。“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四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5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5页。

⑤《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

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①但工业革命在促进生产力解放与飞跃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工业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部门使得集中化、规模化的生产逐渐成为总的发展趋势,先前以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场制度为核心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分化和劳资矛盾。与此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引发了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由一国波及到多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显现。在社会领域,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利益分化使得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即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和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并使得二者之间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流,社会矛盾就此日益激化。在政治领域,工业革命为无产阶级突破行会束缚走向自由联合斗争创造条件的同时,也间接地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两方面的内在叠加下,欧洲各国先后爆发了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工人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这些工人运动无疑给资产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无产阶级对自身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和不可调和性缺乏必要的认知,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以致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因遭到镇压而失败。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恩格斯认识到革命实践迫切需要正确矛盾观的指导。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狂飙突进,一些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夹缝中生存的小资产者为了从尴尬的“中间地带”摆脱出来,试图以反思性的姿态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良方”。但这些“良方”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隐蔽的妥协性,甚至掺杂某些错误和歪曲的成分,这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矛盾思想的阐发。例如,蒲鲁东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自以为是地认为经济范畴本身都有好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交融构成经济范畴内部矛盾。因此,必须要保有好的方面,消解坏的方面。但实际上,这样一来非但无法解决矛盾,反倒使范畴本身成为一种“脚手架”,进而丧失其内在生命力。杜林似乎更进一步,他以一种极端化的姿态直接否定现实矛盾的存在,认为矛盾是背理的顶点,现实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存在。毋庸置疑,这些理论上的曲解与杂声也迫使恩格斯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回应。

二、恩格斯矛盾观的内容建构

恩格斯的矛盾观,包括对矛盾的理论定位、重要作用、形式表现、基本属性等诸多方面的深刻阐述,是一个内容丰富严整、逻辑清晰缜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早在发出“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呼喊的黑格尔那里就曾以思辨的形式得到了初步表达。马克思以反身性的批判姿态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的基础上也曾作出了深刻阐述。然而,他们的论述虽已明确触及这些规律,但尚未以系统化、形态化的表述将它们界说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第一次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加以了解和把握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辩证法的规律可归结为三个:“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②当然,恩格斯不仅第一次对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界说,更重要的是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部分加以了解和把握,从而明确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定位。诚然,以命题的形式第一次将对立统一界定为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的是列宁^①,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将这一命题的基本命意第一次呈现出来的无疑是恩格斯。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曾指出,拉萨尔之所以误解自己就在于他仅仅抓住字面表述而没有领会字里行间的意旨。^②如果我们仅以有无明确的命题描述作为唯一判据,无疑会错失恩格斯表述中“字里行间”的意思,进而重蹈拉萨尔的覆辙。倘若我们不再以一种外在旁观式的姿态执拗于“字眼”,而以一种内在参与式姿态领会恩格斯表述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就不难发现他在不同场合的表述已明显呈现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部分或核心的基本命意。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明确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矛盾辩证法”,认为这种所谓的矛盾辩证法在自古希腊起直到当时为止的哲学中起着不可忽略的重大作用,而且在阐述质量互变以及否定之否定等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时始终以矛盾规律为基础。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在历数自然科学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意味着人们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原先那种两极对立不可调和与化解的认知被彻底突破,取而代之的是两极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不仅反复强调“矛盾引起发展”,而且指出就连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这些范畴本身也是以矛盾为基础的,两极对立的范畴“一极已经作为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到达一定点一极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这些前进着的对立中展开的”^③。此外,恩格斯晚年在给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一封信中谈及黑格尔哲学时,更是指出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部分“本质论”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④,而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界说。总之,在恩格斯那里,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定位就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部分”。

(二)是否承认矛盾是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分歧所在

恩格斯认为,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歧,但是否承认矛盾是二者最为根本的分歧所在。

关于形而上学,恩格斯将其思维方式界定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指出它的公式乃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并强调坚持“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例如,正和负是绝对对立、彼此排斥而不可能渗透转化的两个端项,原因与结果也是不可互换位置而始终处于僵硬的对立状态,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可信,因为它符合所谓的常识,但它一旦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即“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⑤。这是因为,它局限于孤立、静止看待事物,遗忘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形而上学思维遗忘事物的联系与运动发展而以孤立、静止的眼光审视事物时,实际上它就彻底否定了矛盾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把事物看做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彼此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⑥与之相反,在唯物辩证法的视界中,任何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都是矛盾的存

①《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5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在。例如,在辩证法视域中,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既是自身又不是自身,因为每一瞬间它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有细胞的死亡也有细胞的新生,有营养的摄入亦有杂物的泄出,即使是像正和负这样对立两极也总是相互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也不是形而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原因,在彼时彼地就成为结果。

恩格斯在深入批判杜林否定矛盾的错误做法时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恩格斯指出,当我们以辩证思维从事物的运动、变化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我们就会立刻陷入矛盾,因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而杜林拒绝承认事物的运动以及背后所体现的矛盾,他的这一思想来源正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①。

恩格斯将研究目光聚焦于自然界、试图揭橥自然界中的辩证运动时,又以“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阐述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矛盾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它只承认“非此即彼”,即认为一事物不可能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例如,对于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个始源性范畴,形而上学认为它们永远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规定:“偶然的東西怎么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极端化的姿态彻底否定了对立统一规律,从而陷入矛盾的本真之维被遮蔽的误区。与之相反,唯物辩证法“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线,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②。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承认事物对立的一面,又承认二者同一性的一面,从而始终承认矛盾的存在。总之,在恩格斯看来,是否承认矛盾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三)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

首先,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深度揭橥出矛盾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杜林认为,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存在,硬要从现实中外在地引申出真实矛盾的做法是背理的。这样一来,杜林就对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加以彻底拒绝,从而陷入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被遮蔽的误区。针对杜林这样一种有意取消矛盾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武断做法,恩格斯不仅一针见血地揭示其荒谬之处,还进一步从对自然、数学、社会、思维等领域矛盾的揭示说明矛盾的普遍性。一是通过论述自然物质的可分性和有机物的生死两个方面阐明矛盾的普遍性。对于前者,恩格斯指出,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归根结底它不过是无穷分割系列中的“关节点”,并没有以其所谓的不可入性终结这个系列。在最本然的意义上来说,物质的可分性乃是因为物质的微观领域中矛盾的存在;对于后者,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有机物的生死乃是对立统一的,“不断地新陈代谢”与“自我更新”就是最好的表征。二是揭示了数学领域中的矛盾普遍性。在恩格斯看来,抽象的数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于矛盾的存在,如一和多并不是两个彼此相外在的异己概念,而是内在关联、相互渗透的,一包含于多就像多包含于一样。在看似毫无乐趣的数学运算之间也存在矛盾。数学中的乘除、加减以及乘方开方等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看似无聊的数字游戏,而是一种包含矛盾的互逆运算。正运算和逆运算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也就是说逆运算可变为正运算,正运算也可转化为逆运算。三是阐明了社会领域中的矛盾。早在与马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1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7、471页。

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就已经触及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晚年恩格斯又借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的“总的结果”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就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样一种矛盾是“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四是界说了思维领域中的矛盾。恩格斯既反对单纯的“认识有限”说,也反对偏执的“终极真理”说,而是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②。这样一来,恩格斯就从人的认识问题上界说了思维领域中“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总之,恩格斯通过对自然、数学、社会、思维等各个领域中的矛盾的描述,深刻揭示出矛盾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从而宣布了那种试图遮蔽乃至消解矛盾普遍性做法的破产。

其次,恩格斯在对矛盾的普遍性加以系统界说的基础上深入阐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在恩格斯看来,矛盾既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不同事物间以及在同一事物不同发展阶段上矛盾又各有其特点,从而是不同的。一方面,恩格斯详尽而具体地考察自然领域矛盾的特殊性。他在总结研究当时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自然界的基本运动形式诠释为以纯粹位置移动为本质规定的机械运动、呈现物体分子状态的变化的物理运动、从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去说明元素属性的化学运动以及具有生命形态的生物运动。而这些运动形式之间都有其自身独具的矛盾属性,在机械运动中矛盾表现为力的相互作用,在物理运动中矛盾体现为电的两极以及不同分子间的相互吸引与排斥,在化学运动中矛盾则是原子的化合与分解,在生物运动中矛盾则展开为同化与异化以及有机体机体的生灭等。另一方面,恩格斯区分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矛盾。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从事生产,动物则限于采集,因而绝不能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来,更不能将自然界的矛盾与人类社会矛盾同质化,如果把人类社会的矛盾归属到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之下,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其结果只能是不同领域矛盾的混淆和歪曲。此外,恩格斯还阐发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矛盾的思想。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不仅与自然界相比具有不同的矛盾,而且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具有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的社会关系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生存斗争这一动物性的印记。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社会独具的新矛盾。

(四)矛盾双方“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

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界说并非始于恩格斯^③,但对其加以系统化言说的却无疑是恩格斯。在扬弃黑格尔矛盾观和承继马克思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关界说的基础上,恩格斯立足于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最新成就,从不同维度对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等作出了严谨而深刻的阐明。

首先,恩格斯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阐明了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恩格斯指出,既然矛盾是对立两极的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④。这种相互作用至少包含两层意涵:一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在恩格斯看来,无论是作为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必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③如赫拉克利特就以朴素的形式表达过这一点。他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然和偶然”“原因和结果”“现象与本质”还是物理学中的“正极与负极”“正电与负电”都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必然丧失其存在。在谈及被牛顿、康德、黑格尔等人未能充分澄明的“吸引与排斥”的关系时,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吸引和排斥像正和负一样是不可分的”,那种“只以吸引为基础的物质理论是错误的,不充分的,片面的”^①。二是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在恩格斯看来,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赖、相互依存,而且相互分离和相互排斥。在谈到自然科学中的矛盾问题时,恩格斯指出,就是在气体中也存在着分子的排斥,而在更稀薄的离散的物质中,例如在慧尾中,更是如此,在那里排斥甚至以巨大的力起着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这里特别反对那种把相互作用完全等同于矛盾斗争性的做法,他指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那种仅仅想把矛盾双方关系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值得商榷的”^②。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对立两极“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在研究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时,恩格斯指出,这些形形色色的运动形式之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就在于它们是相互转化的。“物体的机械运动可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反过来又可以产生热和电,而以电为中介又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③针对赫尔姆霍茨等人将其发现的能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定义为“力的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的做法,恩格斯又批评道,这些定义表征的仅仅是能量守恒的量的方面,未能呈现出能量转化的质的方面,因而是消极的,远远不够的。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将这一规律表述为“能量守恒与转化规律”。这无疑体现出恩格斯关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是有条件的,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达到极端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恩格斯以物理学中的“吸引和排斥”为例指出,“物质的离散有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限,吸引就转变成排斥;反之,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限,排斥就转变成吸引”^④。在思维领域,他又以真理与谬误两个范畴的关系为例,表述真理与谬误同其他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但这种转化的现实发生只有超出真理与谬误相互依存的“有限领域”才是可能的。

最后,恩格斯阐明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及其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恩格斯极力反对那种将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割裂开来乃至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做法。他指出,虽然二者是两种相反的属性,但二者彼此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矛盾的同一性以斗争性为前提,没有斗争性也就没有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也就无从谈起。“所有的两极对立,……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⑤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矛盾双方“暂时平衡”和“不断斗争”的统一是事物运动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恩格斯指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⑥。如果地球上的空气、水分始终处于一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0-4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0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2页。

不平衡、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地球上的生命就难以取得其生存的可能性条件;如果天然的生态环境总是变化无常,人们亦难以生活生产。与此同时,恩格斯指出,事物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立面的斗争、分化与冲突,达尔文的进化论呈现的从一个单纯的细胞开始,经过遗传与适应不断斗争最终进化到人的历程就是最好的证明。总之,事物的运动发展既离不开矛盾的同一体性亦离不开矛盾的斗争性,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恩格斯矛盾观的当代意蕴

恩格斯在矛盾问题上作出的这些极其精辟的重要论述,逻辑清晰、思想深刻,富有创见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唯物辩证法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构件。尽管作为此在性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与恩格斯当年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现实境况相差甚远,但恩格斯的矛盾观并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一同消解,反倒依旧在场,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矛盾观、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以及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化危为机、开创新局、夺取伟大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矛盾观提供思想参照

以“第二小提琴手”谦称的恩格斯在以反身性的批判姿态扬弃黑格尔矛盾观和以谦卑的姿态内在体认与把握马克思矛盾观精髓要义的基础上,就矛盾的理论定位、重要作用、表现形式与基本属性作出系统而深刻的阐发,并从不同维度详细界说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以及对立两极的相互转化等,从而勾勒出一幅较为系统化、形态化的矛盾理论图景。这些思想深刻而富有创见性的重要论述和论断,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矛盾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坐标参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对矛盾思想的阐发和运用,在不同场合作出一系列有关矛盾的精彩论述。在谈到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问题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只有学习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尤其是矛盾论的方法,才能领悟和捕捉到这一方法的内在精髓,从而使外在的抽象理论内化为个人的思维方式,亦即真正形成辩证思维能力。这一论述无疑凸显了恩格斯将对立统一规律认作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的思想。不仅如此,习近平同志还强调:“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①“承认矛盾”蕴含着矛盾客观性的观点;“分析矛盾”则体现矛盾特殊性及其与矛盾普遍性相统一的观点;“解决矛盾”体现了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相统一的关系;“抓关键、找重点”体现了主要矛盾与主要方面的观点。这些看似简短的表述不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将恩格斯辩证矛盾观的主要内容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来。此外,习近平同志还深刻阐述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思想。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危与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②,危与机“相互依赖、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并可以相互转化的”^③观点表达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思想。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矛盾观的形成特别是新时代“矛盾论”的形成无疑承继和延展了恩格斯的矛盾观。

(二)为新时代坚持进行伟大斗争提供理论依据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7页。

②习近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人民日报》2020年4月2日。

③徐国亮:《中华民族化危为机的辩证意蕴与价值表征》,《人民论坛》2020年第9期。

恩格斯对于矛盾客观性的揭示、对于矛盾特殊性的详细阐述以及对于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作用的深刻界说,为我们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首先,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①从时域来看,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摩擦与交锋日益加剧,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肆意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试图通过贸易战来实现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图,从而使得彼此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和明朗化。从境遇来看,我们正遭遇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危机,一系列新的矛盾也由之产生,特别是西方各国处心积虑地将问题甩锅中国,并明目张胆地歪曲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日益紧张。从语境来看,伴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语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我们无法回避更无法逃脱,只能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意志,敢于出击、勇涉险滩,与之进行伟大斗争。

其次,矛盾的斗争性与发扬斗争精神内在契合。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恩格斯认为矛盾就是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其中前者体现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一面,是相对的;后者则呈现的是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一面,是绝对的,并且二者之中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是新事物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因为任何新事物要想从旧有的母体中脱胎出来,就必须借助矛盾的斗争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保持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敢于同各种矛盾作斗争,解决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道路。归根结底,这样一种为新事物发展开辟道路的斗争精神和矛盾斗争性存在某种亲缘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矛盾斗争性的“精神形态”。换言之,“矛盾的斗争性、新事物的产生发展规律与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为发扬斗争精神提供理论指导”^②。

最后,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掌握斗争艺术,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矛盾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在斗争中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可能千篇一律。如果在斗争过程中不讲求斗争方法和斗争艺术,将同一方法不加反思地直接运用于不同矛盾,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甚至可能会激化矛盾。在这一事关能否有效化解矛盾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注重方法策略,“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③。

(三)为正确认识分析解决社会矛盾提供方法论

恩格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和矛盾相互转化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首先,要直面矛盾、承认矛盾。在恩格斯看来,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社会领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沈元军:《从四个角度深入理解如何发扬斗争精神》,http://dangjian.gmw.cn/2019-09/19/content_33171693.htm。

③人民日报评论员:《掌握斗争规律 讲求斗争方法》,《人民日报》2019年9月6日。

域亦或是思维领域都存在着矛盾。这一认识的方法论意涵就是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才能“打开工作局面突破口”^①。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越加尖锐与复杂。从时间维度上看,既有过去长期存在而遗留下来的顽瘴痼疾,也有在解决旧有矛盾的过程中衍生出的新问题;从空间维度上看,既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国内矛盾,也有国家利益争夺与外交关系上的摩擦等国际矛盾。这些矛盾的出现和存在有其自身的客观性,是无法绕开和躲避的。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和正视这些矛盾,这便是对待矛盾的最本然的正确姿态,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如果我们“对矛盾熟视无睹,甚至回避、掩饰矛盾,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坐看矛盾恶性转化,那就会积重难返,最后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②。

其次,要善于考量矛盾、分析矛盾。在恩格斯看来,矛盾既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同时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矛盾也是不同的,因而矛盾又具有特殊性。这就启示我们要善于考量矛盾、分析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矛盾的特殊性质,厘清不同矛盾的重要地位和地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抓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③。如果对矛盾不加区分,“胡子眉毛一把抓”,是解决不了矛盾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不仅明确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④,而且提出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化解产能过剩、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净化党内风气,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并重必须打通堵点和补齐短板,等等,都指向的是不同领域中的深层次矛盾。

最后,要坚决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直面矛盾是勇气、解决矛盾是关键。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面对矛盾,我们决不能敷衍、推脱、上交,更不能扩大矛盾,要坚持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什么矛盾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矛盾,什么矛盾棘手就着力攻克什么矛盾。具体而言,当前我们既要把目光聚焦于社会主要矛盾,努力解决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要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注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与摩擦,着力解决好国家间的矛盾,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道路。

总之,尽管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已有百年之远,但他的矛盾观却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反倒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依旧在场,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意义。因此,立足新的时代境域,重新回到恩格斯的矛盾观,呈现其本身真面貌,并将其内在价值开掘出来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既是我们对伟大革命导师的最好怀念,也是我们当代的责任和使命。

①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②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③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④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Engels' View of Contradi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Xu Guolia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Engels' view of contradi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rxism, especiall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hich hold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Engels' view of contradiction profoundly expounds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important function, form expression and basic attributes of contradiction, which i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rich and defined contents and neat and meticulous logic. To start from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new era, review the exposition on contradiction shining with the wisdom of dialectic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teacher, and grasp internally and understand more deeply its core message and true spirit will have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to set up a correct view of contradiction, properly handl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to win a decisive victory in the struggle to turn risks into opportunities in the big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Key words: Engels; view of contradiction; historical origin; content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王盛辉

世界历史理论开辟的世界统一性^{*①}

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开辟了全新的世界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与宗教,其世界统一性法则都是主观统一性。与其相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是人类生存世界本身的辩证统一,世界是因被纳入到人的实践(否定性)中生成的历史世界而统一。这种新的统一性有两个环节,一是资本逻辑主宰世界的全球化,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二是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解放自我的斗争——共产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

关键词: 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同一性;全球化;无产阶级;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79-13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09

以往的世界统一性是抽象统一性,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则揭示出属人的世界统一性:人既是世界的创造者,又是世界的占有者,世界统一于人。这种统一性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资产阶级借助资本的力量对孤立的碎片化的世界的否定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的世界统一性;其二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否定形成新的世界统一性——共产主义。”^②无产阶级通过对给定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否定实现对世界的占有,这种否定敞开了真正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面对的世界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世界,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诞生是由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带来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世界历史)。分散的孤立的大陆与散落在地球各个角落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在资本的自我实现中被结成一个统一的共在的全球化的世界。世界历史是对孤立的分散的生存状态否定的结果,正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开启了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本质是资本的贪婪)将分散的地球整合在一起,各地域、各民族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世界的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这个历史世界是辩证的存在,其统一是辩证的统一(否定之否定),然而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进入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体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球化的否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否定性力量,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全球统治地位的否定,是世界历史的必然前途。在资产阶级全球化之后,世界历史将统一于世界历史的自我否定(否定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世界统一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否定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

* 收稿日期:2020-10-20

作者简介:王清涛(1966—),男,山东诸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起点研究”(19CXSJ34)的阶段性成果。

②王清涛:《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显然,马克思的世界统一性已经不再是旧哲学的抽象统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呈现了新的世界统一性图像。马克思揭示的世界统一性,其本质是世界归谁占有的问题,是哪个阶级占有世界的问题。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才具有占有世界的合法性。

一、批判黑格尔意识统一性,确立世界统一性的唯物论基础

马克思之前的全部哲学与宗教,其世界统一性都是抽象统一,尽管巴门尼德“物的共同体”理论是物自身的统一,但此时的古希腊哲学尚未从混沌不清的自然哲学跃进到理智清明的精神哲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旧唯物主义虽然也讲物的统一,但因其形而上学本质必然归结于抽象统一。“近现代关于自然的构想造成了心灵与有机体、理性与自然的分裂”^②,至康德,其全部“感性杂多”都统一于“我”,与感性世界相对立的“物自体”本身因思维主体而生(在此,作者猜想海德格尔对“无”的体味应该深受康德的启发),因而同样统一于“我”。无论是物自身的统一还是抽象统一都处在时间之外,都是非历史的。黑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将“自然”“历史”“精神”描述为一个过程,这一世界历史理论带来了新的世界统一性问题。因而,在此将对以往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分析的焦点集中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上。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③黑格尔从辩证法出发开创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自然触及世界统一性问题,但在黑格尔哲学范围内,他永远也无法真正回答世界统一性的本质。黑格尔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④。世界历史是理性即绝对精神,通过异化,不断否定从而回复自身的过程,但这种理论运动并非现实中的人的实践活动,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有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世界历史是由理性掌控,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是“精神”的舞台,是“精神”的财产和实现的场合,世界历史是“理性的狡计”,精神“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⑤,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将其“潜在性”变成现实性的过程。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一以思想取代历史,把绝对精神看作是历史演进动力的错误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会导致彻底的唯心主义:“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活动。”^⑥在此,马克思已揭示出黑格尔哲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②王增福:《经验的概念化与第二自然——麦克道尔论心灵与世界关系的文本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0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510页。

精神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本性,黑格尔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必然带来世界的抽象统一,正像在基督教教义中所讲的那样,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当然统一于上帝,绝对精神创造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当然统一于绝对精神。

其次,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精神”。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体现“民族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是通过不同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来的,“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各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①。黑格尔以自由为标尺对人类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认为东方世界是最落后的。而在希腊那里,黑格尔看到了人类文明的童年,日耳曼人才真正明白了自由是精神的本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揭开了意识进步的几个环节,在《小逻辑》中讲,人类哲学史上的成就都被扬弃在其哲学中,成为其集大成哲学的一个环节。因而,从黑格尔的视角来讲,人类历史因意识发展几个环节寻求确定性而呈现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与意识发展的诸环节相一致,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就是说,哲学自身的进步与历史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黑格尔由此得出了历史的进步取决于意识的进步的结论。因而,马克思批判道:“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②。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肯定中包含着深刻的批判,黑格尔颠倒了历史与哲学的关系,用精神自身的发展环节规定历史的进步过程,用精神中的统一性来确立历史统一性。

最后,黑格尔以辩证法思想构架其世界历史理论。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本质过程中揭开了黑格尔辩证法与历史的关系。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述了他的绝对精神到历史世界的过渡。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的逻辑,认为是人类的历史世界产生出历史世界的绝对精神。在这里,如果将黑格尔比作柏拉图,那马克思就是亚里士多德。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黑格尔哲学是认识论哲学,黑格尔所聚焦的是社会历史与绝对精神之间的认识论关系,即黑格尔所讲的“精神现象”关系。从《精神现象学》来说,黑格尔的逻辑是走得通的,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事实上是超越了《精神现象学》所设定的问题域,不再满足于纯粹意识的内在性,而是借鉴宗教,走向现实,通过精神、意志、法等环节,将概念与现实相联系,由此得出国家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是合理的等错误结论。马克思将黑格尔的逻辑根本颠倒过来,认为不是精神决定世界、决定人类历史,而是人类历史决定精神。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由抽象精神到人类历史的辩证法本质,指出:“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③在这

①[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的逻辑是正向反对的。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面临着两个存在:一个是意识,一个是意识的对象。他要把意识和意识指谓的对象统一起来,他讲意识的确定性,即感性确定性、理性确定性等几个环节。在这几个环节的确定性过程中,黑格尔用辩证法最终实现了以意识自身的同一取代人和世界的统一,即“自己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面对着正相反的逻辑,那就是黑格尔从意识自身的确定性出发,确立意识与法、国家、道德等直接的同一,这个过程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过程,而是一个实现(现实的异化)过程。黑格尔用他的认识论辩证法规定这个过程,显然是走不通的。黑格尔的认识论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实践领域中的解释力捉襟见肘,凸显其唯心主义局限。“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①马克思在此揭露了黑格尔意识到实践的唯心辩证法本质。非常明显,黑格尔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思对实践逻辑的解释就是一种新的神学,“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②。黑格尔这个过程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已。因此,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开辟的世界统一性归根结底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统一。黑格尔的认识论哲学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其历史哲学是其哲学的归宿和目的。其哲学的革命之处,就是哲学最终要走向现实世界,走向人类历史,但恰恰在其最为革命的地方,黑格尔的哲学力不从心。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黑格尔的方法是“一种自己承认只是‘从无通过无到无’的方法”^③,要走出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误区,必须用事实、用真实的人类历史来解释这些。

黑格尔忽视了现实的人类实践的作用,对于历史的演进,他只是用纯粹概念进行逻辑推演,“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④。“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⑤。逻辑范畴演绎的世界历史是编织的花朵,最终必然沦为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将世界的统一性归之于绝对精神。马克思也正是在对黑格尔意识统一性的批判中,确立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唯物论基础。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0页。

二、批判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倾向,确立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

由于认识不到人的决定性作用,旧唯物主义没有形成真正的世界统一性,他们最多只是将世界视为一台组合在一起的机器,依靠神秘的第一推动力来维持这台机器的运转。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抽象的历史主体,在此基础上又冲破了旧唯物主义的藩篱,指出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世界属于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批判旧唯物主义感性、直观的世界观,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①马克思在此把批判矛头直指“感性确定性”,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感性确定性”是意识自身的确定性,因而取消了意识意谓对象的独立性。费尔巴哈在意识与对象的关系中虽然恢复了对对象的首要地位,但他也同时取消了意识的能动性,将意识视为对意谓对象的被动反映。对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整个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社会制度都是人活动和创造的结果,费尔巴哈当然看不到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上帝),“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②。这段话有三重含义,首先,全部感性世界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结果,都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其次,这种感性活动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人改变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改变了自身,“劳动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劳动不但否定给定的自然存在,而且否定人的(或智人的)天性本身,即否定人的(或智人的)‘自然位置’”^③;最后,人的否定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展开人类历史。马克思在此已经给其未来世界历史勾勒了一个大致轮廓。那么,如何才能从费尔巴哈的旧哲学中走出来,让真正现实的历史主体现身呢?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人本哲学的局限,指出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出发,才能找到真正的历史主体。“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④确立感性存在者对意识的优先地位还只是哲学革命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找到现实的矛盾,从现实的矛盾批判入手,找到宗教异化的根源。揭示现实的矛盾,必须切入现实的经济关系,“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

③王清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存解读及其当代价值》,《东岳论丛》2019年第6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4页。

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①。人类历史的主体(创造感性世界的上帝)是不会主动现身的,是社会矛盾逼迫他们觉醒,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社会基本矛盾不但是宗教异化的根源,而且是迫使工人阶级肩负起创造和统治社会历史重任的动力。

所谓真正的历史主体,是指人创造世界历史,“人是世界的主宰,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世界。”^②这种创造是一个过程,即人对给定存在的否定,给定存在(肯定)——人的实践(否定)——世界历史(否定之否定),此即历史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别的,就是将世界视为人的世界,整个世界不再是形而上学视野中的静止的世界,而是一种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位一体的结构,是一个自身运动着的过程”^③。历史辩证法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世界历史理论的世界统一性并非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而是辩证法道成肉身的过程。辩证法的发展历经了一个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抽象的绝对精神的思辨运动,而早期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所继承的辩证法虽然注入了人的现实活动的内容,但从根本来说仍然是抽象的辩证法,是抽象主体(预设的非历史的人的抽象本质)的自我运动。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与其实现形式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赋予现实社会中的内在矛盾以历史主体。^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的转变,他从人的现实的物质性活动中考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而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与人的本质)之间却包含着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完成。在世界历史理论中,马克思找到了作为辩证法的肯定存在、否定存在和否定之否定存在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历史主体,世界历史成为辩证法的实体形式。这种统一性是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历史成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其根本内容就是指向人类历史的辩证过程。在马克思那里,没有抽象的人类历史,有的只是具体的人类历史,也没有抽象的哲学统一性,有的只是无产阶级的世界统一性。至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世界统一性法则初见端倪。其一,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世界统一于人;其二,世界统一性的本质是世界归谁占有的问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604页。

②王清涛:《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③王清涛:《辩证唯物主义追溯及其本义研究》,《理论学刊》2019年第6期。

④历史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决定力量。在历史主体问题上,只有按照马克思哲学自身的逻辑才能洞悉历史主体之所指。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揭开了历史主体的秘密,在《历史哲学》的英译本序言中,译者一语道破了黑格尔历史观与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之间的区别,“一切有希望的思想家们从‘历史’中所认识的那种文明化进程,其目的和范围便是取得‘合理的自由’”(〔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英译者序第3页)。在哲学家那里,历史应该是文明的进程,而文明进程的本质是合乎理性的自由的实现。黑格尔认为,成熟的历史无非是有着清晰民族意识的历史活动,人应当是历史逻辑本身,而不是历史学家在历史那里“发现”历史逻辑,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凯撒,凯撒应该是发现历史逻辑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历史,就在于发现这个精神,只有发现这个精神,人才能是真正的人,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个“理性”早期以神的形式出现,“‘神圣的智慧’就是‘理性’”。然而,黑格尔对上帝的统治并不满足,按照上帝旨意从事活动而形成的世界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式,“仅仅叫人信仰于一个鉴临的‘奴斯’,或者‘神意’,那是不够的”(〔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4页),精神不应归属于上帝,它要返回到自身,上帝从根本来讲是自我意识,作为世界主宰的应该是人类理性。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是意识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意识的最高的统一,就是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历史主体,而马克思则将绝对精神替换为现实的人,历史主体在哲学上被揭示为三个环节,即:作为人类主宰的上帝——作为历史主体的绝对精神——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这三个环节是正反合的过程。

三、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历史(全球化):世界统一于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自性)

世界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化)是现实世界统一性的第一种形式,全球一体化本质是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

(一)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缔造了世界历史

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打开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和市场,资本主义必然向全球扩张,最终形成世界市场,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②。资产阶级打造了统一的商品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互相促进,“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④。世界历史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掠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⑤。

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创造主体。科学技术“魔杖”和资本的“撒旦”珠联璧合,资产阶级正是借助于这两大法宝创造了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在促进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生产力基础,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普遍的社会交往,使孤立闭塞的民族卷入世界历史的大潮中,拓宽了人们的活动空间,缩短了人们彼此之间联系的时间和距离。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⑥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市场之中,这使得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间的依赖和联系加深,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按照资本逻辑运动,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是其开创的全球一体化的统治者。

(二)资产阶级的世界统一于商品(货币、资本)的占有

资产阶级将世界整合为一个商品支配的世界,商品经济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一切物的“物性”发生了根本改变,曾经隶属于上帝的一切,现在都属于资产阶级,“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变成货币的关系。”^①商品经济否定了一切物的自然存在形式,一切自然物都被赋予了价值形式,一切自然物都被纳入到商品经济所凝结成的商品世界中,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商品世界,世界的根本属性发生了转化。商品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世界性的,世界历史真正允诺了商品的普遍性,是商品的本性决定了“世界的历史”是“世界历史”。而在商品世界中将一切存在联系起来的东西却不是商品自身,而是商品被赋予的价值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真正揭开了世界一体化——统治世界的物质根源。“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②任何商品的价值形成之所以隶属于整个商品世界,根源在于创造商品的劳动必然是普遍的,“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做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③。

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世界市场依据世界范围内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社会大分工,而且这一全球社会大分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强化了世界统一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不同地域之所以可以进行专业化生产,就是因为世界市场使社会分工普遍化,“美国南部各州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④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全球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世界市场击碎了人类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全球按照商品经济规律重新进行产业布局。黑格尔将世界统一在一起的是绝对精神,这无疑是虚幻的,马克思却找到了世界统一起来的真正现实的力量,即商品,商品的生产、价格、消费等都是世界性的,都受制于经济规律的制约,都像服从自然法则一样服从于经济规律。世界由上帝支配,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转换为由商品(以及由商品内在矛盾发展起来的货币、资本)支配。

然而这些商品(货币、资本)运动规律从本质来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看不见的手由看得见的手(人的实践活动)来决定,商品关系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规律是人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服从于人,人是这一规律的最后决定者。因此,马克思揭示的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在向黑格尔的意识同一性(世界是意识的作品)致敬,人的劳动、改造世界的否定性实践活动是世界统一性的真正现实力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⑤也就是说,表面看来世界统一于商品,并受制于其背后的价值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讲这种统一性的决定力量是人。

(三)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整个世界沦为资产阶级发财的工具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出,人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应当统一于人。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中,人如同服从自然规律一样服从于价值规律,人的主体性根本丧失。

全球化是资产阶级的自我实现和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世界历史为前提,资产阶级只有在全球化中才能生存,这是由商品的本性决定的,“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①。资产阶级开拓的全球化是资产阶级的天堂,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天堂。相反,全人类都被卷入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体系中,“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②。全球化将资产阶级的剥削之手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整个世界都成为资产阶级谋利的手段。“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尽管资产阶级是全球一体化的创造者,并且占有自己亲手缔造的世界,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是盲目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服从于资本逻辑,是资本逻辑主宰世界,马克思之前的全部学者都没有能够揭开这一秘密,这“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④。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这一力量实现自我的手段,是资本复制自身的需要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牟利的动机造就了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无产阶级被物化,资产阶级同样被物化,资产阶级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是被动的,不是自觉的,浑然不知他们要创造世界历史,资产阶级是资本逻辑的奴隶。在全球化过程中,资产阶级被异化为“利维坦”。

四、无产阶级创造的世界历史(共产主义):世界统一于无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

全球化是资产阶级实现自我的过程,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应当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是这个新世界的创造者和所有人。资产阶级全球化是资产阶级缔造的,但在本质上,创造这个世界的看得见的手是无产阶级的双手。这个世界统一于商品经济规律,统一于价值,统一于创造价值的劳动,统一于无产阶级的双手。因而,资产阶级统一性是虚假的世界统一性。

(一)无产阶级占有世界:一种新的统一性

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新的世界统一性是一致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实践创造了这个世界,无产阶级占有这个世界具有天然合法性。但现实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不但不属于无产阶级,反而成为与其相反对的异己力量,“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⑤。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建构新的全球一体化,这个全球一体化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这个全球化过程就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意志将世界统一起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页。

整个给定的资产阶级全球化是无产阶级所要否定的对象,因而共产主义开辟的世界统一性是:资产阶级全球化(正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实践(反题)——共产主义(合题)。新的世界统一性就是无产阶级占有世界的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这种占有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占有权的剥夺,而且是对创造的肯定——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无产阶级的创造总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着,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与世界的真正统一。这仿佛又回到了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世界是意识的作品,而无产阶级首次意识到世界是自己的作品,不过是自己的异化的作品。全球化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而对无产阶级来说是陌生的。无产阶级要从这种异化中走出来,将无产阶级与世界的关系转变为真正的现实关系,无产阶级要将自己从世界的旧有联系中,即从世界的旧的统一性中解放出来,确立一种新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世界统一性,即将世界统一于自己的意志之下。这个世界因无产阶级意志的存在而存在,即什么时候无产阶级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就存在。反之,就丧失。

(二)否定旧的世界统一性是无产阶级的本质

无产阶级是作为世界的否定力量登场的。否定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否定旧的世界统一性的现实力量。

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从人(原子)对必然性的反抗来展开人的辩证法,但因为此时的人还只是抽象的原子,马克思还未真正走入历史。无论是德谟克利特还是伊壁鸠鲁,其原子都在时间(历史)之外,解放都是抽象原子自身的属性,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也不是历史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进入历史的尝试,但不彻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设定的人的抽象本质出发,揭示人的本质在现实的生存活动中被否定(异化)。按照辩证法的理解,本来应该是人对存在物(感性自然)的否定,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则是人自身的否定。然而,这种与辩证法相悖的否定本身正是无产阶级成长过程的必然环节。如果没有这个否定环节,无产阶级就永远不会将使自己异化的社会制度作为被否定的对象,永远不会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当然也不能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时的马克思正为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完成最后一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定了批判(否定)理论的基本结构,即:人的本质(正题)——现实的人本质的异化(反题)——人本质的复归(合题)。这是一个辩证法框架,这个框架成为此后马克思确立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结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是真正历史的开始。对此,恩格斯讲,马克思的“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揭示出世界统一于人的历史性(否定性)活动,自在自然被改造为社会关系结构,历史在人的感性实践中统一起来。此后,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的根本规定被揭示为财产关系,在财产关系上又拓展出多种其他关系。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深入分析之后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本质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却不是世界的主人,反而是世界的奴隶),因此资本主义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取代。此时,马克思正式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从而形成资本生产的全球体系。然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一旦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立刻转换为世界性的矛盾,在这一矛盾激化至不可缓和的地步之后,共产主义时代就来临了。无产阶级就是否定资产阶级世界统一性的现实力量。

(三)世界历史只能由无产阶级完成

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却与世界历史的趋势背道而驰。黑格尔早就揭示了世界历史的自由趋向,马克思将西方近代哲学对自由的执着追求落实在社会历史领域,并且断言:“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然而,资本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却以人的异化为代价。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世界历史,全球化也不是人类对世界的真正占有,因而所形成的统一性是一种虚假的世界统一性,世界历史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全球一体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将不可遏止,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消灭这种社会结构(全球化)的行动,这种行动必然借助于资本(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本身,“资本不可遏止的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从而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②。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推翻这个社会制度的历史主体,这个社会历史主体与整个旧世界相对立,“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③。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毋庸争辩的事实,它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宣告:“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④

黑格尔的自由体现于意识与其作品的同一中,而马克思的自由则通过人与世界的真正统一来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是人对世界的真正占有,给人类带来的只是灾难,“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⑤。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人是世界的创造者,但资产阶级创造的全球一体化世界导致的结局则是人对世界的破坏,这种破坏根源于资产阶级对利益无止境的攫取,最终必然导致人与世界的紧张与冲突,我们所说的环境问题、粮食问题、核威慑、生化武器威慑等等,都只是人与世界冲突的表现形式。

要实现人与世界真正统一的根本要求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占有世界,因为无产阶级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创造者,因而完成世界统一性的真正的历史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对世界的完全占有,最终实现人的解放。推翻不合理的占有方式,全面占有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历史使命落在了无产阶级肩上,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3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页。

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①,实现对世界的真正占有。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世界历史才算真正完成。资产阶级在其解放道路上是自我解放。每一个资产阶级都为了自己的私利寻求自我解放,最终促成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其自我解放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自由为代价的,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要解放全人类,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根本不同。

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开辟的世界统一性的理论贡献和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终将迎来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统一性的虚假性,并指明了无产阶级对世界的占有是世界统一性的真正形式。当前,正确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开辟的世界统一性,对于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把握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开启了真正的世界统一性,这一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首先,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马克思确立了世界历史的物质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②。世界历史产生于生产社会化和交往普遍化,并非像黑格尔所说的由人的自我意识所决定。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③。马克思的世界统一性是现实的、实证的。

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推翻了黑格尔狭隘的民族主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普遍的交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发达的生产方式、普遍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就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进入相互影响的状态,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统一在世界历史之中,世界历史的形成将驱使所有国家和民族进入文明世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④但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却宣扬世界历史由绝对精神主宰,而只有日耳曼人才通过绝对宗教环节实现了对绝对精神的占有,因而所谓的绝对精神对世界历史的支配,本质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历史的主宰,最终必然导致欧洲文明中心论,即西方占有世界的合法性。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根本跨越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唤醒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就了旧世界的真正批判者。取消了黑格尔的文化逻辑,也就取消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统一性的合法性。

最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包含着对人的解放的现实追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论述无产阶级占有世界的理论根源和现实道路,阐明了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占有世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人的解放相同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相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0页。

离散的个体为什么会和如何形成资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前提和基础上无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如何最终形成的特定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着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双重内容,这二者是统一的,是同一个主题的两重形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伟大成果,它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当代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资产阶级全球化与共产主义的中介环节。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的是,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它不专属于某个阶级,世界要从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取消单极化的世界结构,将世界的占有权归还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交还给其人民手中,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将人类前途命运的主导权交还给各国、各族人民,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占有,这种统一性是向无产阶级对世界全面占有过渡的中介环节。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的到来意味着雅尔塔体系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要勇敢地拿起自己的武器,从西方世界中夺回世界的领导权。我们要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认清世界的格局与形式,促成世界人民以新的方式占有世界,打造一种新的世界统一性。当今,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资本主义世界的铁幕徐徐落下,西方伸入我国社会主义机体中的触手被纷纷斩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明显,面对这一新的后雅尔塔体系格局,我们应未雨绸缪,对外积极巩固和拓展“一带一路”打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对内练好内功,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Unity of the World Created by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ang Qingt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has created a completely new unity of the world.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is the proletariat occup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religions before Marx,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the world was a subjective unity. On the contrary,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s a dialectical unity about the human world. The world is a unity because it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historical world which is generated in the practice (negativity) of humanity. This new unification includes two links: one is the globalized world dominated by capital logic with bourgeois occupation of this world as its essence. The other is the proletariat struggle for its own emancipation from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with proletariat occupation of this world as its essenc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the unity of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the proletariat; communism

责任编辑:王盛辉

以场景红利为核心提升城市品质^{*①}

魏建

(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城市品质是城市所具有的产生美的享受与愉悦的特质,品质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芝加哥大学克拉克教授等所提出的场景理论,从消费角度将场景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强调场景所包含的价值观对于人口聚集与城市魅力的意义。以场景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场景红利”概念,以场景红利刻画场景正向循环的内在逻辑。城市发展,不仅要构造场景,更要明确场景红利的生成、扩大与分享逻辑,这样才能使城市品质的提升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

关键词: 城市品质;场景理论;场景红利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092-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10

品质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累积矛盾的关键。2014年,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城市的功能要从适应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逐步向满足居民生活的舒适性要求、营造良好的文化和生态氛围方向拓展。然而,对于城市品质的理解还存在着差异,对于提升城市品质的有效路径还没有形成共识。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强调文化支撑城市发展的理念,重视文化在城市创新和发展中的先导作用,为城市品质提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场景红利”概念,并强调基于场景红利形成价值循环是塑造场景的关键所在。这就为如何提升城市品质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路径,为推动我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引。

一、城市品质

(一)城市品质的内涵

城市品质是城市所具有的产生美的享受与愉悦的特质。如果说“安逸、宁静”是乡村的代名词,那么城市自诞生以来就以“繁华、热闹”为特征。这种繁华和热闹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其背后体现着城市对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吸引能力以及对人群的吸引能力。因此,可以用是否具有活力和吸引力来衡量城市品质的高低。从这一视角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城市品质的内涵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工业化之初,最具活力的城市是能够兴建各类工厂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兴起首先满足的是生产的需求而非居住的需求。因此,临河、靠近原材料产地等便于生产的条件就成为城市活力的重要条件,各项基础设施也均为生产而修建。工业

* 收稿日期:2020-12-25

作者简介:魏建(1969—),男,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是在山东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山东城市品质提升行动推进路径研究”(19BZBJ15)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提炼而来,在此感谢课题组的辛苦努力。

化的兴起使大量农村人口和移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剧增,人口密度大大提高,但产业工人作为生产要素仅能满足最低限度的衣、食需求。而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当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时,创新所需的人才便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关键要素。因此,最具活力的城市成为各类人才尤其是高新技术人才优先选择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且这一趋势正在逐渐加强进而成为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能否满足居民的高水平需求逐步成为当前衡量城市品质的标准。

城市是如何满足居民的高水平需求呢?早期关于城市品质的研究就是从居民居住体验角度展开的。Ullman 认为,美国各地人口增长的差异源自“令人愉悦的设施”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优势,“令人愉悦的设施”使居民的舒适性体验得到极大提升,拥有这些设施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也随之提升。^①对城市舒适性的偏好是影响个人和家庭选择居住地的核心因素。^{②③}随着人们从最低限度的衣、食等低层次需求逐步向认知、审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精神需求的发展,这些要求对城市功能也相应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顺利升级以满足不断提高的功能需求。Power 指出,城市舒适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是一种无法市场化的本地特色,这种特色能够吸引对此有着认同和向往群体来此居住和工作。^④Kamp 等从宜居性、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城市环境品质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的环境品质分别吸引了不同人群。^⑤此后,许多学者对不同类型的舒适性设施进行研究。Clark 分析了湿度、温度、河流、山川等自然因素和图书馆、博物馆、星巴克等休闲设施对于城市品质的作用^⑥,Glaeser 等分析了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等硬件的作用^⑦,Brueckner 等讨论了历史文化名胜^⑧,西尔与克拉克研究了社会包容程度、居民价值观等软性因素的作用^⑨。这些分析展现出城市品质的多重构成因素,也体现出城市品质的复杂性。实际上,城市作为人群聚集的有机体,居民数量远非乡村可以比拟。从几十万的小城市到百万、千万的大型、超大型城市,数量巨大的城市居民在性别、民族、受教育水平、财富、文化、工作、偏好等方面又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需求。所以,城市要实现持续发展,不仅要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更要基于不断更新的需求同步甚至超前更新功能。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来说,更应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首要位置,城市品质的高低更应以居民的物质、精神需求能否得到充分满足作为衡量指标。

(二)城市品质的提升路径

对于如何提升城市品质,主要是通过城市品质的评价研究来发现城市品质的短板,进而提出提升的对策建议。关于城市品质评价,当前主要有两类做法。第一类是将城市视为有机整体,评价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王国新从城市生活品质出发,认为影响居民生活品质的因素包含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环境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等五个方面。^⑩胡迎春和曹大贵则将城市品质

①Ullman E. L., “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 *Geographical Review*, Vol.44, No.1, 1954, pp. 119-132.

②Roback, Jennifer, “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0, No.6, 1982, pp. 1257-1278.

③Graves P. E., “Migration and Climate”,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20, No.2, 1980, pp. 227-237.

④Power T. M., *Economic Pursuit of Quality*, New York: M. E. Sharpe, 2013.

⑤Kamp I. V., Leidelmeijer K., Marsman G., et al.,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Human Well-being: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Demarcation Of Concepts”,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Vol.65, No.1, 2003, pp. 1-18.

⑥Clark T. N.,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JAI Boston; Elsevier, 2004.

⑦Glaeser E. L., Kolko J., Saiz A.,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1, No.1, 2001, pp. 27-50.

⑧Brueckner J. K., Thisse J. F., Zenou Y., “Why is Central Paris Rich and Downtown Detroit Poor? An Amenity-based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 No.1, 1999, pp. 91-107.

⑨[加拿大]西尔、[美]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祁述裕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⑩王国新:《城市生活品质客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运用》,《经济地理》2009年第9期。

分解为城市品位和城市质量两个方面,城市品位由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城市特色、城市精神和城市文脉构成,城市质量则由自然品质、经济品质、社会品质、文化品质和管理品质构成。^①此后研究的思路大多相似,均认为城市品质是品味和质量的统一,主要采用城市经济水平、生态环境、城市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一系列评价指标进行衡量,但在具体指标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别。^{②③④}第二类研究着重分析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认为城市公共空间集中展示了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和城市治理水平等多个方面,是构成和体现城市品质的核心所在。城市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城市的开放空间,包含城市广场、道路、公园、步行街、商业中心、娱乐设施等多种建筑物和构筑物。^⑤周进等构造了城市公共空间评价指标体系,在支持实用活动、形象认知和运行保障三个二级指标下设置了自然度、可使用性等11个三级指标。^⑥国家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和一些科研院所也开展了一系列对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评价工作。

上述各类研究都通过运用所开发的城市品质衡量指标体系,对世界、中国的城市进行计量评价,并按照评价结果进行排名,进而给出一些提升城市品质的政策建议。还有研究进一步分析排名背后的影响因素,更细致地讨论影响城市品质的原因,给出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城市品质包括较为发达的经济、便捷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包容的氛围等众多方面的内容,但经济基础、城市设施、生态环境和城市文化等如何相互耦合、共同促进城市品质形成与提升的内在逻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城市品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共识。这也导致各类城市品质评价指标体系更多的是将内容简单罗列,而底层逻辑尚未建立起来。

二、场景理论

在20世纪中期,以雅各布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多样性、差异化、创造性是城市生命力的体现,而并非建筑物的简单堆砌,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街区是成功城市的微观单元。^⑦到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力资本越发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要素。Florida认为城市创意阶层所产生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社区繁荣和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⑧自此,研究创意阶层的需求以及空间分布成为城市经济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随后,芝加哥大学Clark教授提出了场景理论,深入讨论了“创意人群是如何被吸引、集聚并持续影响着周围人群”这一问题。^⑨场景理论认为城市是由一个个基本单元构成,这些基本单元不是单纯的建筑物或者人群,而是由特定的建筑、人群以及活动构成的有机场景。不同的城市场景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又吸引着不同的群体前来进行文化实践,进而生成了每一个场景的独有魅力,促进了城市繁荣。因此,场景理论可以作为分析、解释不同类型人群聚集、产业兴衰的基本理论,而这一理论与从生产或投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区别。

(一)从消费视角理解城市

①胡迎春、曹大贵:《南京提升城市品质战略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9年第6期。

②贺建军、张维维:《我国县域城市品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际测度》,《现代城市研究》2014年第2期。

③徐林、曹红华:《城市品质: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种匡正》,《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④顾维中、王渭:《“品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标准化》2017年第3期。

⑤罗小龙、许璐:《城市品质:城市规划的新焦点与新探索》,《规划师》2017年第11期。

⑥周进、黄建中:《城市公共空间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建筑师》2003年第3期。

⑦[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⑧Florida R.,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City & Community*, No.2, 2003, pp. 2-19.

⑨Silver D., Clark T. N., Rothfield L., *A Theory of Scenes*, Chicago: The Press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场景理论并不拒绝从生产和人力资本视角理解城市,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消费的维度。城市为居民提供了各项消费资源,这些消费资源的可得性、舒适性是场景理论关注的重点。人们在消费舒适物时,通常会获得来自相关商品和服务的愉悦。这种愉悦真实存在,但又难以量化,与生产性的“资本”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对一个城市来说,咖啡馆、文化名胜、五星级宾馆、美术馆、健康步道等均不是必需的资源 and 设施。没有这些舒适物,城市也可以运行下去,但是有了它们之后,这个城市就有了与众不同之处。这些舒适物,既包括由政府部门提供的道路、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也包括由企业提供的购物商场、休闲娱乐设施等等。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公共性,居民凭借市民身份或在城市居住即可获取这些消费资源^①,且在消费过程中不发生消费品所有权的转移;二是不可移动性,居民自发前往各类设施所在地才能进行消费,空间距离是影响其消费可得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舒适物及与其相关的服务,不但具有消费交易价值,而且能够提供愉悦体验,具有很高的正外部性,这种愉悦所产生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一消费行为本身的市场价值。^②

场景理论将舒适物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舒适物,包括河流、山川^③、温度、降雨^④;(2)人造舒适物,包括历史建筑、商业综合体、食品超市、景观基础设施等^⑤;(3)社会舒适物,包括居民构成、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犯罪率等等^⑥。这些舒适物构成了城市内部的不同功能区域。在各种功能区域内,舒适物、人群类型、所从事的活动差异极大,由这些要素综合起来构成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也必然千差万别,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场景,场景因此成为理解城市发展规律的基本单元。^⑦

(二)场景文化特征的重要性

场景所蕴含的文化和美学特征是城市品质的具体体现。城市品质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抽象是因为很难找出确切的词语形容一个城市给人带来的感受;具体则指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中,会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城市的建筑、景观等硬件之中,更体现在大街小巷所蕴含的风土人情与烟火气息之中。这两者的结合便是场景,可以说场景即是城市品质特征的集中体现。场景理论从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3个主维度、15个子维度对场景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刻画,并使用这个指标体系对一些城市进行了调查和实证对比分析,从中总结和发现城市发展规律。

场景理论指出,场景中的文化特征会带来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喜欢该种文化特征的人群加入其中,进而实现场景范围和影响力的双重扩大。不同文化特征构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成为吸引更多同类人群聚集的磁石,这个循环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微观基础。例如北京的南锣鼓巷从纯粹的居民区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特色商业街区,在其发展过程既离不开吹糖人、绘制脸谱、画鼻烟壶等极具老北京色彩的经营者,也离不开具有历史意义的院落、寺庙、园林、古树和山石碑刻^⑧。再如北京706青年空间最初是由高校在校生创立的,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咖啡馆、

①王宁:《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②Clark T. N.,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JAI Boston: Elsevier, 2004.

③Brueckner J. K., Thisse J. F., Zenou Y., “Why is Central Paris Rich and Downtown Detroit Poor? An Amenity-based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 No.1, 1999, pp. 91-107.

④Clark T. N.,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JAI Boston: Elsevier, 2004.

⑤Glaeser E. L., Kolko J., Saiz A.,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1, No.1, 2001, pp. 27-50.

⑥Glaeser E. L., Kolko J., Saiz A.,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1, No.1, 2001, pp. 27-50.

⑦[美]特里·N·克拉克:《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李鹭译,《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

⑧刘东超:《场景理论视角上的南锣鼓巷》,《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

公共客厅、图书馆、小剧场等多种设施,每周举办10场以上的读书会、电影会、公共讲座、桌上游戏等各类活动的年轻人的共创空间。^①对比南锣鼓巷与706青年空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场景中蕴含的文化特征正是该场景区别于其他场景的核心所在。特有的文化特征使得进入场景的人可以感受到鲜活又与众不同的文化力量,而这种文化特征又赋予了场景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该场景能够持续吸引目标人群,在空间范围、人群数量、物质设施、活动类型以及文化特征等多个维度上不断发展壮大。

(三)场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适合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的场景能够有力促进城市经济的创新发展。城市可以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机制提高生产效率。^②这三种机制在工作与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对话、交流和考察,在交流中分享知识与经验正是开放、包容的城市场景的日常景象。这类场景从设施、活动等多个层面,促使身处其中的企业、劳动者之间相互影响,交流的频率与深度远胜于远离该场景的群体,进而生发出创新与创业,构成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更重要的是,这种近距离的分享、匹配与学习,不但能促进创新的发展,也能够使企业和劳动者不断积累相应的技术能力与信息资源,由此不断推动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持续上升,进而以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快的速度创造财富,由此实现城市的创新发展。

其次,优质的场景可以吸引人口,特别是人才流入。当前许多城市通过多种途径吸引人口流入,对于年轻、高学历的人群更是采取优先落户、住房补贴、提供人才公寓等一系列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这些年轻而有才华的人才,既是“创意阶层”的中间力量,更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生力军。一个城市的场景,既包括与工作机会密切相关的场景,也包括与休闲娱乐相关的场景,这些都成为吸引年轻人选择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找到一份好工作”是目标,那么,除了工作本身的价值外,城市所拥有的优质场景则成为界定什么是“好工作”的关键要素。在一个拥有引人入胜、开放包容场景的城市中获得一份工作,不仅有着能够与志趣相投者进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在工作之余能够方便地开展休闲娱乐活动。这与在缺少类似场景城市从事的“同样一份工作”相比,就是“好工作”。因此,一个城市拥有的优质场景数量越多,市民享受到的生产生活质量越高,而城市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

第三,优质场景可以实现与美好生活需求的最优匹配。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美好生活”需求如何满足呢?这种美好生活的需求既包括更稳定的工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好的教育、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舒适的居住条件等“硬需要”,也包括对民主、法治、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的“软需要”。不论是“硬需要”还是“软需要”,对人民需要的满足均体现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都要依靠一定建筑空间以及相应的服务活动得以实现。例如,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既需要有更舒适便捷的医院、又要有更先进准确的医疗设备,还需要有更高水平的医护人员,更离不开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这便构成了一个优质的医疗服务场景。可以说从场景理论的视角分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分析人民群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与生活的情境。对这些问题的准确把握是建设满足“美好生活”需

^①盖琪:《场景理论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东岳论丛》2017年第7期。

^②Duranton G., Puga D.,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No.4, 2003, pp. 2063-2117.

要场景的重要前提。

三、场景红利

既然场景在城市生活中如此重要,那么如何依据场景理论建设优质场景?在场景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将场景对人群产生的正向影响称为“场景红利”。场景的产生、壮大进而对场景内外人群产生影响的过程就是场景红利的产生与放大的变化过程。场景红利是否存在、能否放大是打造优质场景的关键所在。

(一)什么是“场景红利”

城市中各项活动均存在于一定的场景之中,但在不同场景中产生的效果存在极大差异。对比想象一下,科技企业 A 坐落在一个靠近前沿思想、鼓励创新和自我表达而非墨守成规的场景中,而科技企业 B 则与之相反。那么,对于一个需要创新创意来提升竞争力的公司 C 来说,如果与科技企业 A 比邻而居,则相当于租用了这个区域的特质。在 A 企业所在的场景中,鼓励人们摆脱传统的刻板成见,勇于展现自我,有着对即兴创作和冒险行为的开放态度,有着对创新想法不一定能顺利实现的谅解,还拥有更多的分享新观点、新技术的机会。场景的这些文化和价值观构成了创新的“肥沃”土壤,大大提高了新进入者 C 企业的创新可能性及成功概率。相反,如果 C 企业选择落户于 B 企业所在的区域,则难以形成创新,即使有所创新,其成功概率也不高。优秀场景能够赋予工作、生活其中的主体更高的成功概率、更多的认同、更丰厚的收益,这些更高的成功概率、更多的认同、更丰厚的收益就是“场景红利”。

(二)场景红利如何产生

进一步比较上文提到的北京南锣鼓巷和 706 青年空间两个案例,可以大致总结出场景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路径,从中发现场景红利的产生与放大的逻辑进路,进而为场景的打造提供参考。

首先,场景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间作为载体。物理空间是场景形成的物质基础,它容纳进入场景的人群,使其能够持续、稳定地开展分享、交流活动。该物理空间的位置、面积与特征,一方面取决于场景蕴含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取决于使用人群的需求与物质基础,因此不同类型的场景差异极大。例如,南锣鼓巷作为传统文化与商业结合的场景,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棋盘式”的胡同格局、典型的传统建筑形态、内含齐白石和茅盾故居等一系列名胜古迹,均为形成南锣鼓巷的特色传统文化特质奠定了物质基础;各色时尚小店、酒吧、咖啡馆以及餐厅等商家和各类游客则构成了商业场景。商家、商品、休憩消费以及鳞次栉比的四合院,共同叠加构成了典型的单层建筑结构的、传统文化特色突出的商业街区场景。而 706 青年空间则与之不同,作为半盈利性质的年轻人交流休闲的场所,选址在高校众多的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的居民小区内,经租赁民宅改造而成。相比于南锣鼓巷,706 青年空间对于物理空间的要求相对较低,更多地考虑了参与人群的物质基础而非载体蕴含的文化特征。

其次,需要核心人物和焦点活动。核心人物是场景的灵魂,他们在场景内从事的活动直接决定了场景的功能,他们的信念与坚持是场景从产生到逐步放大的核心因素。可以说,核心人物的价值观和文化特质是场景的价值观和文化特质的直接来源,核心人物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活动展现和传递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看法,其他人群不但可以参与这些活动甚至可以深入其中成为新的核心人物。如果没有核心人物,场景就是孤立的建筑物,人群行走在这些建筑物中,可以欣赏建筑物艺术,但是无法体会出场景内在的生命力,就如同参观古代文明遗址,只有展示而没有互

动,可以在短时间内观摩但无法长期浸润其中,因此难以对其他人群产生强烈的影响。并且对于越依赖创造性和共享性的场景来说,核心人物的作用越大。在706青年空间的案例中,希望分享交流的年轻人是整个场景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只要核心人物存在,更换物理空间对于场景的存在与否影响则极其微弱。

第三,对于场景价值观和文化特质的认同。场景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场景功能、参与人群的不断增多以及场景影响力不断变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入群体对于场景价值观的认同以及与原有核心群体的有效互动是场景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场景价值观的认同,一方面说明新进入者是受到吸引自愿加入该场景的,另一方面也要求新进入者在加入场景后能够维护、弘扬场景的价值观和文化特质,这使得场景的扩大具有了俱乐部的一些特征。新进入者与原有核心群体的有效互动则是场景价值观传递以及场景红利产生与放大的关键环节。

以创新创业场景为例,新进入群体之所以被吸引加入场景之中,就是因为原有核心群体所展现出来的创新行为模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场景内的群体相对于场景外的群体存在认知优势,场景红利存在于该创新创业场景之中。新进入群体在加入场景后,只有通过原有群体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才能够模仿习得存在于场景中的特定创新行为模式。在这一分享、学习过程中,双方对于创新行为的认知得到加深,而经过内化后的再次交流又使得双方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一特定创新行为模式,这将促进场景中所有群体的创新活动得到升级,场景内群体相对于场景外群体的认知优势得到加深,场景红利由此放大。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场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确定发展区域——焦点人物与焦点事件产生场景红利——吸引新群体加入——新旧群体产生互动——场景红利放大——场景中各要素价值上升——场景扩大”的正向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场景红利的分享与放大是场景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场景能否长期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一旦场景红利消失殆尽,场景便不再具有吸引力。

(三)场景正向循环的脆弱性

许多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建设了各类商业街区、特色旅游景区、创新创业孵化器等各类功能区域,这些功能区域都可以视为是意图营造某种类型的场景、实现场景红利的有效释放与放大,但许多区域并未达到预先设想的发展目标,甚至陷入了门庭冷落、难以为继的困境,原因何在?其中关键就在于场景的正向循环过程具有脆弱性,场景营造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影响因素导致场景红利无法顺利生成和放大。

首先,场景的物理空间不能满足场景发展的需要。例如,对于需要人流支撑的商业类场景,如选址在人迹罕至、交通不便的区域,其发展必然受限。其次,场景的营造缺乏核心人物。这种情况在政府创建的科技产业园中屡见不鲜,由于政府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无法有效把握市场趋势、实现资源整合,导致出现“重项目、轻人才”“重数量、轻质量”“有企业、无产业”等现象。科技产业园的核心人物是企业家,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因此缺乏企业家主体的科技产业园区,即使是给予扶持政策也难以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再次,核心人物无法促使场景产生场景红利。核心人物在场景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发展初期是促生场景红利的核心因素。以文化旅游场景为例,由于该场景需要依托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成熟的产业运营方式,具有艺术性、民族性、多样性和互动性等特征,对核心人物的要求较高。核心人物如果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场景可能被设计成“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四不像”,无法产生预期的美感和愉悦体验,也就难以吸引观光游览者;而如果缺乏产业运营经验,场景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基础,但基础设施、餐饮住宿服务的落后也会使该场景“抱着金碗讨饭吃”,难以产生场景红利。第四,新加

入群体造成原有场景的价值观和文化特质发生偏离。部分创意场景在初期发展状况良好,依靠独特的文化或艺术特质吸引各种艺术家或创意人群加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出于商业化的目的提高租金或增加商业活动,导致场景中无法负担租金的创意人群不断离开而能够承受租金商业化群体入驻,导致场景“变味”。这种后进者驱逐先进者的现象是许多优质场景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顺利生成场景红利,就要采取各种方式推动和巩固场景的正向循环,克服场景正向循环的脆弱性。

四、构造场景、释放场景红利,提升城市品质

场景理论作为一种对城市功能区域进行整体分析的方法,可为城市品质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以场景理论指导我国城市发展,既可以促进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又能做到与人民美好生活密切联系,还能承担起文化复兴与传承的历史重任,从而解决中国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功能,而对城市的社会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美学培育功能以及市民需求重视不足等问题,扭转城市千城一面、活力不足的现状。

(一)以场景为核心构建城市的功能单元

提升城市品质,即是有意识地构建能够持续产生场景红利的优质场景。首先,按照城市基本功能规划确定不同类型场景的位置。当前城市的现状与发展主要依据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种规划方案,场景的构建需要与现有规划进行合理衔接。按照城市区域功能与发展目标确定不同类型的场景所在区位,如休闲场景、娱乐场景、创业场景、生活场景等多种类型。第二,根据场景类型确定产生场景红利的核心要素。场景类型的差异使其场景红利产生的过程、阶段和核心影响因素均有极大不同。以文旅场景和创业场景为例,前者以具有历史感和美感的建筑物以及完善的运营方式作为产生场景红利的核心因素,倘若物理载体消失,场景也难以为继;后者以场景的核心人物和价值观为核心要素,只要核心人物存在,即使场景的载体消失也可以继续发展。第三,根据不同的核心要素采取不同方式构建场景,激发场景红利。对于以载体为核心要素的场景应以区位选择、功能设计、艺术价值提升以及运营团队建设为场景构造重点,这需要在建造之初进行专业化设计开发,并辅以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而对于以人为核心因素的场景则以人才服务、包容开放氛围营造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为构造重点,对这类场景更多采取“不干预、给扶持”的政策方式来促进场景红利的产生与扩大。

(二)适当扩大场景规模以获取规模优势

规模效应递增是城市的生产效率能够高于乡村的关键因素,场景同样存在规模效应递增现象。首先,场景规模的扩大可以降低交通和时间成本。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市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内部通勤成本不断升高。考虑到出行成本,城市居民和游客越来越多地偏向于选择规模大、种类齐全、内部通行便捷的休闲娱乐场所。而孤立存在于偏远地区的休闲娱乐设施,由于出行成本大大高于休闲体验所带来的舒适感,进而导致对游客的吸引力下降。第二,城市品质的提升远非构建单个场景即可实现,需要打造多重场景。对于城市而言,场景是微观的基本单元,魅力城市需要有许多个大大小小的场景组合而成。当一个城市中优质场景随处可见,或者形成了连片的大范围场景群,则很难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城市品质也正是在场景的长期构建过程中得以提升。第三,对于创新创业场景而言,依靠单个核心人物支撑的创新创业场景属于“单打独斗”,若遇到问题难以解决,极易造成创业失败。而当创新创业场景形成一定的规模后,拥有创业梦想的人大量聚集,人才匹配更为便利;与创业密切相关的风险投资、法律服务等团队

也随之聚集,创新创业团队能够较为顺利地解决所遇到的资金、法律等问题;在此场景的带动下,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与价值观也愈加包容、开放,创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城市的文化与灵魂。

(三)循序渐进提升城市品质

城市品质提升并非短期之功,需要遵照设定的理想目标持续、连贯建设。在时间维度上,构建场景是一个相对短期的行为。例如,构建一个以古建筑为核心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场景,通过对脏乱环境进行整修、美化绿植、允许民间艺人表演、开设茶馆、古玩店等休闲设施就可以极大地提升场景的和谐度与美感。但城市品质的提升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需要打造多重优质场景,还需要使这些场景能够长期正向循环并与城市文化融为一体,将场景价值观根植于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质中,使市民、游历者能够受到城市历史文化与艺术的浸润。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引领城市品质的发展方向,在多种尺度上对场景构建进行分析与规划,构造多种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众多高质量的生态、文化、健身、创业等公共产品。同时,要深入分析各个场景的红利生成与扩大逻辑,确保投入充分以顺利产生场景红利;宽容和保护自发产生的优质场景,引导场景红利的分享与平衡,既保护核心人物使其有持续动力不断优化场景,又平衡新进入群体利益顺利享受场景红利,以“同质同频同期待”为原则使后进入者坚持场景的初始价值观。

(四)平衡场景建设预算,减少财政压力

构造优质场景,尤其是修建大型文化设施、大规模改善生态环境等,虽然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态的需求,却可能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短期内难以推进,从而抑制了城市品质的提升。文化设施、生态改善建设虽然成本巨大,但场景理论却强调休闲娱乐设施、生态改善所产生的愉悦体验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建设文化休闲娱乐设施、改善生态所产生的场景红利,可以使周边土地价值增加。因此,可以采取出让周边土地的方式来平衡投资预算,这样既可以满足场景建设需要,也能够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Taking Scene Dividends as the Core to Improve City Quality

Wei Jian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Edi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a city is the enjoyment and pleasure of the beauty produced by a cit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s the core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scenes proposed by Professor Clark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akes scenes 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and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alues contained in the scenes for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nd urban char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cenes, the concept of “scene dividends” is further proposed to describ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positive cycle of the scenes. Urban development needs not only to construct the scenes, but also, all the more, to clarify the generation, expansion and sharing logic of scene dividends so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city quality can be achieved on a solid micro foundation.

Key words: city quality; theory of scenes; scene dividends

责任编辑:张登德

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与路径^{*①}

董占军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 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受到如何统筹、融合传统与现代、多样与统一等问题的困扰,今天“美丽乡村”建设亦然。在此困境下,艺术设计凭借其跨学科、专业覆盖面广、对接乡村建设的直接性等优势,能够成为突破难题的有效手段,在遵循内生性、民主化和开放化原则下,可从提升乡村外部风貌、建筑空间环境、公共服务设计以及包装与营销推广等路径介入乡村经济和文化建设,从而为“美丽乡村”建设作出贡献。

关键词: 艺术设计;中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101-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11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新时代乡村建设成为乡土中国的重要实践,也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如何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轨迹中汲取经验,如何着眼当下、深入理解和贯彻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美丽乡村成为这场讨论的焦点。艺术设计如何凭借自己的优势积极介入乡村经济和文化建设,成为新时代艺术设计面临的重大使命和重要机遇。

一、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回眸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乡村建设的革新探索就已经开始,最典型的是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基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以建设充满“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精神新礼俗社会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只有在认清中国大局和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合适的文化模式,才能推动乡村经济建设。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出发点是要用儒家思想改造农民思想和道德文化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即所谓的“儒学下乡”活动。尽管他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取得了一定成效,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但其主张既存在理论困境,也受到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主导偏差等现实因素困扰。从根本上说,梁氏的“儒学下乡”活动仍然只是利用传统资源、方法、思想对乡村的改造,并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对“乡村建设”的理解仍然受儒家传统的羁绊。这与当时中国社会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的命题并不切合。^②其他诸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江苏晓庄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同样以教育和文化建设为主导,是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认知和实践,其作用并不足以改变当时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可以说在民国时期,中国

* 收稿日期:2021-01-06

作者简介:董占军(1969—),男,内蒙古赤峰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策略研究”(20ZD08)的阶段性成果。

②徐福来、李雪:《刍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困境》,《南昌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乡村仍然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对乡村的植入并不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地孕育和形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语境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构想成为农村和农民憧憬和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重要目标和积极动力,也成为当时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要的主流话语之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农村地区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到日常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器物、生产到文化、礼俗都逐渐融入现代元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思想、文化遗存受到批判和打压,许多承载儒家思想的器物、生活方式、礼俗文化被摒弃。“文革”结束后,国家发展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农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始发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向下,构筑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乡村建设的鲜明特征之一。^①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新农村建设思想日趋完善,迅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美丽乡村”概念,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深入实践、深入人心。农民增收、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即“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努力实现绿色富民绿色惠民”。^②“美丽乡村”思想核心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具体内涵体现在规划布局、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等方面。建设美丽乡村,就是要通过生态能源的再生与利用,完善乡村公共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乡村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③在这一背景下,依托于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以及现实应用实践的艺术设计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推动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现实助力。

二、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艺术设计介入的优势

美丽乡村建设的宏观背景是我国乡村建设步入现代化发展时期。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与发达国家相比,乡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因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劳动力转移、人口迁徙使得乡村“空心化”严重,传统自然农耕经济正受到破坏,乡村经济新模式急需实践和探索;其次,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趋同现象也影响到乡村,出现“千村一面”现象,以规模复制、资本驱动为特征的乡村建设模式弊端逐渐显现,尤其是乡村整体面貌和居住环境空间;第三,乡村传统建筑的风土特征、乡村结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资源不断受到破坏,加速了传统地域文化资源的衰竭与消亡;最后,乡村新生活方式与传统居住空间矛盾凸显,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加剧。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既要努力实现农村、农业、农民“三农”发展的现代化目标,还要充分开发利用本土传统资源,积极合理地规避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冲击,避免城市“化”农村、城市“统”农村的现象。在探索实践、经验总结中,逐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①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2016年第1期。

②李干杰主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③李干杰主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美丽乡村建设迫切需要通过艺术设计统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协调统一性与多样性。艺术设计以其跨学科、贴近群众生活、实践性强、专业覆盖面广,能够广泛直接地对接农村建设的优势,可以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手段。如山东潍坊杨家埠村,通过“民俗村”设计,将传统风筝、年画展演、销售、传承融为一体,在实现传统工艺活化传承的同时收获经济效益,唤起了民众对传统工艺文化的关注,传统文化符号成为增强村落凝聚力的内生力量。再如山东沂南县朱家林村,在深入发掘老村文化内涵、最大限度保护乡村原貌的基础上,对村子进行升级改造设计,以“旅游+文创+生态建筑”产业模式打造朱家林生态艺术社区,建成主题民宿、田园客厅、乡村美学馆、蚕宝宝农场、创客公寓、垂钓小镇等项目,成为山东省首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走出了一条集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三生三美”的乡村发展新路,“艺术唤醒乡土”,“艺术、设计对乡村文化价值塑造、产业振兴、生态环境改造等多角度乡村振兴工作的驱动作用”^①。

日、韩、法、美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证明,艺术设计在乡村规划、资源统筹、经济发展、人居环境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因为艺术设计的介入,发达国家乡村的生态环境得到充分保护,乡村旅游产业、农副产品销售、公共服务也取得了实效。^② 1968年日本改造乡村运动首先从古川町的濑户地区开始,为保护村庄景观,房屋大部分以传统工艺和构件建造,体现当地风土特征。艺术家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乡居文化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再现原有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唤起了当地居民对家乡的认同。由于艺术家的参与,乡村大众的艺术素养在艺术欣赏与体验的过程中得到提升,艺术设计所带来的综合效益也十分可观,诸如乡村环境的美化和重塑、产业复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等。^③ 韩国在乡村建设中非常重视空间规划设计的价值,不仅着眼于具体设计案例,而且形成了全面性、系统性、层次性与体系化的发展特征。^④ 美国则是以政府为主导,专门制定乡村整体设计、特定区域设计、乡村历史文化建筑及区域保护设计、乡村特定功能建筑设计的原则,以规范的条文和图示明确引导乡村建设方向。^⑤ 发达国家在乡村建设方面的这些成功经验,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和启示。

美丽乡村建设面临如何统筹、整合、衔接传统与现代元素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而艺术设计正是最好的黏合剂。其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艺术设计的跨学科专业优势。艺术设计的科研、教学及社会服务内容与美丽乡村建设息息相关,可以广泛介入乡村文化产业、环境保护、村落规划、景观设计、建筑空间设计、农副产品营销、公共服务和文化符号建构、旅游产品开发、传统手工艺振兴等,持续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活力。二是艺术设计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功能特征。艺术设计具有贴近现实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且具有形式引导效应,借助事物外在形式改变对人的视觉心理进行干预。^⑥ 利用这种诱导效应,借助视觉形象、产品应用、村落规划等形式变化,可以达到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丰富精神生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目标。^⑦ 三是设计的政策优势。艺术设计在

①陶蓉蓉:《艺术唤醒乡土:设计、艺术对乡村振兴的驱动》,《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②雒海潮、刘荣增:《国外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经验与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2期。

③周力行、唐晓岚、朱慧珺、刘思源:《日本艺术家在乡村再造中的功能与作用》,《小城镇建设》2019年第3期。

④李钢、郑辽吉:《韩国乡村空间规划的发展经验与政策启示》,《世界农业》2018年第3期。

⑤黎柔含、褚冬竹:《美国乡村艺术设计导则介述》,《新建筑》2018年第2期。

⑥杨文静、王令中:《试论艺术设计中的形式诱导效应》,《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年第8期。

⑦陈池瑜:《艺术设计在当代文化符号中的作用》,《设计艺术》2009年第4期。

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积极作用,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18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引导和支持艺术设计下乡工作的通知》(建村[2018]88号),明确提出要引导和支持艺术设计人员下乡服务,谋求通过艺术设计大幅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文件出台后,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乡镇政府,不断加大设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力度。四是艺术设计学界和民间的广泛参与。艺术设计界学者、设计师在社会需求驱动下,广泛参与到以设计服务乡村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绩。当然也有缺憾,这也正是可以挖掘的潜在优势。一是学界对设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案例剖析者多,缺少从全局探索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路径。二是设计师参与领域相对较窄,多集中在建筑景观、村落布局规划等领域,而在数字媒体艺术、旅游产品和农副产品设计、乡村文化产业、乡村公共服务等领域参与较少。

三、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

艺术设计以何种形式介入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必须突显民生主题,在城乡双向流动中吸引精英下乡、资本下乡,服务乡村宜居宜业建设,打造乡村环境舒适性和文化认同感,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让乡村重新成为人们自觉自主选择的生活栖息地。在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应遵循内生性、民主化、跨学科合作原则。

内生性原则。日本佐藤滋教授认为,日本造村运动的成功在于对地方资源的挖掘利用。日本宫崎清教授认为,日本乡村社区营造是“人”“文”“地”“产”“景”五大类的结合。^① 湖南大学主导的“新通道”艺术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注重挖掘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资源,完成了100多项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和田野考察以及300多项“非遗再造”产品设计,延续了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形成了多元化发展文化生态。^② 日本造村运动的经验和湖南大学的非遗保护实践充分证明,乡村特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和内生动力。艺术设计应尊重乡村所在地特点,关注本土特色资源,明确乡村的独特身份与价值所在,顺应、保护和发扬乡村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提高乡村建设的质量,找到一条能够形成价值回归、社会认同、自身造血、走向繁荣的乡村复兴之路。^③

民主化原则。以人为本设计、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都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为基础,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创造性为目标的民主化设计。^④ 村民是乡村的主人和主体,设计者要尊重村民的需求意愿,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让村民自己构想未来并参与设计,确保村民熟知并参与村庄建设规划各个环节,提高村民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中国台南市土沟村的社区营造以建立“社区共同体”为宗旨、以艺术设计为媒介促进民众参与互动,强化成员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构建社群的文化认同,取得了村落建设多方面、多环节的成功。^⑤ 日本濑户川村庄建设由村民自主决定当地风貌大事,政府虽牵头组织但只是充当服务角色。例如,政府在当地修建国道时,即采纳了居民提出的在道路沿线种植榉树营造绿色道路的建言。

开放化原则。英国艺术设计委员会的智囊团 RED 在《设计转型》中提倡艺术设计的跨学科合作,面对复杂的问题,艺术设计应创造一个公共的空间,组建跨学科团队,突破单一视角,从多

①陈可石、高佳:《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②郭寅曼、季铁:《社会转型与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设计参与》,《装饰》2018年第4期。

③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国际城市规划》2014年第5期。

④郭寅曼、季铁:《社会转型与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设计参与》,《装饰》2018年第4期。

⑤陈可石、高佳:《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

角度看待问题并协同工作。^① 介入乡村建设过程,艺术设计面临各种复杂问题,设计转型和跨领域合作是极其必要的,应该多样化打造、多功能开发、多路径建设,加强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包装工程、公共艺术、数字媒体艺术、文化产业管理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专业协同,组建共同开展乡村建设的开放性艺术设计团体,赋予乡村新的生产动能、生活方式和生态模式。

四、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

美丽乡村建设核心包含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艺术设计至少可从三个层面予以介入:新文化模式层面,乡村社会的新经济模式需有相应文化模式的建立,这种文化应是经过实践检验后的文化修复和激活;生态层面,营造现代的宜居环境,自外而内,包含村落规划布局、景观环境、居住环境等;产业层面,激活丰富多元的产业业态,推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直接融合,逐步形成适应农村现实的新业态。具体介入路径至少包括以下五条:文化载体修复传承与创新、外部风貌设计、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公共服务设计、产品包装及营销设计等。

其一,传统文化载体修复、再生与创新。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是其发展的隐动力,只有文化定位精准,乡村建设的思路才能清晰。当下的乡村文化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存状态。所谓的现代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产生的文化,是人们在现今生活方式、科技水平下形成的新型思想理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新世纪以来,乡村建设在现代文化影响下,村民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村落建设设计中出现了犹如现代建筑的均质化现象,逐步失去与地域环境的有机联系,“千村一面”问题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对长江流域村庄的农民生存状态进行人类学调研后,认为中国乡村现状既不可能是对西方经济模式的完全照搬,也不是完全保留传统的自然经济,要以农民经过实践后的自主选择为主。这种观念对当前处理现代与传统文化关系仍有借鉴意义。乡村建设要做到土地有人耕,房屋有人住,环境有人维护,文化有人传承,生态维持平衡,景观保持协调,才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实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注重保护和修复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是乡愁的载体,更是乡村的灵魂,是村落历史中人的智慧、行为、情感、习俗、技术等等的结晶,舍弃传统的乡村将成为无源、无根、无内在的躯壳。宗教祭祀空间、礼制空间、公共生活空间以及居住空间如宗族祠堂、寺庙、戏楼(台)、书院(私塾)等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予以保留和修复。其次,注重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转化和保护。民间美术、音乐、营造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提炼和保护,为其留续一个依附的母体,利用现代技术优势来实现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和延续。再次,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强调基于乡村特质的发展模式和规划设计,创造出具有时代烙印的中国新乡村。^② 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立足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传统地域文化,结合现代文化,通过七年的乡村规划及文化再生实践,建设了不同层次的符合现代乡村特色的文化设施,引导了先进文化与时代道德风尚,推动了黄岩区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一系列振兴。

^①季铁、潘英:《基于社区和网络的设计与社会创新——从UCD到CCD》,《装饰》2012年第12期。

^②吕桂菊:《鲁中山区乡村景观特质、发展模式及规划设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农业大学,2018年。

其二,外部的风貌设计。乡村承载着生态保育、文化传承以及服务都市休闲度假的需求,但目前绝大多数乡村存在着风貌缺失、特色模糊的问题。乡村风貌设计涉及结构性梳理和视觉化设计,涵盖村宅院落、道路门户、设施场地、建筑立面等。结构性梳理,是对乡村整体环境进行具体规划设计,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地理、气候等因素,完善公共服务、居住院落、农田水系、道路桥梁等结构性布局方案,包括保护原生态和地域文化和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结构性梳理要结合地域特点,在原有体系基础上,增加第三产业引进,促进乡土博物馆、乡土景观群、农业遗产带、田园综合体等的合理布局。目前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已进入休闲旅游时代,闲游体系日趋成熟,环湖、沿山、沿江的基本消费格局正逐步形成,旅游相关产业布局如休闲度假区、历史人文体验区、文化创意区、生态观光区、医疗服务区等逐步渗透到乡村的规划设计之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注入新业态的同时,还要保育并提升乡村特色文化风貌。

其三,乡村风貌的点面视觉化设计,是借助设计系统化、标准化方法,在深入了解、挖掘、整理乡村工艺、生产、生活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炼出清晰、个性鲜明、识别性强的文化符号,并以符号的形态、色彩、图案等作为乡村形象设计和传播的标准语言,对外营造乡村的独特形象体系,对内增强民众认同感与归属感。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诸如生产技术、传统工艺、民间戏曲等,是乡村文化的最真实展现和区域文化象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媒介。用好乡村本地资源,形成乡村视觉形象是艺术设计深入乡村生活的重要途径。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在文化符号的挖掘上,要在凸显“特”字上下功夫。以日本熊本县为例,其文化特色集中体现在以“熊本熊”标志为核心的整体视觉形象中。“熊本熊”的标志黑色是熊本县主题标识视觉形象的主色调,腮红色则象征着熊本县“火之国”的地理文化特征。熊本县以“熊本熊”作形象代言,将本土特色和独特形象相结合,形成鲜明的地理品牌个性,有效地宣传了该县的文化特色。再如,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鸽坞塔村是一个多民族村落,在乡村形象视觉化构建过程中,设计师紧扣该村多民族融合这一特点,提取畲族族徽“神鸟戏牡丹”为设计元素,以畲族传统服饰五色为标准色,取多民族团结、美与生活多姿多彩寓意,传递当地文化特色,将该村从周围环境区分出来,形成极高的辨识度。

其四,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建筑空间涉及建筑、园林、室内,涵盖聚落礼制宗教文化空间、信仰空间、居住生活空间等。通过修复、重建村民认同的乡村礼制宗教文化空间,可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同时因各村规模、大小、历史、地理不同,也可避免“千村一面”问题。生产生活空间是乡村空间重要构成元素,分为三个层级:一是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所,是村民就业、生产、消费和休闲的空间聚合体;二是村民居住单元空间,是由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结合而成的共同居住单元;三是个体居住空间,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这是乡村居住生活空间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适用性改造设计需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传统居住空间与村民新的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现代文明带来新的生活方式,需要通过改造建筑来缓解旧形式与新生活方式的矛盾。在注重房屋功能和质量适应性的同时,更要因地制宜注重乡村发展的动态性和多样性。注重传统生活空间的恢复与文化重建,努力再现乡土建筑传统风貌。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及历史元素,凝练成乡村文化故事,将环境空间功能及乡村文脉结合,以艺术设计驱动乡村文化的再生产。与此同时,注重居住生活空间内在造血和再生机能,在改造更新中传承延续生活空间。再生设计要以乡村的节点、界面、空间结构等为切入点,以传统空间为骨架,在立足未来变化基础上加强空间形态构建,重组乡村空间,重塑空间功能,增加或改善休闲场地、医疗服务设施,教育、养老、交流等环境空间。如将原有礼堂改造成乡村历史文化馆、乡村书屋,围绕特色古树、古井进行

保护和空间改造等,实现现代元素与传统空间肌理有机结合。二是实现乡村原住民与新住民的有机融合。时代在向前推进,乡村在为村民提供生活场所的同时,也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自由放松的乐土。如果没有原住民,乡村就失去了本真情怀,存在价值就会减弱,成为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壳。同样,乡村的发展进步需要不断注入新活力,吸引城市居民并为其提供休闲体验空间,使之成为有着共同生活梦想和价值追求的地方,从根本上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浙江省台州市屿头乡沙滩村在深入挖掘当地的道家、儒家及农耕文化后,以此为前提,对沙滩村太尉殿片区的一系列近现代建筑进行改造,保留原建筑外观的同时,对内部进行改造和修固,对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再现古树植被、碎石铺地、小径竹院、梯田茶园等传统乡村风貌。在个体居住空间改造方面,立足90户住家不同诉求,强调村民与设计师共同参与设计,在保持房屋外貌的同时,合理注入新功能,以符合自住或民宿等新业态功能需求。

其五,公共服务设计。公共服务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设计介入要结合村民意愿和村庄发展需求,在充分考虑人口构成、服务对象、交通状况、自然环境等基础上,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首先是根据乡村规模和综合辐射能力,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乡万溪冲村是一个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乡村,有260余户“一颗印”式传统民居。该村在保留原有民居布局、突出民居特色的基础上,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设计优化,修建了游客集散基地、民俗博物馆、乡村生活体验园等,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乡村整体面貌,依靠特色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其次是增加适应乡村特点的休闲生活设施设计。乡村生活消费模式日益多元化,高品质生活设备、休闲性消费设施要求提高设计标准并综合考虑村民实际需要。如在道路设计时,要减少对固定空间秩序的破坏,避免村民产生陌生感和抵触感;人行道设计上,要注意村民是否携带农具等细节;在村落公共空间内增加休憩娱乐设施等,切实服务村民生活。最后是积极推广组装式设计。乡村建筑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居住功能,有的乡村以艺术开发为重点,采用装配式设计建设临时性艺术装置。如曾在福建土楼中举行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时装秀,秀场采用便于拆装可回收的材料进行舞台搭建,将“古老”和“时尚”完美结合。第四是健全无障碍设施设计。叶落归根传统思想使老年人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情感。在乡村设计中,要考虑到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因素,对生活环境及文体活动、社交活动场所作无障碍处理。

其六,产品包装及营销设计。对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深入包装及营销设计,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带动乡村旅游市场发展产业融合,是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第一,打造乡村产品品牌。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的本土品牌意识。浙江金华义乌市的何斯路村鼓励农户恢复稻谷种植和米酒酿造业,打造了一年一度的“米酒节”,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构建以本土地理自然资源为特色的品牌塑造意识。如西湖龙井、栖霞苹果、莱阳梨、菏泽牡丹等营销模式。第二,构建政府、高校、企业、乡村合作营销平台。整合政府整体规划、高校高端研发、企业资金注入、乡村产品供应等各自优势,重庆北碚区静观镇的腊梅产业就是四者合作的典型案例。第三,推广乡村体验式营销,即结合情感、感官、思考、行动、关联五个方面进行营销设计。杭州西山龙坞茶村建立的“美好屋托邦”,以竹子、茶作为设计依托,房屋外立面使用木格栅进行装饰,在房屋周围种有许多菜园,自然材料和周围环境相互融合^①,将产品的自然、情感、绿色等诉求以可观、可听、可触方式传递出来,引起消费者对品牌的情感认同。第四,打造创意农业,拓展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人文、创意、科技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拓展美

^①陈逸舟:《场景营销案例——户外篇》,《中国广告》2018年第7期。

丽乡村产业链,整合利用本土资源,提高传统农业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山东青州,把传统普通产品通过融入“创意”,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转化审美价值形态和健康理念开发等手段,开发出“盆栽韭菜”“创意花卉组合”等创意农业产品,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第五,推广村镇合作发展,打造村落经济文化联合体。将现代经营理念、产品和文化有机融合形成区域品牌,以抱团式发展实现更大经济社会效益。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浙江安吉走在前列,首先按照全县一盘棋“大乡村”理念进行整体规划,开展示范村建设,树立样板村为其他村提供经验参考。第六,利用互联网+、融媒体等现代信息传递渠道,加强对美丽乡村的营销推广。章丘铁锅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从名不见经传到“洛阳纸贵,章丘无锅”,可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作为经营者的村民改变了固有的销售模式,学习使用互联网来销售产品。通过直播、抖音短视频等方式宣传本地特色产品,实现用户和农产品的直接对接。

结语

时代发展赋予美丽乡村建设许多机遇和挑战,艺术设计可以成为整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协调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的重要手段,以更具张力的结构形式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艺术设计的介入和转化效能。设计师应响应时代号召,改变集中关注城市、追求工业和商业价值的现状,承担更多改善乡村面貌的社会责任,投身乡村建设,使设计切实服务大众、服务民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设计师应立足乡村客观条件、文化多样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实际需求,以设计全面激活乡村资源,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潜能,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条件,提高农民综合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从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rt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Dong Zhanju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plagued by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coordinate or integrat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lements, diversity and unity, and so does today's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this dilemma, art design, with its advantages of being interdisciplinary, having wide professional coverage and direct connection with rural construction, can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openness, art design can be involved in rur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improving rural external features, building space environment, designing public service, product packaging and marketing so that it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Key words: art design;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beautiful countryside

责任编辑:张登德

被动中的抉择

——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原因探析*^①

张礼恒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和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252000)

摘要: 1900年中韩重建邦交是合力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韩两国各自需求的内在驱动。但就整体而论,韩国是中韩建交节奏的真正操控者,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中韩建交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宣告了东方外交体制的寿终正寝,标志着国际公法在与宗藩体制的博弈中取得了完胜。

关键词: 《马关条约》;《中韩通商条约》;唐绍仪;徐寿朋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109-13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12

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899年12月《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徐寿朋驻派韩国公使前,中韩两国政府层面间的交往是阙如的。学术界对于中韩两国何以在4年之后重建邦交这一问题多有涉及^②,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过于空泛的缺憾,未能将大趋势与具体实务进行有机整合,给人一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错觉。笔者认为,中韩重建邦交是合力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韩两国各自需求的内在驱动。但就整体而论,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基本上是一种被动中的抉择。

一、化被动为主动,彰显大国风范

中韩建立邦交是由韩国发起的。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③中朝之间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至此划上了休止符。李承纯、闵泳哲成为朝鲜派往中国的最后一任进贺谢恩使。^④此后,朝鲜为彰显独立自主之国的形态,极力抹煞属国痕迹。继1894年8月拆毁迎接清朝敕使的“迎恩门”之后,1896年11月,朝鲜又在原址上建造“独立门”“独立园”,“以彰自主之据”。^⑤1897年5月,朝鲜将接待清朝敕使的“慕华馆”改为“独立馆”。

* 收稿日期:2020-12-01

作者简介:张礼恒(1963—),男,山东安丘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和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朝土视察团’与东亚国际关系研究”(20BZS072)的阶段性成果。

②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陈尚胜:《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李晓光、陶常梅:《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95页。

④《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3页。

⑤《北洋大臣王文韶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869页。

同年10月,朝鲜再将“昔年敕使驻节之南别宫,现已改筑天坛,似属再为声明自主独立之意”。^①

然而,朝鲜的这番作为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平等认可,反而是丧权辱国。1895年10月,在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策划下,日本浪人血袭景福宫,残杀闵妃,史称“乙未事变”。此事件成为朝日关系的水分岭,朝鲜由亲日变为亲俄。1896年2月,国王李熙逃往俄国驻朝使馆,完全倒向了俄国,依靠出卖国家权益,换取俄国的保护,史称“俄馆播迁”。俄国借机大肆攫取朝鲜权益,扩大在朝势力,相继签订《韩俄边贸条约》《汉仁铁路协议》《朝俄开采金矿合同》。此外,俄国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掌控朝鲜军队;派阿厘斯永久管控朝鲜海关税务,“掌理通国财政”。为此,欧美各国评论道:“韩王只顾保全其本身,不顾将其国献于他人。”^②但令韩王始料不及的是,倾力亲俄并没有换得俄国的真诚相待。就在韩王蛰居俄国使馆,大做称帝美梦之时,俄日两国绘制了瓜分朝鲜的路线图。1896年5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代理驻朝公使韦贝签订《小村——韦贝协定》,日俄两国除在朝鲜共同拥有驻军权之外,还以北纬39度线划定了各自在朝鲜的势力范围。6月,日本特使山县有朋与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签订《山县——罗巴诺夫协定》,牺牲朝鲜,共管朝鲜。^③俄日勾结,引起了朝鲜官员的高度警觉。同年6月,代表朝鲜国王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闵泳焕警告国人,“俄罗之强,天下无敌。……是以眇视万国,有并吞之志。……惟我东邦,适居冲突之路,必先被其毒者,实非他国比也”。^④为防祸起肘腋,朝鲜国王李熙只得另寻庇护。1897年1月,任命闵泳焕为驻欧洲六国公使,“往求德法奥意公(共)同保护”,意在防俄。^⑤

朝鲜国王李熙在向欧美派驻公使的同时,又出于以下三种考量,极力推动与中国建立邦交。其一,缓和朝中关系。朝中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往来不断,边境贸易、朝民越境开垦等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对于朝鲜而言,独立固然可喜,但独立的过程则让朝鲜背负上了沉重的道义亏欠。甲午年间,中国出兵朝鲜,原本是应朝鲜国王求请,帮助镇压国内叛乱,维持李氏王朝的统治。孰料,中日战端一开,朝鲜竟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为日本提供军需粮草、情报^⑥,伏击中国军队。战争结束后,朝鲜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其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终究是一种出卖盟友、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绝非东方国家传统之君子所为。自忖理亏的朝鲜国王为修补朝中裂痕,缓和朝中关系,遂决定主动示好,建立邦交。其二,借朝中建交,彰显独立国家形象。朝鲜国王李熙曾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性活动,借以观测欧美各国的反应。遗憾的是,除日俄美之外,英法德意奥等欧洲强国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意见。为此,与中国建交就显得尤为迫切。按照近代国际公法,缔结邦交必须是在两个独立国家之间进行。一旦朝中建交,就意味着中国对朝鲜独立身份在事实上的认可。而朝中存在的数百年的宗藩关系举世尽知,朝中建交的国际影响力绝非他国

①《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0页。

②《委驻朝鲜总领事、三品衔候选知府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7-5058页。

③《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06-5008页。

④[韩]闵泳焕:《千一策·俄罗斯^㉑现势》,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闵忠正公遗稿》卷二,探求堂,1971年,第22-24页。

⑤《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36-5037页。

⑥《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韩廷犒赏日兵米、肉甚多,韩喜日,殊不可解。”

可比。其三,引进中国,遏制日俄瓜分。在大韩帝国成立之前,朝鲜执行了一条由亲日到亲俄的外交战略,虽也有所收获,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昂贵的。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皆在利用朝鲜的依附心理,在保护朝鲜的名义下,大行侵吞或瓜分朝鲜之实,致使朝鲜深陷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危险境地。1896年2月11日,国王李熙向各国驻朝使领大诉其苦:“自八月二十六日以来迄未用印,并未曾见此印,朝中颁发政令余亦全不知也。”^①尤其是当日俄为缓和矛盾、避免冲突,签订系列协定以来,朝鲜成为日俄两国利益的牺牲品。此种情势如不改变,朝鲜势必沦为日俄一国或两国的殖民地,独立平等之梦终将化为泡影。为此,朝鲜决定大打“中国牌”,利用中国地缘与历史传统上的先天优势,借用中国力量,实施朝鲜版的“以夷制夷”策略^②,遏制日俄对朝鲜的瓜分或占领,试图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保全朝鲜。朝鲜重臣闵种默对此曾有过清晰的表露。他说:“华弃韩,置之不理,恐非良策,将求中朝允速立约,自可防外人叵测之患。”^③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与长远的考虑,朝鲜在宣布独立后不久,就发起与中国建交攻势。1896年6月17日,朝鲜国王委任卞元圭为缔约专使,拟赴华“订立约章”,并于次日指派翻译朴台荣拜见中国“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打探中国意向。^④8月,朝鲜国王再派赵秉稷与唐绍仪举行会谈,表达与中国建立邦交之诚意。^⑤

面对韩国发起的建交攻势,清政府走过了一条由拒绝到同意、由被动到主动的路径。中朝(韩)进入无邦交状态,是从代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唐绍仪撤离汉城开始的,并非始于《马关条约》的签订。1894年7月28日,唐绍仪离开汉城,“赴仁川登英兵船”回国^⑥,中朝(韩)邦交由此中断。到1899年《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中朝(韩)两国处于无邦交状态。《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鲜成为清政府的伤心地,既为失去朝鲜而痛心,又为朝鲜的背盟弃义而愤怒。心理学原理揭示,当木已成舟之时,治疗心理创伤的最好办法就是选择性忘却,暂且不去提及、触碰勾起回忆的人和事。在此期间,仅仅出于保护、管理在朝华商的需要,于1895年12月设立了“总商董”^⑦,1896年11月委任了驻朝总领事^⑧。但无论是“总商董”,还是总领事,都不具有政府层面的意义,因为前者归北洋大臣王文韶驱使,后者供总理衙门调遣,清政府据此与朝鲜保持着民间或半官方的联系,追踪着半岛局势的动向。

当朝鲜初次表达建交意向时,清政府的答复是拒绝。1896年6月,卞元圭受命为订约大臣,拟赴北京修约,临行前指派翻译朴台荣拜访“总商董”唐绍仪,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唐绍仪先答以位卑言轻,“我国大事焉能知之”?继称朝鲜先后得日俄庇护,“今国王仍驻俄馆,究系俄宾。既假宫于他国使馆,何能称为独立国主”?按照国际公法之规定,无独立之权的国王,是无权派

①《同文馆学生朱敬彝译〈字林西报〉》,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740页。

②赵润生、张礼恒:《论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以夷制夷策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③《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41页。

④《收北洋大臣王文韶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56-4857页。

⑤《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99-4901页。

⑥《稟北洋大臣李鸿章文》,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0页。

⑦《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63-4564页。

⑧《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遣使臣的;靠外国军队保护的国家,与藩属无异。唐绍仪警告道:“若王迳行派使中国,恐不以礼相待,似宜缓行为好。”^①事后,唐绍仪专门向北洋大臣作了禀报,并委婉地提醒,既然朝鲜欲与中国建交态度坚决,中国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求变,执掌中韩建交的主动权,引领中朝建交的走向。7月12日,总理衙门收到北洋大臣王文韶转呈,接受了唐绍仪的提议,又几经斟酌、研讨,最后确定了中朝建交的“三不原则”:“拟准商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朝鲜都城,代办使事。”^②

与曾经的藩属建立近代邦交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总理衙门为此特向“外交智囊”李鸿章征询意见。7月19日,远在圣彼得堡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李鸿章回电,完全同意总理衙门的决议。其电文称:“查英法德驻韩,皆系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微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按公法,应由总署寄信凭于彼外署,不递国书。尊拟准订通商章程,设总领事,正合。”并提议由唐绍仪出任驻朝总领事。^③

总理衙门的决策、李鸿章的回电均已表明,为了扭转中朝建交的被动局面,化被动为主动,清政府的外交中枢机构经慎重考虑,决定在不缔结邦交的前提下,以派驻总领事的形势,与朝鲜建立官方联系,借此阻止朝鲜的建交纠缠。按照近代国际交往惯例,两国建立邦交的标志就是互派驻外公使。而总领事可以在两国断交或不建交的情况下保持存在。由于派出机构的不同、承担职责的不同、权限的不同、归属管理权的不同,总领事与公使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而在这种差异的背后,透露出清政府对朝外交的真实意图,即以设立驻朝鲜总领事的方式,拒绝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地位,用一种变相的“宗藩关系”,继续保持与朝鲜交往的优越性。总理衙门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表述。它在奏折中坦言,派驻朝鲜总领事的用意,既是为了“存属国之体”,又是为了“可息朝鲜派使之心”。^④

客观地说,总理衙门的决定的确存有不合时宜的虚枉性,但其果断求变的外交决策,取得了明显的外交成效,阻止了朝鲜单方面遣使入京缔约的建交企图,重新掌握了中朝建交的主动权。1896年11月20日,清廷朱批总理衙门奏请,同意唐绍仪为中国驻朝总领事,归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双重管理。^⑤1897年1月30日,唐绍仪入驻汉城。唐绍仪履职驻朝总领事,打乱了朝鲜国王李熙的盘算,延缓了中朝建交的进程。1896年11月,朝鲜国王李熙“特派前驻津督理成歧运”,准备携带拟定好的条约文本,“去京请订约章”,但随着唐绍仪的到来,只得被迫取消,“故行亦不果”。^⑥

此后,清政府派驻韩公使的过程,简直就是派驻朝总领事的翻版,依旧是被动在前、主动在后。建元称帝是朝鲜显示独立平等夙愿的一种表现。自1896年改元“建阳”之后,朝鲜就在帝制自为的道路上加速前行。据史料记载,1897年9月至10月间,议领政沈舜泽、特进官赵秉世

①《收北洋大臣王文韶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56-4857页。

②《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③《复译署》,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2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④《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⑤《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⑥《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88-4989页。

等朝廷重臣,九次上书国王,“请加尊号”。在上书中,沈舜泽等人先是依照东方传统,追溯朝鲜肇始于檀君、箕子,历史悠久;称颂国王李熙敬天爱民,德侔天地,堪与三皇五帝比肩。次是套用西方的主权独立观念,将建元称帝视为“建独立之基,行自主之权”,《万国公法》明确写有“各国自主者可随意自立尊号”。^①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则以《独立新闻》为载体,以“独立协会”为阵地,呼吁朝鲜独立,鼓吹欲提高国家与庶民之地位,“其国君主必须与他国君主比肩而立”。10月12日,朝鲜国王李熙举行登基大典。13日,宣布建元“光武”,国号初为“大华”,后称“大韩”。至此,“大韩帝国”宣告成立。

然而,国际社会对于韩王称帝一事反映不一,赞同者有之,如日本、俄国;而日俄的赞同也不过是为了获取韩王的好感,赢得侵朝先机的廉价“投名状”,并非真正拥护。反对者有之,如英法德等国。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认为:“我国主亦是君主之称,何须更改?”法国驻韩公使葛林德称,“我是民主之邦,不重皇王字样,安南系我属地,曾封其国主为皇”。德国驻韩总领事口麟则扬言,“欧洲五大国主倘称我帝,政府自然认受,其他小国若加尊号,事恐难成。然朝鲜非大国,无端改无主名目,未识我政府之意以为然否”。^②欧洲列强的反对、质疑之声,自然令“大韩帝国”处境尴尬。1897年10月16日,韩国外署督办闵种默发布通告:“我大君主陛下于本月十二日勉膺大皇帝尊号。”各国驻韩使领反应冷淡,例行公事式地回称,“将转禀政府而已,并无提及认受与否字样”。唐绍仪事后禀报:“驻汉法德美英各员,均以韩王加尊号一节,系在其境内自有之权。至于各政府允否认受,彼等未能深悉。”俄国驻韩公使士贝邪则称:“日前接其政府来电云:韩王称皇,我视之如韩铜钱,只可销行于韩境,若到我国,虽以百万文亦不能糊一朝之口。”^③可以说,闵种默的话语概括了世界各国对韩王称帝的基本态度:“倭助我,俄阻我,德法戏我,英欺我”。^④

为摆脱尴尬,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承认,韩王李熙再次发起对中国的外交攻势,试图在建立邦交的旗号下,获得中国对韩国改元称帝的认可。1898年6月,韩国授意朝鲜海关税务司与中国海关税务司暗通款曲,撮合中韩建交。7月,韩国宣布任命沈相薰为驻华公使,进驻北京。^⑤韩国在中韩建交问题上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

面对韩国政府发起的建交攻势,清政府改变策略,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史料显示,清政府初闻韩国欲遣使入京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阻止。1898年3月23日,总理衙门电告唐绍仪:“韩派使坚拒为妥。”^⑥5月,总理衙门获悉韩国欲派使臣来华的消息,电询唐绍仪:“韩拟派使系几等?是否欲议商约?现认韩国自主者几国?现住韩京各使内,有几国系总领事、参赞、代办?希详查电复。再筹办法。”^⑦6月2日,唐绍仪电复,“韩拟派二等使赴京订约”。按照国际

①《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1页。

②《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39-5040页。

③《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6、5050页。

④《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40页。

⑤《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45-5148页。

⑥《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21页。

⑦《发电档》,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惯例,二等公使奉有国书,须觐见该国君主或元首。^①唐绍仪深知,让昔日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藩属之臣,以平等礼节觐见清朝皇帝,实是对天朝尊威的亵渎。为此,他提议:“似应由华先行派使来韩,以示昔年主仆之别。若任韩先派,似系为彼所索,恐有碍体制。”^②唐绍仪的提议可谓是深孚清政府心意。6月12日,总理衙门电令唐绍仪:“韩本属邦,派使不便接待”,“韩愿订商约,尽可就近与议”,韩国须“止派使”。^③但是,总理衙门的如意算盘,遭到了韩国政府的抵制。6月16日,唐绍仪禀报,韩国自恃有日俄英等国的支持,指斥清政府的外交构想违背国际惯例,坚持遣使建交在前,订立通商章程在后。由于中韩立场分歧严重,虽经多次斡旋,韩国拒不通融。无奈之下,唐绍仪只得据实禀报,请求“电示”。^④

为破解中韩外交的僵局,总理衙门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有条件地采纳韩国的议案。7月8日,总理衙门电示唐绍仪,“韩若再坚求派使,可与商明遣四等公使,国书由署代递,无庸觐见。其通商约章,本署当与会议。”^⑤该电文内容透露出了总理衙门的双重目的,即援引近代国际公法四等公使无需向派驻国君主或元首递交国书之规定,拒绝韩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由驻韩总领事签订中韩通商章程。孰料,唐绍仪对此提出质疑,力主中国派出四等公使,进驻汉城。^⑥

就在总理衙门举棋不定之时,7月上旬,韩国政府任命沈相薰为二等驻华公使,并委托时任朝鲜总税务司柏卓安草拟国书。^⑦

韩国发起的建交攻势,迫使清政府再度求新求变。1898年8月5日,锐意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谕旨:“所有派使、递国书、议约,韩使来京、递国书、觐见,均准行。”^⑧从此,中韩建交快速推进。8月13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任命徐寿朋为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后改为出使朝鲜国大臣。^⑨1899年1月25日,徐寿朋抵达汉城。1月31日,向大韩帝国皇帝李熙递交国书。^⑩9月11日,《中韩通商章程》正式签字盖印。^⑪1900年1月21日,徐寿朋成为中国首任驻韩公使。^⑫至此,中朝(韩)两国历经5年终于缔结邦交。

二、迫于列强压力,顺势而为

随着近代东亚的整体沦陷,域外力量几近成为该地区变动的主宰。在中日朝(韩)三国的历

①[美]惠顿:《万国公法》,张剑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1页:“第十二节 延见之规:第一等国使,可在公朝觐见。前此多设仪仗款接,今则私规公见,率从简便,概以内朝延见,与二、三等国使同例。”

②《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5页。

③《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6页。

④《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7页。

⑤《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40页。

⑥《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1页。

⑦《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46页。

⑧《军机处电寄唐绍仪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页。

⑨《军机处交出本日上谕》,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5页。

⑩《徐寿朋抄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00页。

⑪《出使韩国大臣徐寿朋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45-5246页。

⑫《徐寿朋抄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306页。

史进程中,欧美列强的身影处处可见。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中韩建交事件同样也是如此。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除老牌列强外,日本这个新崛起的列强也参与其中,横加影响。

在中韩建交启动之初,韩国就挟洋自重,每每以“如不重修新约,维(惟)恐各国必有诘问”^①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国就范。史料显示,介于中韩建交的国家主要有日本、俄国、英国。这三个国家可谓是各怀鬼胎,各有盘算,或出于眼前的利益,或出于长远的考虑,纷纷掺入其间,联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中国就范。地处瓜分狂潮中的清政府出于对新老列强的忌惮,被迫改弦更张,顺势而为。可以说,列强的联合施压成为助推中韩建交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具体来说,日本助推中韩建交是为了缓和日韩矛盾,意在日俄争霸韩国中占据有利态势。日本凭借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实现了驱逐中国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构想,但战后急切冒进的侵朝行动,却触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兵家大忌。以1895年10月“乙未事变”为转折,以1896年2月朝王“俄馆播迁”为标志,日朝关系急剧恶化,朝鲜迅速由亲日转向了亲俄。俄国成为甲午战争后的最大获利者,几乎掌控了朝鲜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日本在与俄国的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史称:“倭之国人恃当华事之后,愤俄收渔人之利,矜骄之心日益坚固,急拟兴兵问韩之罪,将与俄战,独伊藤博文深悉其非俄敌,因请倭主将上下两议院关闭十日,俾息国人奢愤之议。”^②为挽回颓势,实现侵吞朝鲜的夙愿,日本除对俄国妥协退让外,还极力讨好韩国。1897年10月,大韩帝国成立时,日本是首批承认的国家之一。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揭破了日本的心机:“乙未秋间倭杀闵妃,韩之恨倭已极,乃倭颇谄韩性,屡以谀词奉承于王,欲藉此以释韩疑,并可消其杀闵妃之憾也。”^③韩国政府深谙日本之心理,遂在提请中韩建交屡次受挫之后,施展以夷制华之术,达到建立邦交之目的。而日本的考虑显然更胜一筹,敦促中国与韩国建交,一则显示对韩国的支持,借此缓和日韩关系,扭转在日俄角逐中的不利局面;二则引进中国,遏制俄国,改变俄国在韩一家独大的格局,实施日本版的“以夷制夷”之策。因此,当韩国政府发出求援时,日本政府痛快答应。1898年6月1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函总理衙门,内称:“兹准外务大臣电开:因现在韩国之清国人民其数不少,韩国政府愿与清国订立条约,请我政府居间玉成,未知清国政府于意云何等因。务希示复,以便电复本国为望。”^④

俄国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朝鲜政府急于寻求庇护的时机,疯狂拓展权益空间,赚得盆满钵满。巩固扩大在韩国的势力范围,自然成为俄国的首选。为此,俄国处处以韩国的支持者、保护者的姿态出现。1897年10月,韩王称帝,俄国是首批拥护国之一。唐绍仪曾对此有过深入剖析。他说,俄国原本并不赞成韩王称帝,“乃近来韩王僭加尊号之意已决,俄之不欲强止此举,或恐韩近倭远俄,虑失其权利起见”^⑤。当韩国为中韩建交相求助时,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驻韩公使士贝邪、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纷纷以劝说的名义,联袂向中国施加影

①《唐绍仪原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73页。

②《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05页。

③《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0页。

④《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18页。

⑤《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0页。

响。1898年3月31日,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照会总理衙门,劝说中韩订约建交。照会内称:“兹奉外部大臣咨称,高丽政府以贵国高丽彼此派往常驻之使,诚愿从速接续,迳行往来,故请驻汉城俄使转托本国政府于贵国政府,派往高丽之使,亦接高丽派往贵国之使之事,相助为理。复念中国高丽二邻邦接续迳行,睦谊往来,于中国商务有益,且固信中国政府甘愿成此高丽美意,故公爵穆兹嘱本署大臣将此奉达贵国,并候如何定夺。以上所列奉达贵署,并以公爵穆之意中国高丽从速彼此派往驻扎之使,于贵国利益尤所欲之举,烦请贵署将贵国政府何时、何等人员定派出使高丽之处示知可也。”^①

英国是利益至上的典型。从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整体国力的下降、俄美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英国的全球战略由攻转守,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成为其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东亚地区,英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是扶植中国,打压日本,稳定东亚国际局势。为此,自1882年英朝条约缔结后,英国在朝鲜只设有驻华公使领导下的总领事,变相地承认了中朝宗藩关系的客观存在。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曾说过:“当时英、俄两国都在暗中默认了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在交涉有关朝鲜的重大事件时,只是将中国置于中心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②但甲午战争的爆发,颠覆了东亚地区的原有秩序,引发了世界格局的震荡。基于现实的考虑,更基于长远的打算,英国开始调整其远东政策,逐渐由扶植中国变为亲近日本,推行以日制俄的外交战略。与此相应,英国的对朝政策也随之而变。史料显示,早在韩国改元称帝之初,英国的态度是暧昧的。但当韩国为中韩建交而向其求援时,英国转而给予了明确的支持。1898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访问韩国,“韩王及外部臣工曾经苦恳转求”游说中国,促成中韩建交。^③7月4日,韩国外署大臣李道宰求请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托其致电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请韩与华订约,并拟按照英韩约,想窠使日间必诣钧署请议约事”。^④

清政府确定的中韩建交的既定国策因东西方列强的介入而改变,发生了由拒绝建交到同意建交的历史性转变。其实,早在中韩建交的初始阶段,唐绍仪作为中韩建交事实上的推动者,就预判到了东西方列强介入的可能性。1896年6月,唐绍仪在驳阻韩国试探性建交之余,致函总理衙门:“韩王派使意切,此次虽经绍仪暂为驳阻,仍恐俄使韦贝及各国使员劝解王疑,竟备国书,派使前赴京师,请修约款”,提请未雨绸缪,以免被动。^⑤11月,唐绍仪在致函中称:“今则韩臣鸷鹫者多,又有他国之人唆使”,暗示总理衙门绝不能一味地拒绝韩国的建交之请。^⑥总理衙门对于唐绍仪的提醒是高度重视的。7月16日,在致李鸿章的函电中称,虽不愿与韩国建交,“然虑各国怂恿,宜预筹办法”。^⑦从后来的进程看,总理衙门正是出于对列强介入的忌惮,才于同年11月同意设立驻朝总领事,迈出了中韩邦交正常化的第一步。在奏请设立驻韩总领事的奏

①《俄国署公使巴布罗福照会》,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83页。

②[日]陆奥宗光:《蹇蹇录——甲午战争秘录》,徐静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81页。

③《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21页。

④《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9页。

⑤《唐绍仪原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73页。

⑥《知府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71页。

⑦《总理衙门发李鸿章电》,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74页。

折中,总理衙门坦承,“派领事分驻各口,庶可息朝鲜派使之心,并可免他国煽惑之议”。^①

1898年3月后,俄日英等国相继游说中韩建交。此时深陷瓜分狂潮中的清政府,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自然不敢无视列强的表态。在论及中韩建交时,驻韩总领事唐绍仪、总理衙门和清政府有关官员,无不把东西方列强的介入当作重要的变量考虑在内,大有谈虎色变之惧。1898年7月5日,唐绍仪致电总理衙门,内称:“俄、倭、英先后代韩请约,非为保护中韩交涉商务起见,殊有关各西国在亚洲争强之患。倘华不与韩订约,恐日后另生枝节。”^②8月10日,总理衙门在奏折中集中回应了俄日英等国的要求,公开承认是外部压力促成了中国对韩政策的改变。在奏折中,总理衙门开宗明义,将“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独立自主”和“英俄德法美义奥日本诸国均认朝鲜自主,或派三等使臣驻扎汉城,或派领事兼理使事”,视为中国决定选派出使韩国大臣的两条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于对列强意向的重视,总理衙门高度重视驻韩大臣的派出,向朝廷递交了一份17人的大名单,以供挑选。^③ 备选人员众多,堪称自1875年清政府选派郭嵩焘出使英国以来的首次,开创了近代中国遣派驻外使节的历史记录。在驻韩大臣人员的选定上,同样体现了清政府对列强意向的重视。8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委派张亨嘉为驻韩国公使。13日,清廷变更圣谕,改派徐寿朋为驻韩国公使。^④ 人员及称谓的变化,表征了清政府的良苦用心。一则,公使人员级别的提升。张亨嘉本为翰林院编修,官秩介于正五品至正七品之间;徐寿朋原为安徽按察使,官秩为正三品。在官秩上,徐寿朋不仅远居张亨嘉之上,实际上也成为自清政府派出驻外使节以来,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二则,驻韩公使级别的提高。在8月11日的上谕中,宣布张亨嘉为“驻扎朝鲜国四等公使”。8月13日的上谕则任命徐寿朋为“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按照清代官制,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的徐寿朋直等于国际公法下的“全权公使”,拥有自主裁决一切外交事宜的权力,而“四等公使”则难望其项背。史料显示,东西方列强的联合施压明显加快了中韩建交的进程。清政府一改两年前的拒绝、延宕作派,迅速钦派了以徐寿朋为首的高级别外交使团,于1899年2月向韩国皇帝递交国书,入驻汉城。

三、内在驱动力,保护在韩华商与追讨韩国欠款

清政府在中韩建交过程中总体上是呈被动态势,却也不乏积极主动的要因,那就是在韩华商与韩国欠款。换言之,保护在韩华商利益与追讨韩国欠款,是清政府接受中韩建交提议的两大内在驱动力。

在韩华商经济的腾飞始于袁世凯担任驻朝商务委员期间(1885—1894年)。袁世凯秉承“以商驭属”的经济战略,坚持“在属之商务日盛,即驭属之事权日增”^⑤的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在韩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营销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

①《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②《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9页。

③1898年8月10日,总理衙门提供的人选名单:徐建寅、黄遵宪、徐寿朋、杨兆鉴、志锐、蔡钧、曾广钧、江标、王同愈、陈宝琛、梁诚、傅龙云、孙宝琦、袁昶、黄绍箕、张亨嘉、寿富。——《总理衙门奏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3—5134页。

④《上谕》,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5页。

⑤《稟北洋大臣李鸿章文》,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

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大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力量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①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被逐出朝鲜半岛,驻各口岸商务委员相继内撤,在朝华商处境艰难。按照战前中英两国政府商定,在朝华商暂由英国驻朝总领事及海关税务司人员代为管辖、保护。^②尽管如此,华商被日韩商人殴打、欺诈之事时有发生,日本租界巡捕可擅入华商宅室搜查、捕人。

后虽委任唐绍仪为商务总董、驻韩总领事,但因中韩尚未建交,韩国政府拒不承认其外交官身份,无权介入中外官司,“凡遇交涉及争讼事件,无人保护”,华商只能任人宰割。^③难能可贵的是,华商身处逆境,不仅生存下来,且商务有了振兴的迹象。到1896年底,“华商之在韩者,已有四千余人,迩来进口货物日增月盛,较之日本商人,加增不啻倍蓰,是商务渐有起色”。^④汉城、仁川两地华商,“比之日本商人一年之中犹多数十万元生意”。^⑤可以断言,只要有妥善的保护,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假以时日,华商必定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打破日商的垄断,形成与日商平分秋色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从韩国提出建交请求起,有识之士就委婉地批评了清政府拒绝建交的决定,呼吁重视对在韩华商的保护。1895年11月5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在致总理衙门函中,力主将“仁川港口华商租界与各国租界联合为一”,借此遏制日本的侵吞。他说道:只因中韩尚未建交,“在韩华商共计四千余人,无所依恃,以亚洲商务大局而论,朝鲜一隅,终未能从此隔绝。现虽暂托英员保护,究于我民情俗例有所隔膜。遇有我商待理各事,不无仍多窒碍”。时任浙江温州道的袁世凯则提议,在中韩建交之前,以商董的名义,派人驻朝保护华商。^⑥1896年11月5日,唐绍仪向总理衙门陈情:“自驻韩各口委员撤回后,华商皆生觖望,日人肆其强横,韩人频加藐视,虽曾托英总领事代为照料华商事件,而情词隔阂,措置终难。”“商情无人保护,实于国体有碍。倘蒙派员驻韩,当可止其来使,兼酌议税则,保卫商民,有裨大局,实非浅鲜”。^⑦1897年3月,唐绍仪向总理衙门婉转表达了中韩建交的迫切性。他说,年初驻韩各国公使及驻仁川领事,在仁川工部局专门讨论各国租界事务。日本驻仁川领事石井菊次郎公开提议,中国尚为无约之国,其在韩的元山松亭租界、仁川三里寨租界、釜山租界理应没收。他说:“中国与朝鲜无条约,华租界应即充公,归还朝鲜,华人何得擅踞?又何得入工部局会议事件?”美国驻韩公使斯露士附和道:“华韩无约,华人竟有租界。此诚公法所未见。”会议虽未形成决议,但商定续议,华商租

①张礼恒:《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②1899年12月22日,徐寿朋向总理衙门提请嘉奖保护在韩华商人员名单,因英国政府规定驻外使领不得接受他国嘉奖,故只有时任朝鲜海关税务司人员:柏卓安、欧森、阿滋布、湛玛斯、何文德、罗保德、普尔来、阿莫尔。——《出使大臣徐寿朋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92页。

③《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④《收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59页。

⑤《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88页。

⑥《收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16-4517页。

⑦《收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59页。

界岌岌可危。^① 史料显示,唐绍仪等人的建议成为撬动中韩建交的杠杆,逐渐改变了清政府的对韩政策,使甲午战后的中韩关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折。从“商务总董”“驻韩总领事”,到“驻韩公使”,囊括了中韩关系由民间到官方、由低层次官方关系到高层次政府关系确立的全部过程。而清政府每一次对韩政策的改变,无不与华商利益紧密相关。1895年11月5日,总理衙门明确规定了“商务总董”的职责,“名系充当商董,隐以维持商务”。^② 1896年11月20日,总理衙门坦承,设立驻韩总领事的目的一,是“保华民通商之利”。^③ 1898年8月10日,总理衙门在奏折中称,派遣出使韩国大臣是因为“朝鲜国土与我奉吉两省水陆毗连,商民来往交涉甚繁,既经准令自主,自应按照公法遣使订约,以广怀柔之量,而联车辅之情”。^④ 据此完全可以说,保护在韩华商的利益,是清政府最终接受韩国提议,同意中韩建交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向韩国追讨欠款,是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另一内在驱动力。从19世纪80年代起,朝鲜为缓解财政困难,多次向清政府借款。据史料记载,大型的借款共有5笔:1882年10月1日,朝鲜向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借款50万两,实到20万两,分12年还清。^⑤ 1885年7月,朝鲜向电报总局借款10万两,分25年还清。^⑥ 1892年、1893年,朝鲜两次与华商“同顺泰”签订借款合同,共借款20万两,分80—100个月还清。^⑦ 1893年,朝鲜政府向清政府借款35000两。^⑧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朝鲜共向清政府借款53.5万两白银。甲午战争之后,中韩两国处于隔绝状态,韩国欠款遥遥无期。1895年10月,袁世凯首次提议,为防欠款化为乌有,必须重新建立政府间的联系,委派专人入韩,“坐催各项债款”。北洋大臣王文韶对此表示赞同,称“该道所陈尚属可采”。^⑨ 从此以后,追讨韩国欠款就成为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重要考量之一,也成为出使韩国大臣、驻韩公使的重要职责之一。1898年11月18日,总理衙门指令北洋大臣彻查韩国欠款数额,以便追讨。由于时隔已久,且经战乱,出使大臣徐寿朋遂于1899年3月22日向北洋大臣裕禄求援。3月29日,裕禄致函总理衙门,要求贷款经手人唐绍仪核实韩国欠款本息总数,一并向韩国追讨。^⑩ 然而,追讨欠款实属不易,直到1908年中韩两国才达成协议,韩国一次性支付“日金三十五万圆作为全数偿还”。^⑪ 至此,韩国政府基本结清了招商局、电报局的欠款。

①《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89—4990页。

②《收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17页。

③《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④《总理衙门奏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3页。

⑤朝鲜内阁编:《度支部来去案》(奎17766)第4册,隆熙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909年1月30日)“照会第七〇〇号”：“光绪八年由唐道廷枢用招商矿务两局出名与朝鲜政府订立合同,原借足色纹银五十万两,后来开平矿局有无拨款未能知悉,而招商局共借出曹平纹银二十万两。”

⑥权赫秀编著:《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⑦[韩]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清案2》,韩国:高丽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304页。

⑧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23)《电报》(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91页。

⑨《收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17页。

⑩《北洋大臣裕禄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04—5205页。

⑪朝鲜内阁编:《度支部来去案》(奎17766)第4册,隆熙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909年1月30日)“照会第七〇〇号”。

四、结语

从表面上看,清政府在与韩国的这场建交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改变了韩国建交在前、订立通商章程在后的建交方略,将中韩建交的进程纳入中方的设计轨道,实现了《中韩通商章程》签订在前,中韩建交在后的的大逆转。但清政府在局部环节上的主动,却无法掩饰其在中韩建交全局中的被动。中韩建交的全部过程显示,面对韩国发起的一次次建交攻势,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它在每一个重要节点上的反击,究其实质,不过是对韩国建交攻势的消极回应而已。韩国政府在甲午战后东亚格局分化调整的关键期,利用中国身陷被瓜分狂潮的有利时机,充分施展纵横捭阖外交之术,将域内域外力量纠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由韩国为主角、英日俄等国为配角的强大阵营,主动出击,联合施压,逼迫清政府就范。尽管在这其中,韩国政府多有妥协、退让,但就最终的结果而论,韩国毕竟实现了中韩建交的夙愿。因此,完全可以说韩国才是中韩建交博弈的大赢家,韩国才是中韩建交节奏的真正操控者。

中韩建交开创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宣告了东方外交体制的寿终正寝。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始终是东亚文化的创造者与输出者,由宗法伦理推衍而成的“宗藩体制”成为东亚地区国家交往的外交准则,构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相环绕的天下谱系。中国皇帝作为万国之“宗主”,对体制内的各藩属拥有册封之权、保护之责。藩属国则有向中国皇帝“勤修职贡”之职。尽管宗藩体制的运行规则为“有道则来,无道则去”,但发轫于儒家文化的宗藩体制毕竟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藩属国不仅在大义名分上无法与宗主国相提并论,且要定期遣使来华,行三跪九叩之礼,借以映衬宗主国的隆尊。当时光进入19世纪90年代之时,早已跌落神坛的清政府依旧残存着天朝上国的梦幻,拒绝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韩国缔结邦交,借此延续宗藩体制的余脉。为此,不惜在甲午战争之后4年多的时间内,中断与韩国的官方联系,置4000多名在韩华商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将本应承担的国家职责交由外国代管。当韩国主动提出建交之请时,清政府考虑最多的不是民族利益,而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利益;关注的不是数千名在韩华商的生命安危,而是大清皇帝在平等礼仪下的那点可怜尊威。由此不难看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数十年的改革探索,清政府仍然没有走出王朝国家的窠臼,依旧是一个视王朝利益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封建王朝。可悲可叹的是,尽管清政府在中韩建交问题上设置了若干障碍,却未能阻止中韩建交的前进步伐,最终在外力的裹挟下极不情愿地走向了建交的终点。1900年1月21日,随着徐寿朋向大韩帝国皇帝递交国书、就任驻韩公使,拥有上千年之久的东方外交体制——宗藩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中韩建交的实现,标志着国际公法在与宗藩体制的博弈中取得了完胜。从起源的角度看,无论是国际公法,还是宗藩体制,皆是人类相互隔绝状态下的产物,而其辐射的区域自然也就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因此,所谓的国际公法,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欧洲洲际公法。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并不存在一个“通天下皆一式”的交往准则,各种文明或文化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集中,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端倪。欧美国家在对全球展开殖民征服的同时,还强行兜售其价值伦理、行为准则。欧洲洲际公法遂以国际公法的名义被推向了全世界,文明间的冲突随之爆发。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也是东西方两种外交体制的对抗。而由朝鲜问题引发的东西方两种外交体制的抗争,折射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渐加深的历史。截止到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以双重标准应对时局的变化,一方面按照国际公法的准则,向欧美国家遣派驻外使领,加速融入国际社会;一方面

在东方尤其是朝鲜问题上恪守传统,奉行宗藩体制。欧美国家尽管对此多有抗议,却又无可奈何。1882年之后,在朝鲜按照国际公法原则与欧美缔结条约的新形势下,清政府依旧以宗主国的身份,视朝鲜为天然的藩属国。对朝政策的这种结构性矛盾,致使清政府在涉朝问题上捉襟见肘。清政府既要应对朝鲜追求独立自主的挑战,又要遏制日美等国对宗藩体制的抨击与肢解,捍卫东方外交体制的正当性。然而,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苦心经营,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均化为泡影。衰落期的封建王朝最终惨败给了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制度。1900年中韩建交的实现,宣告了东方宗藩体制与西方国际公法持续60年抗争历史的终结。1901年,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完全被纳入到了国际公法主导下的国际条约体系之中。

Passive Choic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ccep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Zhang Lih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Abstrac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both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spective needs of China and Korea. However, on the whole, Korea was the real manipulator of the process of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while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lways in a passive positio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bilateral relations, declaring the end of the Eastern diplomatic system and marking the vic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in the game with the Suzerain-vassal system.

Key words: *Treaty of Shimonoseki*;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Tang Shaoyi; Xu Shoupeng

责任编辑:张登德

山东民俗与鲁剧创新^{*①}

贺彩虹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民俗与影视的关系非常密切。近年来,鲁剧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些成就与鲁剧创作者注重山东民俗的挖掘和呈现不无关系,表现在山东生产商贸民俗与厚重大气的题材选择;山东居住交通、饮食服饰、四时节令民俗与逼真细致的生活呈现;山东礼仪家庭、民间信仰民俗与多元的文化立场;山东方言、戏曲、歌舞民俗与原汁原味的视听再现。当然,鲁剧民俗呈现中还存在问题,如民俗事象未能构成真正意义的表现主体,在还原民俗和创新民俗的边界上存在偏差,传统民俗与抗日故事的结合有套路化的倾向,农村现实新民俗的表现不够充分等。山东民俗与鲁剧的创新结合还需要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强化叙事策略,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更新视听语言,用现实主义的原则提升民俗文化精神的新高度,用辩证的态度去看待民俗文化。

关键词: 山东民俗;鲁剧;叙事创新

中图分类号: J9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122-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13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②民俗与影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古老的民俗事象可以为影视叙事带来真实的历史氛围和生活场景,而影视作品的传播又可以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五代导演群体在他们的影片中创造了大量的“民俗奇观”,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反响,民俗对影视创作尤其是对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影像作品创作产生了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鲁剧的蓬勃发展与叙事创新也离不开山东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一、山东民俗与鲁剧的特征与成就

民俗事象纷繁复杂,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体分为物质民俗(包括生产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交通民俗、医药保健民俗等)、社会民俗(包括社会组织民俗、社会制度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等)、精神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语言民俗(包括民俗语言、民间文学等)^③。近年来,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山东国有影视制作机构出品的电视剧被称为“鲁剧”。其作品往往围绕山东取材,思想深刻,风格凝重,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与山东民俗密切相关的主要作品如下表所示:

* 收稿日期:2020-11-15

作者简介:贺彩虹(1976—),女,山东阳谷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东民俗与鲁剧创新研究”(J15WF25)的阶段性成果。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③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页。

2000年以来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出品的与山东民俗相关的电视剧一览表

播出时间	剧名	表现时代	表现地区	主要事件	重要民俗事象
2003年	大染坊	清末民初—抗日战争时期	淄博、青岛	印染业奇才陈寿亭的奋斗故事。	山东印染业
2006年	铁道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	枣庄	铁道游击队抗战的故事。	烧炭业、武术、煎饼、方言、民间小调
2008年	闯关东	清末—九·一八事变	章丘、东北地区	一户山东人家背井离乡闯关东的故事。	闯关东现象、祭祖、农业、饮食等
2009年	沂蒙	抗日战争时期	临沂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	煎饼、小推车、大襟棉袄、布鞋、方言
2009年	北方有佳人	民国初年—新中国成立	济南	乱世之中,姐弟俩流落济南、被人收养、磨难中成长的故事。	山东琴书、济南风俗
2010年	旱码头	清末民初	淄博周村	民族资本创业史。	商贸活动
2011年	小小飞虎队	抗日战争时期	鲁南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几个孩子组成小小飞虎队传递情报的故事。	民间杂耍、民间小调、饮食等
2013年	战火大金脉	20世纪30年代初期	烟台招远	采金老板鲁有道和孟玉琨两家人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	采金业、婚俗等
2014年	红高粱	20世纪30年代初期	潍坊高密	九儿和余占鳌在乱世中成长为抗日英雄的故事。	高粱酒、剪纸、扑灰年画、婚俗等
2014年	老农民	土地改革—20世纪90年代	黄河岸边	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近50年的农民奋斗史。	农业生产、服装、饮食等
2014年	马向阳下乡记	21世纪	淄博	“不靠谱”的小公务员马向阳的乡村奇遇记。	煎饼、民歌、戏曲
2015年	青岛往事	青岛开埠—抗日战争时期	青岛	三位异姓兄弟在青岛的创业故事。	印染业
2015年	大秧歌	20世纪30年代	烟台海阳	弃儿海猫在乱世中成长的故事。	胶东大秧歌、海神信仰等
2019年	温暖的村庄	21世纪	威海荣成	由农村青年王一鸣参加选秀比赛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海草房、渔家锣鼓

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鲁剧创作者注重山东民俗的挖掘与呈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山东生产商贸民俗与厚重大气题材选择

“山东的地理环境多种多样:有海,有岛,有湖,有黄河、运河,有高山,有丘陵,也有望不到边的平原。在这样幅员广阔的地域上生长、展开的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和农村的工匠作业,继承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形成了山村、渔村、农村、小城镇等不同的村寨生产民俗风貌。”^①在鲁剧的题材选择上,具有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特点。其中,农村题材占据较大比重,农业生产民俗也成为主要民俗事象。如《老农民》,选取山东黄河边的麦草村作为故事发生地,以农民牛大胆在土

^①山曼等:《山东民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第268页。

地改革运动与改革开放中的命运起伏为主线,辅以传奇性的情感纠葛,形成波澜壮阔的史诗性作品。在剧中,农民的生产、劳作场景成为主要叙事空间,几乎所有的对话和冲突都是在不同季节的各种劳作中展开。拉砘子碾轧麦苗、保墒、犁地、耩麦子、浇地、割麦子、轧场、扬场、剥棒子、拧草绳、编草帽、勒高粱秸扎扫帚等农副业生产活动贯穿全剧。电视剧在有效烘托叙事时代氛围的同时,生动地再现了山东地区农业生产民俗的全貌,具有极强的文献价值和民俗学意义。

山东印染业的发展历程也在鲁剧中展现出来。《大染坊》以鲁中地区染布手工作坊的发展壮大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山东周村一个名叫陈寿亭的讨饭少年胸怀大志,被周村的通和染坊的周掌柜收为义子后苦学染布手艺的故事。十年苦心经营后,与人共同创办大华染厂,从此踏上工业印染之路,最终使大华染厂发展成为青岛第二大印染厂。该剧全面展现了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变以及其中的商战智慧。《青岛往事》以从青岛开埠到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以三位异姓兄弟在青岛的创业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青岛第一代移民的奋斗史。其中,为人厚道的王满仓也是以染布作为自己重要的事业,凭借扎扎实实的手艺闯出一番天地。这两部剧均以印染业作为主人公着力经营的产业,全面呈现了主人公艰辛的创业之路。

“玲珑山十八层,金梁玉柱在其中。”山东招远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矿产资源,当地有着悠久的采金历史。《战火大金脉》就是以抗战期间采金老板鲁有道和孟玉琨两家人面临的生死抉择和心灵成长作为故事主线,将玲珑山的金梁玉柱——狗头金的归属作为叙事象征,展现了身处乱世、抗战救国时期采金人的生活状况,上演了一场人性善恶美丑的黄金争夺战,将传统手工采矿的生产原貌呈现出来,将黄金文化、民俗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二) 山东居住交通、饮食服饰、四时节令民俗与逼真细致的生活呈现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独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①鲁剧非常注重民俗细节的铺陈,在居住交通、饮食服饰、四时节令等方面进行多方面再现,使人物的生存环境更加真实可信,充满浓重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域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与乡土密不可分,而对乡土空间的‘怀恋’则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化情结。”^②在居住空间的表现上,鲁剧中的很多生活场景都来自于山东典型的山村民居。电视剧《闯关东》《老农民》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济南章丘朱家峪取景,展现出中国北方地区典型的山村古村落的民居特点。电视剧《红高粱》在潍坊市高密、青州井塘古村、临沂影视基地等地取景,其中井塘古村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是一座历经600余年沧桑风雨依旧保存完好的具有明代建筑风貌的古村落。这里的民居以典型的青州西部山区四合院形式依山而建,门楼由青砖青瓦砌成,门楣雕龙画虎非常精致。村里有保存完好的古石桥、古井、古庙、古石台等,在剧中形成真实的空间效果。《沂蒙》拍摄地沂南马牧池常山村已建成沂蒙红色影视基地。马牧池乡是沂蒙红嫂明德英的故乡,常山村保留着20世纪初的古朴风貌:石板铺成的小巷、山石堆砌的房屋、残垣断壁,均见证着历史的沧桑。这里低矮破旧的茅草屋、稍显杂乱的石头院、小土路、石台阶,带有典型的旧时山乡村景和古村风貌,让剧中故事的时代感更加强烈鲜明。《马向阳下乡记》中所设置的“大槐树村”,主要是在淄博市淄川区涌泉村齐长城风景区拍摄,古朴的山村与秀丽的风光为全剧带来清新自然的生活氛围。《温暖的村庄》在威海荣成俚岛烟墩角社区拍摄,这里有荣成代表

①申载春:《民俗与影视》,《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②曾海津:《乡土叙事与人性观照——评陈玺长篇小说〈塬上童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性的生态民居海草房:“垒石为墙、覆草为顶”,屋顶用特有的海带草苫成,堆尖如垛,浅褐色中带着灰白色调,古朴中透着深沉,又带有童话小屋般的浪漫。电视剧拍摄时,剧组专门请荣成当地的手艺人建造了3座大海草房,又从当地百姓家里收集罐子、渔网、小桌子等日常器物,形成自然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些居住空间不仅提供了真实的生活氛围,还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安土重迁、守候家园的精神品质。正像姜波、田禾、李万鹏编著的《山东居住民俗》中所提到的那样:“‘居住’不仅指单纯的住所,更不仅局限于房屋、院落之类凝固的小空间,它还应该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的生活文化事象的集合,体现着人类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不断的调适与传承,其中涉及到人与人、人与建筑、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综合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说是天地、人合一的整合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居住观念、居住形态和居住行为。”^①

在《沂蒙》中,独轮车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对于穷苦人家来说,出行基本都是靠步行,需要带东西就放在独轮小推车上。剧中,孙旺每次来接大姐,都推着一辆小推车。而老百姓为支前,出动了大量的小推车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场面蔚为壮观。正因为如此,山东人民的小车也成为陈毅元帅口中淮海战役走向胜利的关键因素。此外,当时的交通工具还有马车,村里的人赶着马车来回往返,送鬼子的尸体,接英雄的遗体,逼真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铁道游击队》中,众多英雄在火车上穿梭、对敌斗争;保安队长则骑着一辆自行车,显现出他的身份地位;交通员也经常骑自行车往返,为此引起百姓的怀疑;而在微山湖上,大家则撑着小船往返,尽显湖区风土人情。在《马向阳下乡记》中,马向阳开着一辆拉风的越野车进村,上面还带着一辆山地自行车,洋派的作风给山村带来一股新鲜气息。在《温暖的村庄》中,王一鸣和香玉经常乘坐大巴车出行,而乡里的文化站长则经常开车前来村里视察工作。后来,香玉家中也有了自己的汽车。所有这些交通出行方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在饮食方面,煎饼几乎成为山东人饮食的一种标志。其实,吃煎饼这一民俗在山东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据《山东民俗》记载:“胶济铁路以南,从济南南下的津浦铁路以东,这是以吃煎饼为主的地区;其余地方大都以吃玉米饼子为主。”^②在山东影视剧中,煎饼已经成为一种标志符号,有时起到推动叙事、渲染情感的作用。《沂蒙》中煎饼几乎无处不在,家家户户天天吃煎饼,喝菜糊糊。出门在外,就在包袱里带上一些煎饼。李继长入狱后,父亲去探望他,本来他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就保住性命,但他却坚决不肯,由此父亲只能在悲痛之中喂他吃下最后一口煎饼……那悲壮的场景令人心碎。在前线作战时,村里接到一晚上完成三千斤煎饼的紧急任务,于宝珍大娘跟村里的女人们彻夜不眠地摊煎饼,场面壮观,催人泪下。在《铁道游击队》里,芳林嫂把煎饼当成传送情报的一种工具,把宣传材料藏在煎饼中。在《马向阳下乡记》中,马向阳为村里人出谋划策,发现了煎饼商机,让村里人注册支前煎饼商标。这样一来,一方面让红色文化继续传承,另一方面也让饮食民俗发扬光大。《北方有佳人》则将济南的传统美食一一呈现,马家驴肉、馍馍、油旋、甜沫等在剧中成为重要的泉城文化符号。

在服饰方面,旧时老人流行穿大襟棉袄,用一长布带扎腰。老汉们常将长管旱烟袋、烟荷包和火镰等小物件系在一起,插在腰间。《沂蒙》中的李忠厚大叔就是这种穿戴的典型代表。青年中则流行对襟小褂,《大染坊》中陈寿亭一直坚持穿着中式对襟褂,与卢家驹的西装革履形成鲜

①姜波、田禾、李万鹏:《山东居住民俗》,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山曼等:《山东民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明的对比,显现出他坚守传统、朴实无华的个性特征。

这些生活民俗的细节还原,形成一种逼真的生活氛围,传神地再现了山东地域民俗特色。正如有学者所言:“《沂蒙》中家人围在一起吃煎饼、喝糊糊的情景,还有那农民推着木制独轮车躬身前行的姿态,都让人看到了淳朴的沂蒙百姓形象。……剧中的地域背景、战争或工作生活场景,大都有浓郁的地域民俗特色。如《大染坊》展示了齐国故地的风情文化,《沂蒙》描绘了沂蒙特有的乡土民俗。”^①剧中这些地域民俗文化,正是“对民间原生态生存的真实还原”^②,同时这种还原又满足了当前电视受众回归传统的文化心理需求。

(三)山东礼仪家庭、民间信仰民俗与多元的文化立场

山东是孔孟之乡,一向以“礼仪之邦”著称,所行礼俗源远流长。在人生礼仪方面,婚丧嫁娶各有其既定的礼仪规矩。在影视剧中,宏大喜庆的婚礼场景最为常见。《沂蒙》的开头就是结婚场景,吹吹打打的响器班子、红红的花轿、红红的盖头、新娘下轿时的步步高升、簇拥满院的邻里乡亲、“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的传统拜天地礼仪,热闹而不失庄重。在山东的很多地方,结婚被称为娶媳妇,娶媳妇的仪式又简称拜堂,拜堂即拜天地,不拜天地则意味着婚姻仪式未曾圆满。这表面看来是很迂腐的规矩,其中却蕴含着山东人尊天敬地和仁孝节义的文化立场。在《沂蒙》中,继成与心甜的婚礼被鬼子冲散,未能完成的拜堂仪式成为心甜内心一生的遗憾,直到曾背叛她的继成病重归来,他们又在山上完成了那未完成的拜天地仪式,实现了令人心酸的圆满。

然而,旧时代的传统婚俗却也夹杂着一些保守和落后的思想。比如父母之命的婚姻,使得女性大多成为牺牲奉献者。《沂蒙》中的大嫂,虽然名义上的丈夫在结婚当晚就逃走,但是她却一直恪守妇道,还抚养了丈夫与后来妻子所生的孩子,也从未有过怨言;二嫂在丈夫背叛后也是选择守在家里,任劳任怨地为家庭操持一切。这其中的坚守和牺牲令人动容,却也让人们为这两位主人公深感不平。电视剧《红高粱》延续了电影中的颠轿等婚礼习俗,却并没有传达出原著的原始生命意味。其实《红高粱》原著有某种女性解放的元素,九儿大胆地冲破封建枷锁,跟当了土匪的余占鳌生活在一起,还为他生了孩子。然而,在电视剧中,九儿始终不肯跟余占鳌生活,几次三番地拒绝他进家门,总是劝他走正路,这里的九儿远不如小说里的九儿活得恣意洒脱。而新增加的人物大嫂淑贤,则是守着贞节牌坊过日子的寡妇,其悲剧意义更加鲜明。《大金脉》中孟玉琨嫁女儿孟喜莲时把自己家价值连城的“狗头金”作为陪嫁。然而,对方的儿子鲁家山因为已经有了恋人而拒不拜堂,孟喜莲却一直视鲁家山为丈夫,几次为他出生入死,倾其所有。《闯关东》中的鲜儿在逃亡去东北的路上跟家人失散,与未婚夫朱传文走陆路北行,传文染病,危在旦夕,鲜儿卖掉自己给传文治病,传文病好后一人上路。而鲜儿则历尽波折,在千辛万苦之后才走到东北,跟随戏班学戏唱戏,为救班主而受辱,后被山场子的人所救,碰巧遇到传文的弟弟传武。当她回到朱家的时候,传文却已经跟别人结了婚。放牛沟富户的韩老海之女韩秀儿喜欢上传武,传武被父亲所迫与她结婚,却并不喜欢她,她一直苦苦地等待着传武回头,最终疯疯癫癫失去自我。《大秧歌》中多次出现热热闹闹的传统婚礼场景,但几乎每次都阴差阳错地因意外而未能完成。更离奇的是,吴家大小姐身穿大红嫁衣把自己嫁给“已死”的海猫,丫头赵香月则披麻戴孝要给

①彭秀坤:《新世纪山东电视剧的价值坚守与审美取向》,《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②李宗刚、郭洪云:《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评电视剧〈沂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海猫做未亡人,两人多次为了这个穷小子而大吵大闹。这里的女性看似大胆叛逆,实质却依然是为了男人而牺牲自我,而且情节过于戏剧性,不太符合生活现实。与此相反,在《北方有佳人》中,来自苏州、在济南与亲人走失的女孩寄萍身上,就少了山东姑娘常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她没有像其他的女主人公一样,对收养自己的人家感恩戴德继而以身相许。虽然养母在内心中一直把她当作“童养媳”,认为当她长大之后跟哥哥圆房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她却自有主张,在养母的屡次逼迫下假装跟哥哥拜堂,却在结婚当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致使哥哥不得不离家出走。寄萍个人其实也是有所牺牲的,她为了亲弟弟能上学而去学唱小曲,挣钱养家。只是她的身上多了一点现代意识,不愿牺牲自己的爱情。

在山东的家族乡社民俗中,特别重视家族的规矩。在家庭中重家教,尤其注重孝道。《沂蒙》中于宝珍每年冬天的晚上都为婆婆烧一块热石头暖被窝,当她老了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媳也同样为她送来烧热的石头暖被窝,孝道的传承就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生活民俗细节体现出来。《老农民》中牛大胆虽然一生胆大,却不敢违背父亲临终的遗言。父亲不许她娶“灯儿”,他含泪跪在父亲棺前发誓,父亲才瞑目而去。之后,虽然灯儿对他情深义重,他还是不敢与她成亲,灯儿只好另嫁他人,两人历经波折直到晚年才重新走到一起。《大秧歌》中吴乾坤也总是把以孝治家挂在嘴边,对心肠歹毒的母亲甚至达到一种愚孝。母亲拿棍子打孙女,他为了保护女儿而头破血流,却从未对母亲有半句怨言。

山东民间信仰的范围相当广泛,人们一般不刻意区分佛教、道教,而是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进行信仰崇拜。民间信奉较普遍的神祇有天地神(俗称“老天爷”)、灶神、财神、山神、河神、海神娘娘、城隍、土地神等。在山东沿海各县,对海神娘娘的崇拜信仰更加突出。据说,海神娘娘是五代时福建莆田林姓之女,梦中救过海上遇难者,后被尊为海神。元明以来,由天妃晋封为天后。各处都建有天后宫,俗称海神娘娘庙。《大秧歌》中表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胶东一带,当时已经有一定的新思想在此传播,然而在大部分民众那里,还是深深受到民间信仰以及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对海神娘娘的信仰达到一种极端的状态,每年人们都会在海神娘娘生日那天表演大秧歌,祭祀海神娘娘,有时甚至还要用活人作为祭品。村里因为吴赵两家的恩怨而禁止两姓通婚,一旦有通婚者则要被抓沉海。这里的民间信仰虽然是由海洋渔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但是被当地封建势力所利用。因此,严重束缚了当地人民的精神思想。

从以上多部电视剧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鲁剧带有一定保守倾向的传统文化立场。一方面反映出山东人仁义善良、淳朴无私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山东人固守传统、泥古不化的守旧局限。

(四)山东方言、戏曲、歌舞民俗与原汁原味的视听再现

鲁剧中的人物,多数都讲普通话。但是,在强调地域化倾向的电视剧中,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方言色彩。比如《沂蒙》追求真实自然、朴实无华的风格,剧中的人物语言也都带有较强的方言腔调。剧中于大娘经常说“你知不道”“老落后”。她对于孩子们的称呼具有非常典型的旧时代山东农村风味,三个女儿分别叫“大妮”“二妮”“三妮”,对于出嫁了的大女儿则称呼“老孙家的”,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媳妇则叫“他大嫂”“他二嫂”。忠厚大叔则称呼老伴为“屋里头的”。直至于大娘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有了自主独立的意识,在申请入党的时候,由党的领导为她取了于宝珍这个名字,接着她也给两个儿媳妇起了名字:心爱、心甜。至此,这里的女人才结束了没有名字的生活。然而,忠厚大叔还是很看不惯,他说老伴“你要是能当官,狗都能驾辕”。所有这些生动质朴的语言都表现出了旧社会农村妇女在社会、家庭中所处的地位。

山东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地方剧种很多,其中吕剧、柳子戏、五音戏、梆子戏传唱较广。为了增加地方戏曲的元素,《老农民》中把乔月设置成一个戏班子成员,跟随马仁礼来到麦香村,因为马仁礼的地主成分而与他分手,转而追求牛大胆。在剧中,她多次唱起吕剧小段,比如《井台会》选段:“蓝瑞莲挑水桶自思自叹,想起了伤心事好不伤惨,我舅舅图钱财把我来卖,卖进了周家门受尽熬煎。”尔后,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乔月站在田间地头唱起了自编的吕剧小段《歌颂英雄牛大胆》:“麦香河三呀三道弯啊,麦香村出了一个人尖尖儿,他领着大伙儿闹土改,他的名字就叫牛大胆,就叫那牛大胆。”同样都是唱戏曲小段,人物前后的精神面貌已经截然不同。《铁道游击队》中特务队副队长丁二牛醉醺醺地唱着吕剧《下陈州》中的经典唱段:“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唱腔诙谐有趣,非常符合丁二牛的丑角身份。

山东的地方曲艺也较为发达,其中以山东快书、山东琴书、评书等艺术形式最受欢迎。电视剧《北方有佳人》以泉城济南作为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再现了当时曲艺兴盛的民间书场。剧中寄萍为谋生计跟师傅殷诚茹学唱的小曲子,即是山东琴书。山东琴书原名“庄稼耍”,早期叫作“小曲子”,是一种流行于鲁西南农村中的民间曲艺形式。它以唱为主,以说为辅,最早形成于曹州(今菏泽地区)一带,后陆续传入济南等地。清末,山东琴书呈现兴盛局面,名家辈出,流传广泛。山东琴书按照地域派系,可以分为南路、东路和北路三支。济南是北路琴书的中心,经过不断吸纳融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邓九如是“北路琴书”创始人。1933年,他和其他名角赴天津演唱,在广播电台录制时,正式将“邓派琴书”定名为“山东琴书”。为适应济南观众的需求,他对演唱作了一番调整。如把鲁西南话改为济南话,用济南方言演唱琴书,对老曲调进行板式变化,创作出独特的北路唱腔等。《北方有佳人》中的师傅殷诚茹身上,便有邓九如先生的影子。山东琴书一般由数人搭档演唱,分别扮演不同角色,演唱、伴奏集于一身。以扬琴、坠琴、胡琴、筒板为主要伴奏乐器,曲调缠绵委婉,十分动听。现在山东琴书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北方有佳人》通过寄萍的成长学艺展现了山东琴书的发展历程,其中多次加入了山东琴书的唱段,如《反正话》中:“太阳出西落在了东,满天的月亮一颗星,万里晴空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断桥相会》中:“泪汪汪拉官人不肯撒手,尘世上你算个负义之流。自从你上金山挂袍还愿,哪一宿俺不等你鸡鸣更收。光恐怕好茶饭不到你口,又恐怕衣服破烂无人补修。又恐怕你吃醉酒倒卧街巷,又恐怕你到夜晚没人伺候。”另外,还有《吕洞宾戏牡丹》《刘伶醉酒》等剧目中的片段,由北路邓派山东琴书唯一传人姚忠贤为其中的师傅角色配音演唱,还原了北路琴书的声腔韵味。

民间小调和民间歌曲也是增强地域文化色彩的一种重要元素。《沂蒙》中把《沂蒙山小调》作为该剧的主题音乐,剧中的人物在剧情高潮时总是唱响这首诞生于临沂费县薛庄镇上白石屋村的民歌:“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这样一来,原本抒情的曲子因为电视剧苍凉的底色,便增添了更多的雄伟悲壮气息。《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员小坡赶车时,唱着修改后的民间小调《十二月调情》:“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光见这二妹子长得个年又轻,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着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我看到二妹子坐在大门口。”欢快的曲调调节了剧情节奏,增加了活泼的生活气氛。《马向阳下乡记》中齐槐跟老祖奶学唱了泗水地区在抗战时期流传的民间歌曲《大辫子甩三甩》:“大辫子甩三甩,甩到了翠花崖,娘啊娘啊,队伍要往哪开,

小妮子,你别哭,哭也是挡不住,队伍他行军不兴带媳妇。”一首民歌唱出了当地民众积极参加抗战的热情。

山东民间乐舞发展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秧歌是汉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一般由舞者扮成各种人物,手持扇子、手帕、彩绸等道具。山东秧歌有鲁北的“鼓子秧歌”、鲁东的“胶州秧歌”、胶东的“海阳秧歌”、鲁中的“平阴秧歌”等,其中“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海阳大秧歌”最为有名,号称“山东三大秧歌”或“山东三大民间舞蹈”。^①在电视剧《大秧歌》中,海阳大秧歌作为该剧着力表现的民俗文化,在剧中多次出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大红大绿的服装、色彩明艳的花伞、绸缎极具民间意味,鼓乐齐鸣、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而赵、吴两大家族利用斗秧歌的机会你争我斗,甚至暗藏武器、痛下杀手,给原本欢乐的秧歌场景增加了更多的紧张气氛和戏剧冲突。在日军侵略时期,大秧歌还成为一种反抗侵略者的手段。主人公海猫改编的秧歌歌词戏弄了日本军官,振奋了虎头湾人民的士气。

总体而言,鲁剧对山东方言、戏曲、歌舞民俗的运用增强了电视剧的视听效果,渲染了地方色彩,传播了地域文化。

二、鲁剧民俗呈现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一) 民俗事象成为点缀,未能构成真正意义的民俗奇观和表现主体

申载春在《民俗与影视》一文中指出:“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②复制式一般是指影视作品对民俗形式的客观记录,而点缀式是民俗在影视作品中作为营造时空氛围的背景和衬托。点化式则是将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作为一种审美意象上升为影视表现主体。当前,山东电视剧中对民俗事象的表现,大多数还只是点缀式。比如电视剧《大秧歌》,从标题来看是最注重民俗事象的。该剧也是以海阳作为故事发生地,并在剧中多次加入虎头湾村民斗秧歌、舞秧歌、唱秧歌的场景。但是,海阳大秧歌这一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民俗,在剧中并没有能够细致到位地呈现出来。观众看完电视剧,还是没能真正了解到海阳大秧歌与别的地方的秧歌到底有何不同、乐大夫又在秧歌队起到什么作用、大秧歌又是如何跟当地人的节庆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电视剧讲述身世悲惨的孤儿海猫,从一个油嘴滑舌的小叫花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战士的过程。然而,海猫的成长并没有能够与海阳大秧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抗战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海猫婚恋的纷争,不断消解着民俗文化本身的魅力。该剧整体叙事节奏拖沓,也影响到海阳大秧歌的有效传播。

(二) 在还原民俗和创新民俗的边界上存在偏差

影视剧对民俗的表现不应是机械的复制,而应是根据剧情需要进行意象化、情感化的提炼与创新。但是,在还原与创新的边界上,应该把握好尺度,注重两者兼顾。

比如,电视剧《沂蒙》处处用心打造、还原真实的民俗空间。在人物服装造型、化妆等方面力求朴素自然。于大娘身穿补丁摞补丁的大襟棉袄,两位儿媳妇和女儿的棉袄也只是有点碎花图案。已婚女性全部都绾着圆圆的纂,脸色更是因为整体滤镜的原因而愈发灰暗。真实自然的装扮让人如同回到那个年代,更深切地感受到沂蒙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而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

^①山曼等:《山东民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第434-435页。

^②申载春:《民俗与影视》,《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依然毫不犹豫地支持革命队伍,这种精神是何等的无私和可贵!《沂蒙》中无论是女人们的大襟衣服,还是土得掉渣的盘发,还有似乎是抹了煤灰的脸庞,以及那浓浓的沂蒙腔,都带来厚重的地域色彩。正如李掖平在评价歌剧《沂蒙山》时所说:“全剧的色调基本以灰黑、土黄为主,这种贯穿全剧始终的暗色调,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史风貌和战乱岁月的真实写照。”^①电视剧《沂蒙》的整体色调正是为了突出其真实感和时代感。从还原民俗的角度,《沂蒙》极为贴近生活,并与该剧悲壮苍凉的艺术风格相吻合。但是从视觉呈现上来看,黑白的底色、阴郁的调子使全剧充满压抑的氛围。与之相反,电视剧《红高粱》同样是一部史诗级抗战大剧。故事发生在与沂蒙相隔不远的潍坊高密,而且该剧也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进行了部分场景的拍摄。但是,《红高粱》电视剧的整体色彩是偏亮色的唯美主义风格。剧中九儿虽是农村女孩,身上却没有一丝农村人的土气,从她的发辫妆容到服装,虽然也是具有年代感的样子,但却极富时尚感的元素。这些看起来精致华美,却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两部电视剧对于民俗的不同表现方式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值得认真考量,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对于现实主义风格的电视剧,还是应该以还原民俗真实为主,而不应为了美感而抛弃真实。

曹保明也曾撰文指出,电视剧《闯关东》中有一些违背东北民俗的细节。比如“放山伐木放排人的鞋子应该穿的是一种叫‘靰鞡’的东西,而不是毡疙瘩”“用‘鲁味小凤凰’替代‘爆炒活鸡’是重要的失误”^②,等等。虽然这些问题也许都是一些微小的细节,但是如果观众对这种细节产生质疑,肯定会影响到整部剧的观感和评价。而对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大多数观众来说,也会让他们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因此,虚假不实的民俗表现造成的影响不堪设想。

(三)传统民俗与抗日故事的结合有套路化的倾向

山东电视剧的民俗表现往往与抗日战争题材结合在一起。虽然这样叙事容易形成历史感的故事、传奇性的人物,但是大量这样的作品放在一起,观众也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战火大金脉》《大秧歌》等剧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特点,并且采用了“民俗+抗战”的叙事模式。一方面,以山东地域民俗作为全剧的结构性线索;另一方面,又以抗战时期主人公深明大义的革命故事作为叙事主体,在历史时空中讲述荡气回肠的人间传奇。这种叙述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既能够展现齐鲁大地的传统民俗风貌,又能塑造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同时还能通过起伏跌宕的抗战情节吸引观众。然而,这种叙事的有效性还应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创新之上,否则就会形成固定的叙事套路,从而失去对观众的吸引力。

(四)农村现实新民俗的表现不够充分

山东电视剧的选材多以历史感、年代感见长,对于当下鲜活的美丽乡村建设等现实表现和农村新民俗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只在少数作品中有所涉及。如《温暖的村庄》在山东威海荣成取景拍摄,当地渔民所居住的海草房是荣成特有的民俗建筑,电视剧以此为背景,尽显海边渔村风情。该剧围绕一个乡村男孩追求歌唱梦想的历程展开,广场舞作为一种新的民俗现象贯穿全剧,而由村里妇女们组成的舞蹈队编排的节目中加上了晾海带、晒渔网等独出心裁的动作,使节目充满生活气息。荣成渔家锣鼓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荣成渔民在沿海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历史氛围和长期的海上作业中,形成的一种别具特色的民间音乐形式。早在明代,当地人就用锣鼓这种古老的乐器演奏乐章,表现大海的雄浑浩瀚,鼓舞人们与大海斗争的信心与勇气,表达满载

①李掖平:《感天动地〈沂蒙山〉》,《求是》2019年第21期。

②曹保明:《电视剧〈闯关东〉严重违背东北民俗》,《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而归的丰收喜悦。《温暖的村庄》中,在欢送王一鸣去市里比赛和迎接王一鸣胜利归来的时候,村里人都会在车站组织锣鼓队,制造欢乐气氛。此外,村主任老婆黄秀美做柳编工艺品,王一鸣的父亲王不开赶小海收海货,刘香玉的父亲开的渔家乐除了展示当地海鲜之外,还有胶东大饽饽等特色饮食。从这些民俗的展示来看,该剧具有一定的地域色彩。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虽然剧中村庄取名为天鹅湾,因为受拍摄时间的限制,没有拍摄到大天鹅到当地栖息的美好画面。因此,剧情也未能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展开,只拘泥于王一鸣选秀这一件小事,未能表现出新民俗,以致影响了整部剧的格调。

三、山东民俗与鲁剧的创新策略

用现代化影像讲述山东故事,还需要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创新叙事策略,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更新视听画面,用现实主义的原则提升民俗文化精神的新高度。

(一)拓展叙事题材,挖掘培育更多的民俗故事生长点

山东既有泰山文化、黄河文化、圣人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海洋文化、民间戏曲、民间传说及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有山东杨家埠木板年画、六千年历史的博山陶瓷、驰名世界的潍坊风筝等民间工艺,还有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王羲之、王士禛等历史文化名人。当前的鲁剧只是开发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还有大量的民俗文化故事值得深入挖掘。如戴永夏在《山东民俗琐话》中所说:自清代开始,菏泽的花农就将牡丹运往广州出售^①,中间辗转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这其中应有很多值得书写的故事。又如山东阳谷县城北的两个村庄都叫“迷魂阵”,这里街道走向斜曲,房屋朝向不一,外人进村,很容易迷失方向。传说这里是战国时期孙臆大败庞涓的古战场,是中国军事文化的活化石。这种特殊的建筑格局结合历史故事,也能生发出精彩的影像画面。还有外地人常用大葱来比喻山东,而自明代嘉靖年间,山东大葱就被封为“葱中之王”。将“葱高、白长、脆嫩、味甜”的章丘大葱的种植历史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现实相结合,亦能产生具有品牌效应的传播热点。

(二)强化叙事策略,营造有机整体的民俗叙事格局

在叙事中,应将行业与民俗、人物与民俗、地域与民俗、故事与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打造属于齐鲁大地的民俗奇观。具体来说,就是运用有机整体的叙事观念来结构全剧,以某个民俗事象作为叙事主体,以富有山东地域特色的地理风貌和自然空间作为背景,同时将某个行业的历史进程、血肉丰满的人物、悬念迭起的情节串联起来,使服装、饮食、节庆、建筑、交通等日常民俗为剧情服务,形成既富有文化气韵又具有叙事张力的大剧气象,向社会铺展一幅巨大的齐鲁大地民俗画卷。

(三)调动视听影像技巧,用现代化的手段让古老的民俗焕发活力

当下的影视市场,运用数字特效营造的宏大场面往往更能够赢得受众关注。我们在表现传统民俗的时候,也不应该一味沿用旧模式、老手法,而应当大胆地将新的技术手段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在必要的时候运用特效手段来还原民俗场景,用流行音乐对接民间乐曲,启用年轻演员参与表演,从而打造更为新鲜的视听体验。

(四)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创作中,应当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坚守文化精神的高度,用辩证的态度去看待民俗文化。

^①戴永夏:《山东民俗琐话》,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对陈规陋俗进行彻底批判。任何一个民俗事象的出现都有历史传承,而对任何一个民俗事象的表现背后都有其文化态度。比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像是一个缩微的古代民俗博物馆。尤其是创造性地放大了“点灯”“封灯”“捶脚”等环节,表面上看似似乎是一种猎奇,实质上是对古代一些陈规陋俗的鞭挞,对封建制度下滋生的男尊女卑的一种批判。而在《红高粱》之中,“颠轿”“唱酒神曲”等场景均在表现主人公喷薄而出的生命张力。因此,影视剧中对民俗的表现,也不应该只是让其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应紧密结合剧作主题,提升全剧的文化品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Shandong Folk Customs and Innovation of Shandong TV Series

He Cai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custom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is very close. In recent years, Shandong TV series have made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ese achievements d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reators of Shandong TV series who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discovery and presentation of Shandong folk customs, such as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folklore in Shandong and the choice of valuable and grand themes, folklore about living and transportation, food and clothing, festivals and vivid and detailed life presentation, Shandong family etiquettes, folk beliefs and multiple cultural standpoints, Shandong dialects, operas, songs and dances about folk customs and Shandong TV series' audio-visual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Of cours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folk customs in Shandong TV series, such as folk customs not constituting the real subject of expression, deviation i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estoration of folk customs and the innovation of folk customs, tendency of routine i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and anti-Japanese stories, and insufficient representation of new folk customs in the rural reality. The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Shandong folk customs and Shandong TV series also needs to further expand the subject area, strengthe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update the audio-visual language with modern technical means, raise the folk culture spirit to a new height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alism, and treat folk culture with a dialectical attitude.

Key words: Shandong folklore; Shandong TV series; narrativ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孙秋英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研究现状分析(2007—2019)

——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①}

金晓艳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摘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CNKI数据库,对2007年至2019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领域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相关文献进行筛选统计,从文献增长规律、研究机构分布、高被引作者、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研究发文量呈现出先升后稳的趋势。尽管整体发文量较多,但尚未形成具有一定科研说服力的核心作者群,合作情况也不甚乐观。目前,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践行”等为热点的研究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焦点包括:传播内容研究、传播路径研究、传播有效性研究、传播机制研究以及传播受众群体研究。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献计量分析;文献增长;发文机构;文献作者;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 D07;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1)01-0133-1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14

本文综合运用CiteSpace软件和文献计量法,对基于CNKI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数量、期刊分布、机构分布、作者群体、研究热点等方面的分析,力图对2007—2019年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已有文献情况进行系统了解。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有利于揭示文献数据信息内部的现象和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以及今后的研究走向,从而为未来的深化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定量依据。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③两次会议均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这些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精髓。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④,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 收稿日期:2020-12-03

作者简介:金晓艳(1973—),女,吉林敦化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134101254)的阶段性成果。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价值观的高度概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规定性,因此,本文所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经提出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的程度。因此,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选择“文献”,检索条件:主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含“传播”,检索得到时间跨度2007—2019年的文献5,165篇。在以上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关键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时间跨度2007—2019年的文献3,009篇,剔除通告、讲话稿、征稿须知等非学术文献和一些与本文主题相距较远的文献后,共得到时间跨度为2007—2019年的文献2,394篇。以此作为本文的数据基础,借助Excel工具和CiteSpace软件,得到如下计量信息。

一、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与发文分布

本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文献的文献年量化、文献所在期刊、文献发文机构的情况。

(一)文献数量及阶段划分

科研论文数量的多少及变化轨迹可以反映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水平和速度。^① 科研论文的数量是衡量领域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文献的数量与年际关系,是揭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研究情况和发展速度等的重要标准。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指出:在某一学科诞生初期,其文献数量处于不稳定增长阶段;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其文献数量便进入指数型增长阶段;当学科理论成熟,其文献数量增长减缓,进入线性增长阶段;随着学科理论完善,其文献增加日趋减少。^②

1. 文献增长情况

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图1反映了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研究发文量的变化趋势:整体呈现出先升后稳的趋势。2007—2012年度发文量均不足50篇,整体发文也不足100篇,属于萌芽期;从2013年开始发文量出现大幅度增长,2014—2019年每年发文量均超过200篇,属于先快速增长后趋于高频稳定的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要求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重视。

2. 文献发展阶段

“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是根据文献数量来判定某年或某阶段的研究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的两个重要参照指标。“文献累积数”是指当年及以前文献数量的简单累加,标志着当年能够查询到的文献总量,可以反映研究规模的大小;“文献累积率”是当年发文量与上一年度文献累积数的比率,可以反映某一年度发文量是否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以此判断该领域研究热点是否

^①陈新忠、张亮:《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的轨迹、现状及热点——基于1986—2016年CNKI期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现代教育管理》2018年第6期。

^②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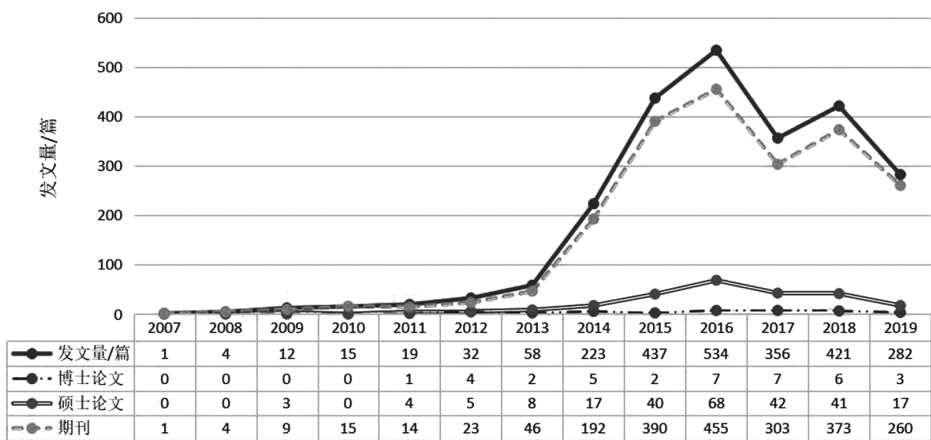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发文量统计

形成。^①表1反映了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的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

表1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

年份	发文量/篇	文献累积数(个)	文献累积率(%)
2007	1	1	-
2008	4	5	400.0
2009	12	17	240.0
2010	15	32	88.2
2011	19	51	59.4
2012	32	83	62.7
2013	58	141	69.9
2014	223	364	158.2
2015	437	801	120.1
2016	534	1,335	66.7
2017	356	1,691	26.7
2018	421	2,112	24.9
2019	282	2,394	13.4

总而言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从2007年到2019年经历了从缓慢增长到快速增长并渐趋稳定的发展过程。2007—2011年每年的发文数量均低于20篇,且文献的增长趋势较为缓慢,文献累积率波动幅度大;2014年后文献数量每年均高于200篇,说明从2014年开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的大热点。

(二)期刊分布及被引期刊文献

^①陈新忠、张亮:《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的轨迹、现状及热点——基于1986—2016年CNKI期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现代教育管理》2018年第6期。

1. 期刊分布

文献资料的完整全面、代表性程度高低,是能否做好研究的前提。因此,了解某一领域的文献期刊分布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对文献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文献的空间分布特点,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并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情报依据。表2是针对2,085篇期刊文献的统计,它反映出刊文量超过20篇的期刊有10个,其中《新闻战线》的刊文量最多,达到64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是2015年创刊的双月刊,从期刊名称就能看出其与本文研究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能反映出国家和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传播的重视。

表2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发文量前20位的期刊统计

排名	期刊名	载文量	排名	期刊名	载文量
1	新闻战线	64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18
2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36	12	才智	16
3	人民论坛	34	13	传播力研究	16
4	思想教育研究	25	14	西部广播电视	16
5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4	15	智库时代	16
6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4	16	法制与社会	14
7	学理论	22	17	广西社会科学	14
8	教育现代化	21	18	传媒	13
9	青年记者	20	19	新闻传播	13
10	新闻研究导刊	20	20	亚太教育	13

2. 被引期刊文献

被引次数,即被引量,是指文献发表后被其他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引证过的次数,被引量的多少可以判断该文献引起同行反响的程度和质量水平的高低。^①同时,高被引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热点、方向。表3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被引次数居前20位的核心期刊文献(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情况。

可以看到,被引居前20位的核心期刊文献中有4篇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上,有2篇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结合表2综合分析可知,被引居于前20位的核心期刊文献中仅有5篇分布于发文量前20位的期刊上。核心期刊文献的学术地位和科研深度相比之下更高,因此其可资借鉴性理论上更高,被引量较大的这类文献自然更具代表性。

(三) 发文机构分布

本部分对发文量排名前20位的机构及其发文总量进行统计(仅计算文献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表4显示本研究所选文献中所涉及的发文机构以高等院校为主,且以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为主要代表,发文量超过20篇的机构有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4所高校,说明拥有更好的科研人才和科研条件的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关注度颇高,师范类院校作为后备役教师力量的培育机构是其传播的中心。

^①王耀文、刘水胜:《专题文献著者群评价——一种“标准化”方法的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4期。

表3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核心期刊文献统计

排名	篇名	作者	期刊名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下载次数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党建	2014	215	4,930
2	家风家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孙兰英、卢婉婷	思想教育研究	2014	179	5,083
3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顾海良、张岂之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	157	15,762
4	微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于安龙、刘文佳	中国青年研究	2014	120	4,351
5	借力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几点思考	王金磊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	115	4,165
6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考	唐平秋、卢尚月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113	3,204
7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颜小燕、康树元	教育与职业	2014	102	4,808
8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建构研究	李勇	电化教育研究	2015	98	4,972
9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潘玉腾、陈赵阳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97	3,656
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培育途径	关洁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3	92	3,362
11	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	陆树程、杨倩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	88	3,119
12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与培育	任艳妮、秦燕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78	3,565
13	微文化生态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张春美、陈继锋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67	1,622
14	精神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	骆郁廷、郭莉	教学与研究	2014	67	1,844
15	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制探析	郑洁	社会科学家	2014	63	2,749
16	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制建设	周宏	理论导刊	2014	63	1,808
17	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渠道——以新媒体传播正能量为例	胡剑慧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	63	2,326
18	民族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模式研究	陈颜、张志坚、陈金龙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60	3,211
19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变化及对策	陈志勇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58	1,460
20	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危机及治理路径	唐平秋	探索	2015	57	2,169

表4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发文量前20位的机构统计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1	福建师范大学	23	11	电子科技大学	13
2	华中师范大学	23	12	武汉理工大学	13
3	西南大学	22	13	郑州大学	13
4	华东师范大学	20	14	河南大学	12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8	15	湖南师范大学	12
6	西华师范大学	17	16	中国传媒大学	12
7	安徽大学	15	17	北京交通大学	11
8	江苏师范大学	15	18	广西师范大学	11
9	南开大学	15	19	湖南大学	11
10	东北师范大学	14	20	吉林大学	11

二、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的文献作者分析

本部分从作者发文量、核心作者群、作者合作关系等方面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一)文献作者发文量统计分析

对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是了解领域内文献作者情况的重要途径。按普赖斯的理论,发表论文数为 m 篇以上的作者为杰出科学家即核心作者,其中 $m = 0.749(n_{\max})^{1/2}$ 。^① 样本中 n_{\max} (作者最大发文量)为7(第一作者),计算可得 $m = 1.98$,因此,发文量达2篇及以上的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如图2所示,经统计所得数据中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所谓核心作者有221位;通过进一步计算发现,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221位作者共发文532篇,约占总文献量22.4%,与普赖斯定律的理论值50%相差较大,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具有一定科研说服力的核心作者群,目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研究尚待完善。鉴于文本所限,我们按照发文量多少将前20位作者列出表5。

由图2和表5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广受关注,该领域的发文作者数量庞大,而单个作者的发文量情况却较为分散,发文量最多的刘艳萍发文仅7篇,文献数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仅有刘艳萍、陈佳、李延生、马娟和张文明5位。这说明该领域虽广受关注,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仍未出现领军类人物,作为新兴领域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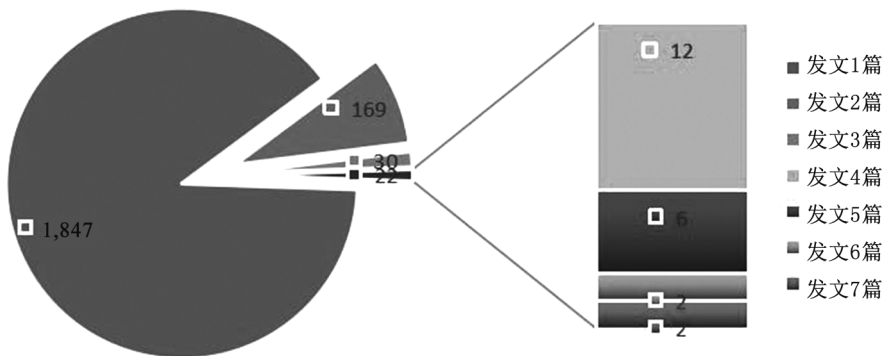


图2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发文作者统计

表5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发文作者前20位统计

序号	发文作者	发文数量/篇	序号	发文作者	发文数量/篇
1	刘艳萍	7	11	李蕊	4
2	陈佳	5	12	王慧	4
3	李延生	5	13	陈伟军	3
4	马娟	5	14	邓纯余	3
5	张文明	5	15	董军华	3
6	陈俊	4	16	方世荣	3
7	高建华	4	17	龚超	3
8	何修猛	4	18	侯寅	3
9	胡洪彬	4	19	金奇	3
10	李鹏	4	20	李晶	3

①邱均平、王明芝:《1999—2008年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情报杂志》2010年第2期。

(二)文献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可更为直观地看出语言资源研究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启用 CiteSpace5.6.R1 软件,将 Node Types 设置为“Author”,确定分析数据 I 值的设定,其他设置维持默认,运行进入可视化界面后得到由 164 个节点、41 条线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图谱,进行微调之后呈现图 3。



图 3 2007—2019 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作者合作图谱

图 3 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作者数量虽多,但彼此间的合作并不密切,仅形成了像包有或、冯小燕和罗洪这样的 3 个三人合作群,以及唐平秋与卢尚月、蔡惠福与刘大勇等此类约 30 个两人合作群,此外罗文东与郑洁、张明海与周艳红等之间也有合作。总而言之,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领域的作者之间合作较少。由此来看,各高校、机构及作者之间应加强合作,促使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2007—2019 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 CiteSpace 5.3.R11 版本对所得文献进行作者情况分析,将 Node Types 设置为“Keyword”,Pruning 选择除 MST 之外的其他三个选项,其他设置维持默认,得到图谱并进行调整后呈现图 4。

可以看到,图谱中呈现的节点数量较多,这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关涉问题较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词关涉到国内外、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等诸多方面。而“传播”则更多关涉到教育、互联网、媒体、大学生、青年等领域主体和方式的问题。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性、现代性和多元化。图 4 也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时间是在 2012 年之后,这与前述统计和现实情况相符。

(二)热点统计

以 CiteSpace 软件关键词共现技术中 Export 选项的 Network summary table 功能输出相对应的表格作为数据基础,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领域文献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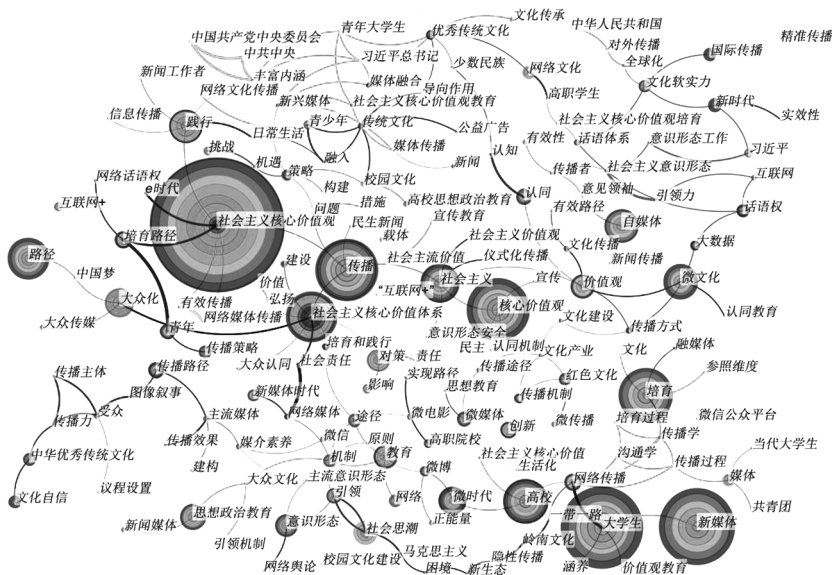


图4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关键词共现图谱

现频次是基于软件程序筛选出的频次,中心性隐含关键节点信息,CiteSpace 运作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表6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教育”“微时代”“对策”是依据频次顺次排列的关键节点。而高频如“大学生”“新媒体”等中心性较低,研究时应注重区别。

表6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870	0.38	11	社会主义	65	0.36
2	大学生	400	0.06	12	自媒体	57	0
3	新媒体	336	0	13	教育	49	0.27
4	传播	198	0.56	14	微时代	48	0.22
5	核心价值观	193	0.08	15	思想政治教育	45	0.02
6	培育	126	0.08	16	微文化	43	0.02
7	高校	95	0.37	17	大众化	43	0.06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87	0.68	18	对策	37	0.1
9	路径	80	0	19	意识形态	36	0.07
10	践行	78	0.19	20	社会思潮	35	0.09

(三) 突现关键词

除了上述的频次关键词外,CiteSpace 运行关键词分析之后还会产生图5所示的突现关键词,它清晰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这一阶段的突现词、突现强度和起止时间。“突现词”可以展现知识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图5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上位概念产生最早且突现强度最强,强度次之的是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媒体”;“大数据”“文化自信”“红色文化”“传播策略”“策略”是近年产生的突现词,应重点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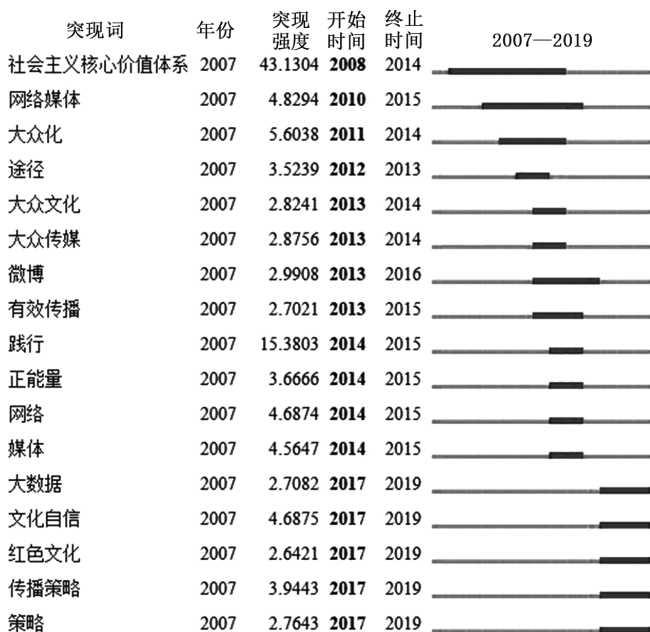


图5 2007—2019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文献突现关键词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评析

通过上面的文献统计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亟需进一步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问题作出理论建构与实践生成的双重回应。因此,学术界掀起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热潮,呈现出研究成果丰富化、研究视野多维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的整体态势。

首先,研究成果的数量变化趋势。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后,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开始进入发展萌芽期。自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和轴心地位,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以及“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目前,相关研究已经进入高频稳定的发展期。

其次,研究成果的内容转变。以2013年作为时间分水岭,相关研究从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逐渐转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探索”。具体而言,从文献主题来看,2013年以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界定、特征分析、战略意义讨论、理论发展流变等方面展开。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①“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②从此,为了适应培育和践行层面的现实要求,国内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8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82页。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传播内容研究、传播路径研究、传播有效性研究、传播机制研究和传播受众群体研究。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研究

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指向已然明确,但是如何丰富并净化传播内容,增强内涵吸引力,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要点之一。为了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一方面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代中国故事中集聚优质素材,使传播内容不断丰富;另一方面要精准对接民众的心理特点和情感需求,使传播内容对受众产生吸引力。^①

网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前沿阵地之一,但是网络传播内容却具有极强的不可控制特点。目前部分网络传播内容存在低俗性、虚假性、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性等现象。如何构建一个风清气正、健康绿色的网络传播生态,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众多学者纷纷强调,互联网生态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严格把关、平台责任意识的提高以及用户信息选择自觉性的加强,唯有传播生态中各个主体形成合力,才能够打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指向的传播内容。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研究

为了实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国内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实现路径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彰显了一定的时代性、综合性和科学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制度化路径”。将“制度化路径”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路径具有制度保障价值、制度载体价值、制度环节价值、制度工具性价值以及制度长效机制价值。因此,把价值观同政策制度导向有机结合,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措施。袁银传等人进一步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从的理论原则。唯有实现“社会思想意识引领”“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人民群众利益获得保障”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才能构建良性循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媒介化路径”。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载体愈加丰富,媒介背景不断变换,不同视角与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日渐丰富。除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文艺作品、广告、音乐、网络传播以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及时性、信息性、共享性、虚拟性、碎片化、个性化等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理应将“新媒体”“自媒体”“微媒体”等纳入既有媒介选择之中,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自身传播优势。^{③④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生活化路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就是“找到核心价值观与生活的契合点,做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过程中能够贴近生活世界,影响生活方式,引领生活观念”^⑥。“生活化路径”是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必由之路,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有利于我国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具体实现途径包括:

①苏勇:《核心价值观传播应在“精准”上多下功夫》,《人民论坛》2017年第26期。

②袁银传、田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10期。

③王金磊:《借力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几点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1期。

④李勇:《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建构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5年第2期。

⑤安娜、林建成:《新媒体条件下社会思潮传播的特征及其引领》,《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⑥李辉、任美慧:《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生活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理论内涵的凝练与深化、实施过程的完善与精进、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创设与优化、培育目标和内容的改革与创新。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研究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的研究,即是对传播效果的理性审思与检验。那么,评价传播有效性的标准是什么?从标准来看,传播过程存在哪些无效或低效行为?影响有效传播行为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是围绕该研究问题的子问题,对于未来进一步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工作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从文献统计情况来看,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的相关标准。有效性直接指向组织目标的实现水平。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目标界定,学界形成了统一共识,即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否成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并内化、践行和固化。但是学者们对于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提出的具体维度并不相同。朱琳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认知层面效果、态度层面效果以及社会行为落实效果。^① 邓建平运用传播学原理,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出了两个维度:受众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和社会道德环境的优化。^② 可见,无论对维度进行区分,其终极指向都会落实到社会行为层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无效或低效行为。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提出至今,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不得不承认依然存在种种现实困境,有待深入思考与解决。毕红梅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实践与接受应然存在差距,传播路径与受众需求存在错位,社会环境的多元多变造成价值观认同干扰。^③ 赵圣熠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内涵误读、言行不一和制度保障不完善。^④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的无效与低效行为存在于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层级以及不同场域,具有交叉性和多维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影响因素。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传播的构成要素、系统机能、传播环境等方面着手。传播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技巧与传播对象。邓建平认为影响价值观传播有效性的因素不仅在于传播构成要素投入是否合理,更在于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的系统机能是否有效。^⑤ 此外,社会环境对于传播受众的心理环境会产生正负向影响,部分学者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对于影响因素的全面分析有利于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症下药可以探寻解决问题的良策。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机制研究

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内在核心环节,一切传播路径的选择与应用规律都将通过其内在机制发挥效能。作为规律性认识成果,机制将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各个环节与层级的运作。

网络传播机制。综上所述者的相关研究可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机制主要涉及机制构成、机制运行方式以及机制运行环境等方面。郑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媒

①朱琳、张力、梁正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及有效传播策略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1期。

②邓建平:《运用传播学原理探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3、14期。

③毕红梅、李婉玉:《受众理论视阈下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的有效性》,《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④赵圣熠:《如何提升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人民论坛》2018年第27期。

⑤邓建平:《运用传播学原理探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3、14期。

体的有效传播机制主要涵括“选择—控制—反馈”“引导—协调—整合”“渗透—扩散—教育”及“大众参与”四个机制。^①各个机制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耦合的立体基阵,将有效促进“网络+”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价值认同机制。针对价值观传播形式化、脱离实际、形式单一、环境复杂等问题,一些学者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有效机制。陆树程等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利益调节、自律转化、制度制衡、榜样示范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制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双向互动机制”^②。胡春阳针对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建构提出,在实践中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三个维度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内化。^③周宏、付安玲等提出从科学传播机制、引导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实践转化机制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制。^{④⑤}以上各机制构成了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有机整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国内与国际传播的“有效机制群”。

国际传播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直接影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水平和效果。综上学者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传播中的内涵凝练,使传播内容与世界文化形成价值共享的同时要兼顾不同传播受众群体的国别文化特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认同与国际理解。其次,国际传播要注重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打造政府主导和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传播机制。参与主体包括民间文化交流与官方外交、国际组织和平台对话等。另外,注重国际传播专业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机制,积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专业化人才。最后,严格执行过程管理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工作有效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受众群体研究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受众群体来看,主要包括国内受众和国际受众两大类。其中学界对国内受众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而对国际受众的细化分类则较少涉及。

从国内受众的年龄结构来看,主要涵括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小学学生群体以及少儿群体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是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深层诉求,更是永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特色的战略要求。因此,从文献统计情况来看,针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价值观教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且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挑战、教育原则、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机制等几个方面。首先,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全球一体化、网络互联化的发展,大学生群体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冲击以及传统文化缺失带来的认知障碍。其次,从教育原则来看,价值观教育要科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立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内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精神,遵循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⑥另外,从教育方法来看,余双好提出了以文化人的几种方法:通识教育法、价值澄清法、价值附载法、价值反省法以及隐性课程法。金伟等从“疏”和“导”两个方面对众多学者

①郑洁:《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制探析》,《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

②陆树程、杨倩:《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8期。

③胡春阳:《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④周宏:《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制建设》,《理论导刊》2014年第4期。

⑤付安玲、张耀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实现路径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年第1期。

⑥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207页。

的方法建议进行了归纳。^①最后,从教育机制来看,可操作性的教育机制要建立在常态化、长效化基础之上。学者们提出了协同机制、有效融入机制、长效机制等,从而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运转有序的高校价值观教育新局面。

从国内受众的地区分布来看,部分研究专门针对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展开。根据文献统计情况来看,区域性研究主要聚焦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文化多样性显著、教育资源匮乏。因此,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要积极回应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受教育方式的诉求,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少数民族地区受众的深度融合。例如,粟迎春提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要发挥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结合“新疆精神”来提升主体价值意识及理性精神,在民众的广泛参与中实现价值观内化。^②刘华荣认为在西北民族地区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借助西北民族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花儿”,充分挖掘并利用“花儿”蕴含的思想道德价值和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特点,最终实现西北民族地区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与内化。^③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明晰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遵循,对于未来进一步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从文献统计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相关研究虽然整体向好,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改进。首先,研究质量有待提高。很多研究观点在不谋而合的同时,也表现出研究中存在观点陈旧且过度重复的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明显缺乏创新性突破。其次,研究方法亟需丰富。通过文献分析,大多数研究采用理论阐释的方法,可谓“坐而论道有余,实证研究不足”。未来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系列研究可以着重于模型建构、实证调查、学科交叉几个方面。最后,综合拉斯韦尔的单向传播“5W模式”^④以及赖利夫妇提出的传播社会系统模式^⑤来看,传播不仅要关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还应关注传播系统的内部机制、运行环境以及制约因素等诸多方面。目前,研究对于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讨最为热烈,尤其是对于如何运用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进行价值观培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略显薄弱。笔者期望本部分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文献评析可以对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改进与提升的目标导向。

五、结语

通过对2007年至2019年CNKI数据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领域的文献研究成果进行筛选,我们得到2,394篇有效文献,并以此作为数据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文献年度变化趋势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现出先升

①余双好:《以文化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培育的方法研究》,金伟、王东:《思想疏导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运用》,《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

②粟迎春:《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③刘华荣:《“花儿”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④[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⑤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6-134页。

后稳的趋势。2007—2012年属于萌芽期,从2013年开始发文量出现大幅度增长,2014—2019年属于先快速增长后趋于高频稳定的时期。

第二,从文献期刊分布看,《新闻战线》刊文量最多。

第三,从发文机构角度看,研究的主力军是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类高等院校。

第四,从文献作者及其合作情况看,虽然有刘艳萍、陈佳、李延生、马娟和张文明等发文量较多的作者,但尚未形成具有一定科研说服力的核心作者群,合作情况也不甚乐观,有待继续加强。

第五,从研究热点情况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是依据频次顺次排列的关键节点。

以上是本文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对一定阶段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成果做出的理据性总结,限于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文献选取的合理性无法计量,统计结果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应该不会完全消解本文文献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Analysi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2007—2019)

——Based on Bibliometrics

Jin Xiaoy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Based on CNKI database, this paper uses Bibliometrics method to screen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on CSSCI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from 2007 to 2019, including the law of literature growth,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highly cited authors, research hotspots, etc. It is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China shows a trend of rising first and then stabilizing. Although the overall volume of publications is large, a core group of authors with certain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uasiveness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and the cooperation is not very optimistic. At present, there has been formed a hot research circ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dissemination”, “universities”,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nd “practice”. Now, the focus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clude: content, paths, effectiveness, mechanism and audience.

Key words: view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literature growth;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author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hotspot

责任编辑:徐道春

跨文化传播的中外认知方式调适与对接*

陈忠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澳门,999078)

摘要: 中国文化与外交政策的跨文化传播,能否被其他国家的受众正确解读,取决于中外认知方式之间能否成功地转换对接。中国式认知方式基于“天人合一、主客和合”的价值取向,突出“客体中心、背衬优先”。源于古希腊“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的欧美思想的“主客对立”价值取向,则强调“自我中心、目标优先”。中西价值取向塑造的不同认知方式深刻影响着各自文化表征的各个领域,导致民族心理、叙事方式、翻译解读等一系列跨文化差异,给两种语言的沟通 and 理解带来各种各样的障碍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并科学地应对跨文化认知方式的差异带来的挑战,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中外认知方式对接,避免跨文化误解。

关键词: 中国式认知方式;客体中心;自我中心;文化调适与对接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1)01-0147-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1.015

一、汉英翻译中的跨文化认知方式误解

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实现交际意图,除了受到文化禁忌、宗教及民俗规约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民族文化的认知方式。由于以往对其认识不足,导致外交策略翻译不准确,往往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某些重大外交策略产生意想不到的跨文化误解,引发外交误判与危机。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秉持相互尊重的精神,就能够预防跨文化误解。然而,有一类深刻影响我们民族心理的文化差异,因其难以察觉,长期以来都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因而导致以往的跨文化翻译传播屡走弯路,译文多次进行修改调适。造成这种跨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式认知方式和欧美认知方式的差异。

不同文化群体的认知方式有异有同。相同的概念,在不同文化群体那里,会由于各自不同的认知方式而带来不同的解读。例如,汉语“向后翻3页”,英文却是 turn forward three pages(向前翻3页);汉语“剩余车位”,对应的英语是“available parking space(可用车位)”;汉语“9折”在英语中不是90%,而是“10% off”。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语言中还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表达。例如汉语的“合资企业”,英语是“joint-venture corporation(风险共同承担企业)”。此类较为中性的认知方式,在跨文化交际中,即使发生误解,一般只是局限于个体或企业之间的商务纠纷,不至于引发严重的外交后果。而下面的案例,则不但会引发外交误解,而且会带来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的不同政治化解读,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致力于共同合作、互利多赢,而个别南亚国家却将早期版本的英译“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解读为两条陆、海线路对其形成所谓“战略包围”。实际上,“一

* 收稿日期:2020-11-18

作者简介:陈忠(1964—),男,山东海阳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带一路”中的两个“一”仅为协调音节,若删掉“一”之后,“带路”变为动词,含义完全背离“一带一路”原意。然而,如果保留“一”,直译到其他语言就会给跨文化认知留下偏离原意而曲解的空间。为此,2016年以来,“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一律删除了“一”字,改成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并且将早期“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中的 Strategy 改成较为中性的 Initiative(倡议),因为 Strategy 跟“一带一路”组合,很容易被理解成为一种政治战略,容易给“战略包围”的联想提供想象空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主张放弃原则一味迎合对方,而是通过调适,避免跨文化语境中的误解,减少被曲解的空间。采取更加策略的跨文化调适,能够降低误读,增加合作共赢的机会,真正达到跨文化沟通的目的。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被跨文化受众解读之前,中国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任何倡议、政策等信息,用英文或任何文字形式传递的信息,能否以我们期待的方式被正确解读,能否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沟通效果,都存在跨文化解读的变数,而最需要关注的变数,是来自跨文化接收者的认知方式与中国式认知方式之间的转换对接。尤其是涉及比较敏感的话题,由于认知方式的差异,可能给跨文化理解沟通造成潜在的认知障碍,往往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恰切的文化调适,可以选择对方容易接受的叙事方式准确传递中国的真实意图和目标,避免带来跨文化误解。

以往中国有些国家政策和倡议的英文翻译,往往经历数次修改才逐渐切合其目标和意图。这个切合其目标和意图的修改过程,表面看似只是对某些词语作出调整,实际上大部分是根源于跨文化差异而作出的不同文化之间认知方式的转换、调适与对接。要做好跨文化沟通,需要知己知彼,而知彼的前提,首先要了解中国式认知方式。

二、文化价值取向塑造的汉、英认知方式

一个文化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占优势地位的认知方式,可称为“认知定势”。认知定势影响着社会个体和文化群体看问题的方式、视角以及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

中国文化有一条贯穿文化表征各个领域的主线,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①而这一思想在认知方式上体现为“客体导向、背衬优先”的认知定势,渗透于中国哲学、语言、叙事方式、戏剧、小说、园林、绘画等各个领域,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乃至认知方式的基调。^②其典型代表体现于中国人将姓前置于名的组合顺序之中。

“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是强调自我与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自我与客体彼此融合渗透。在人际关系中崇尚主客和谐,通过降低自我抬举对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绘画理念中体现为散点透视;在园林设计中体现为顺应自然、随物赋形;在叙事方式中体现为立足来源展开叙事。

发端于古希腊文明的欧美文化,强调人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哲学乃至欧美哲学思想。Stephen Levinson 认为,印欧语的“自我中心”认知方式不仅主宰着空间认知,而且延伸至其他领域。^③总之,主体目标优先于客体的哲学思想贯穿于欧洲文化中的绘画、叙事方式、戏剧、小说、语言规则、园林设计等各个领域,形成

①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②陈忠:《中国式认知方式的文化表征与跨文化教学》,《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3期。

③Stephen, L.C.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of Diversity of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27.

欧洲传统的主体目标优先型认知方式。其典型代表体现于欧美人将姓后置于名的组合顺序中。

印欧语言可以归纳为“自我中心、目标优先”,简称“目标优先”。目标优先认知定势的典型特征是,立足于主体目标构建文化表征、思想理念。突出目标,是贯穿于文化表征、思想理念、语言规则、行为方式、器物设计、绘画原理、叙事方式的基本原则。

“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思想的本质,是突出自我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对立关系中将自我凌驾于客体之上。在人际关系中崇尚基于自我中心的契约精神;在绘画理念中体现为焦点透视,突出观察者的视角;在园林设计中体现为人工痕迹,以几何形状设计园林布局;在叙事方式中体现为立足目标展开叙事。

我们将上述中西文化思想的差异称之为文化价值取向差异。正是文化价值取向差异,塑造了基于客体中心的背衬优先型中国式认知方式,以及基于自我中心的目标优先型欧美认知方式,影响着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叙事方式和审美习惯。中西文化表征方式如果得不到调适与对接,在对外翻译中就会导致外语译文出现貌合神离、词不达意的翻译现象。

三 “背衬优先”与“目标优先”认知定势的中西文化表征差异

(一) “背衬优先”与“目标优先”在中西民族心理上的差异

认知定势影响到我们认知世界和人生的方式。背衬优先认知定势优先关注来源,侧重了解客观对象从哪里来,表现在社会人文领域,则更看重祖先及今生今世,对来世的思考和关注,则远不及对祖先和今世的关注多。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告诫其弟子:“未知生,焉知死?”观察评价一个人,也是基于其过往的行为表现和由来。在《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中国自有史以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把祭祀先祖看作头等大事。这种文化所塑造的认知方式倾向于通过过往和祖先的成就来评价当今的某种创新成果。譬如,数十年前,中国的民间药方广告用语推崇“祖传秘方”,或者将某种药物典籍以祖先的名字命名,如《黄帝内经》。这一认知定势甚至也影响到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思路。屠呦呦在研发青蒿素的早期,首先将目光投向中国医药典籍,并受到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篇》的启发,提炼出救治数百万人生命的青蒿素。这些案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侧重来源。

“背衬优先”认知定势作为中国文化表征的总体认知方式,渗透进民族心理、叙事方式和审美情趣之中,制约着中国式叙事方式。具体而言,中国式叙事方式倾向于通过来源背景看待一个人或事物,在时间上体现为立足于过往和当下展开认知。

基于“背衬优先”的中国式叙事方式,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面临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转换对接有效性的考验和挑战。

中国传统小说大多按照时间顺序,从故事的背景开始依次展开,推进故事情节。中国电影的叙事方式很少采用西方电影那么多倒叙手法展开故事情节。中国观众习惯于将叙事从故事的背景开始顺时推进故事情节,不太习惯前景先于背景的时空穿插叙事方式。中国的科幻和穿越影片绝大多数取材于历史,穿越到古代的内容远多于有关未来的内容。相比之下,欧美有关未来的科幻片比例远高于中国。

“背衬优先”认知定势贯穿于中国人对人物介绍的方式及信息选择。我们在介绍陌生人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关注他来自什么地方,选择介绍其籍贯和家世背景。这也是中国小说、戏剧人物

出场时所惯常使用的手法。面对陌生人,“从哪里来”是中国受众最为关注的信息。西方小说、戏剧、影视往往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引出人物出场,当然也有介绍人物籍贯、家世背景的,但没有传统的中国小说、戏剧对此手法模式使用那么普遍。

中国影视以及文学、曲艺要提高其在国外的流行程度,一方面要意识到剧本、导演、演员、故事情节设计、叙事方式等每个艺术环节都建立在中国式认知方式和民族心理基础之上,提升跨文化敏感度;另一方面,还要充分了解和体会国外受众自身文化的认知方式和民族心理,知己知彼,巧妙调适,才能确保中外文化艺术认知方式取得良好的对接效果。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认知方式的跨文化汉英翻译转换与文化自主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概念提出后,其英文译法曾经历几次修改。最初有人将“命运”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destiny”,后来改译为“future”。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从“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改为“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改动最大的,是将“destiny”改为“future”。其背后的理据在于,“命运”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前缘注定的“命”;一个是未来的“运”。这两个方面,一个指向前缘——背衬,另一个指向未来——目标。

中国文化的背衬优先型认知定势优先关注来源和当下,立足于以往的命数看待未来的机运;而欧美文化的认知定势则是目标优先,立足于未来(future)的机运看待命数。这两种认知定势引导汉语和英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认知导向明显不同:汉语将“destiny”置于前台;英语将“future”置于前台。在跨文化翻译中如果不进行转换,会导致翻译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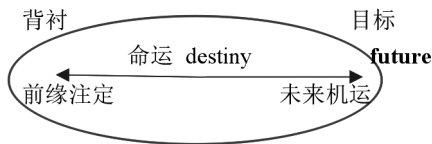


图1 “命运”和“destiny”及“future”的关系

如果撇开不同文化认知方式的偏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意是倡导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将最初英译中的“destiny”替换为“future”,更符合欧美“目标优先”认知定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方式,实际上是考虑到跨文化认知方式的差异,为更方便于贴近国外受众的理解,从汉语的背衬来源型认知方式转换为目标型认知方式。因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中,原来的“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改为“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是跨文化传播遵循跨文化认知方式内在规律而进行转换的结果。

这个案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汉语和英语的认知方式差异在众多文化表征领域都有表现。例如,英语的“30% off”对应于汉语的“七折”,也是遵循着同样的原理。英语立足于获利率这个商品交换的目标来理解和界定折扣,同一个概念汉语立足于成本率的背衬来理解和界定折扣,反映出欧美文化“目标优先”型认知定势与“中国式背衬优先”认知方式之间的差异。再如,中文的停车场门口显示的车位信息,常见的是“剩余车位”,而英语提示信息则是“available parking space”(可用车位),这仍然是由“背衬优先型”与“目标优先型”的认知方式差异带来的两种看待车位存留信息的认知视角差异。

尽管汉英认知方式存在差异,但在汉英翻译中,并不一定完全舍弃汉语的认知方式,那些享誉世界的历史典故,具备一般历史知识的国外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完全可以保留中国式认知方

式,做到以我为主,兼顾外语。譬如,“一带一路”本来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跨国经济合作发展倡议,在中国式“背衬优先型”认知方式的引导下,汉语借用两千年前欧亚大陆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享誉世界的历史典故来对其命名。一个指向未来的倡导合作共赢的公共产品,不但让世人重温千百年前亚欧跨国合作与交流的那段辉煌历史,而且再次将目光投向未来全球合作共赢的美好前景,从而向世界昭示,中国不但能够在千百年前向世界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而且将继续扩大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一带一路”尽管突出背衬倾向,但世界上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精英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内涵。因此,尽管极少数国家对“一带一路”提出异议,本着善意,“一带一路”的英文表述作出技术性微调后,仍然保留“带”(Belt)和“路”(Road)的基本框架。因为丝绸之路作为世界历史上亚欧文明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历史背景知识为突出背衬来源的中国式叙事方式获得绝大多数世界受众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正确解读的基础。与此类似,中国人喜欢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表达国家发展目标,不少西方学者也都注意到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方式。

以上案例说明,中国式“背衬优先型”认知方式与英文背后的“目标优先型”认知方式虽然存在差异,但只要不影响到对方的理解,不一定一味迁就对方而失去自我。只有在跨文化受众难以准确理解的情况下,才需要作出文化调适,避免那些与目标语言差异较大的中国式认知方式外译出现貌合神离的译文。不但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很有必要尽可能突出中国式认知方式。

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群体的语言和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一方面需要尊重不同文化,另一方面还要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文化自信。在兼顾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应最大程度地维护本民族文化话语权的自主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意识逐渐觉醒,跨文化翻译中的话语权自主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学术交流中那些原产于中国、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专用术语,是使用汉语拼音,还是使用外文?是采用中国式或贴近中国式认知方式和文化背景来表征,还是采用基于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英式认知方式表征?这是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策略需要认真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近二百年来,西学东渐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流倾向。西方标准、西方术语长期主导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翻译和学术交流。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外对中国文化、科技、教育的关注度也随之提升,观察视角也更趋平视,彼此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方式必将越来越平等,对中国的期待也更高,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也越来越专业、细致。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如果用外语来翻译,必然在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转换中丧失一部分原汁原味的中国内涵和元素,好比用洋瓶子装茅台酒,用筷子吃西餐,更准确地说好比用国际象棋的棋盘来下围棋或中国象棋,扞格不通。有些中文概念在其他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相对应的文化基础。例如,“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以及“君子”“汉服”“酱香型白酒”“浓香型白酒”“太极拳”“秧歌”“昆曲”“京剧”“少林”“功夫”“围棋”“麻将”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术语,如果用汉语以外的语言来翻译,难以确保蕴藏于这些概念术语深处的那些文化蕴含能准确地传递到跨文化受众的认知方式中而不荒腔走板。假如采用外语来翻译这些术语,受到其母语的影响,跨文化受众必然或多或少地根据其自身文化和认知方式来建立和“加工”这些中国特色的概念,既不利于外国人准确理解其内涵,也不利于专业性的学术交流。

从跨文化认知方式转换的角度看,语言之间的翻译涉及两种基本模式: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法和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法。归化翻译法将源语本土化,尽量迁就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

景和知识储备、审美特点,采取其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归化翻译法的优点是有助于读者以自身熟悉的民族文化来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但是其代价是明显的,照顾读者自身的民族文化和知识背景,必然丧失原作品独有的文化价值取向和韵味,容易让读者滋生自我文化中心倾向。

异化翻译法尽可能不改变原作品所植根的民族文化土壤中独有的蕴涵和系统价值取向,引导读者向作者及其民族文化系统靠拢。在翻译上迁就原作文化及其语言特点,译者向作者靠拢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异化翻译法一方面保留了源作品的民族文化意蕴,同时也体现出文化上的平等对话原则,这就对翻译的技巧提出了挑战。一些兼顾目标文化和源文化的“归化-异化”创新性翻译,既有助于读者理解异域文化,又不失源文化的意蕴特征,成为翻译界的创新佳话。例如,中国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一部分西方媒体使用英文来表述中国宇航员,而还有一部分媒体则截取了“太空人”的汉语拼音的前半部分 taiko 与英文宇航员单词 astronaut 后半部分-naut 组合,创造出了一个专门用以指称中国宇航员的新词语: taikonaut,并且很快就在国际媒体流行开来。这看似仅仅是一个语言创新的现象,其背后却分明折射出西方媒体对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一种变相认可。

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全球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在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中不知不觉地塑造出一种固化的外语本位心理定势。表现在汉外翻译策略中,一些中国人在许多跨文化交际场合,习惯性地使用数百年前的外语术语来翻译那些内涵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例如,“普通话”是汉民族通用语的标准名称,而英语中的 Mandarin 是数百年前欧美用西方语言指称明清官话的术语,二者的内涵和标准都不完全相同。然而,大部分中国人在内地召开的国际会议或学术论文中仍然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一外来的术语来指称本族语、本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常见概念。如果是懂中文的非语言学的国外交际者,用他们已经习惯的沿用多年的词语 Mandarin 来理解中国的“普通话”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分场合在我们自己的出版物以及语言学专业会议中,放弃自己的标准而采用 Mandarin Chinese 来写文章、作学术报告,就是主动放弃本民族的学术标准和话语权。Mandarin Chinese 跟“普通话”之间,无论是历史文化背景,还是其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差异巨大。把一个数百年前在外国使用的词语,代替中国现在使用的内涵外延重新标准化的词语,这本身就是无视现实,剥夺了国外读者准确地了解当今中国国情的需求,于己于人都是弊大于利。

在跨文化翻译中,归化翻译要求在翻译时尽可能贴近目的语的文化来翻译原作品,不惜牺牲原作品的原始深层涵义和文化风格。异化翻译则尽量保存原文的文化价值土壤,尽可能向作品原汁原味的语言文化底蕴靠近。例如,儒家文化的“君子”“小人”,道家思想的“道”,英文翻译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没有哪一种能够传神地传递中国本土的“君子”“小人”“道”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坐标系的内涵价值。因此,对于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甚至有所研究的外国读者来说,最贴切的翻译,就是用拼音音译保留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否则,就是风干了的腊肉和鱼干,丧失掉一大部分本来的文化内涵和韵味,甚至有可能被其他文化所同化而变了味。

姓和名的这种语序并非孤立无序的自由排列,而是与该语言的认知定势保持一致。例如,东亚国家跟中国一样,采用姓氏先于名字的表征方式,跟欧美姓名表征方式相反。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浪潮猛烈冲击东亚维系了数千年的文化秩序,影响所及,甚至连姓和名的排列顺序都在跨文化交际中放弃姓前置于名的文化传统,采用西方的名前置于姓的顺序。在文化交流的早期,

欧美文化对中国文化形成绝对的主导地位,彼时大部分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喜欢模仿欧美的“名-姓”模式来显示自己的中文姓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民族文化自主意识也逐渐提升,一部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人,开始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自身文化的表征模式显示自己的姓名。

2020年,美国奥克兰兰尼大学一名教授要求一名亚裔学生 Phuc Bui 改名,理由是她的名字用英文读音“不雅”。他的“歧视性”要求被拒,这名教授因涉种族歧视被停职。这个事件的背后,也折射出一个现实,姓名的呈现方式也体现出民族及个人尊严和文化认同。

在外交场合,不但姓名的呈现方式能够体现国家和民族尊严,采用本族语言还是外语来讲话,更是代表着发言者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的外交地位和尊严。

我们主张突出翻译的文化主体意识,并非不讲条件地一概排斥跨文化转换对接调适策略,而是对于不同性质的译文采取相应的策略,兼顾主体意识和跨文化对接。那些跟民族特色有关的词语,例如“太空人”,以及中国文化特征浓厚的学术概念如“普通话”,就应当在翻译中偏重和突出中国特征;那些需要突出国际化、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概念,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可以加大跨文化转换与对接的权重。

四、中西认知定势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跨文化解读

中国式认知定势与欧美认知定势的差异,不但体现为组织表征策略的差异,而且体现于语言符号解读方式的差异。同一个语言表述,受到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塑造的认知定势的影响,加之受到国家关系和国际环境发展变迁的影响,可能带来解读上的偏差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误解。

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会带来一种文化体系对于自我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具体而言,对于同一个表述,例如“韬光养晦”,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解读会有差异。因为中国式文化价值取向在人际关系中更加突出自我收敛、低调行事、顾及对方的感受,以自我克制和低调谦和换取有利于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生存环境。而欧美人立足于自我中心的角度,其主客对立的价值取向,使其更倾向于将“韬光养晦”的动机解读为藏而不露的所谓“战略阴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基于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这一外交理念在中国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并未引发多少关注或质疑。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历史性跃迁,一些西方学者从中国“崩溃论”逐渐转向“威胁论”,对“韬光养晦”一词的解读也背离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初衷。其中的原因,有跨文化翻译不当的因素,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则反映出汉英认知方式及其背后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使得外交政策的表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递和解读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跨文化误读。

“韬光”指“敛藏自己的光芒才华”;“养晦”指处在相对不显眼的位置。韬光养晦的意思是通过自我收敛的谦和低调,换取有利于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生存环境。它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具有中国式价值取向的美德。由于文化的差异,一些翻译将低调、收敛的目的,解释为“等待时机”,却忽略了其致力于通过谦和、低调换取有利于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生存环境的目标,导致西方人在解读“韬光养晦”一词时对其动机目标产生“阴谋论”的猜想。

中国式认知方式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突出背衬,淡化自我。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推崇谦让、低调,礼让优先,通过抬高对方、降低身段体现对于对方的尊重,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在语言当中表现为汉语中存在大量

的谦称和尊称,例如:免贵、拙作、贵姓、贵校、大作;宴请和招待客人,会谦称饭菜不够鲜美;赠送礼物,谦称薄礼不成敬意,等等。在行为方式上推崇行事低调、谦让,以取得人际关系和谐相处。其目的首先是追求和谐共处,这就是“韬光养晦”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来源。换言之,“韬光养晦”无论是个人修养还是外交政策,都强调在与他人或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保持低调,克制自身言行,通过谦让赢得和谐共处的人际或国际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是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一种人生美德和哲学理念,也是中国历来秉持的基本外交理念。这种低调与自我克制的理念,与道家哲学倡导的“上善若水”以及儒家推崇的“克己复礼”的价值取向可谓一脉相承。

“上善若水”的人生哲学是老子哲学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善的最高境界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低洼之处,所以水的品行最接近于“道”。“克己复礼”也同样通过克制自我而成全整体秩序和利益。

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上善若水”“克己复礼”,都推崇谦和礼让、和谐共处。这一美德在中国传承数千年,产生了无数历史典故和传说。除了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故事,还有著名的“六尺巷”美谈。传说古代一位大学士的府邸与另一高官的府邸相邻,两家为建房用地发生纠纷,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难以定夺。大学士家人修书请求出手相助,大学士回书:

千里家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得诗,立即拆让三尺。对方深为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留下了“六尺巷”的美谈。

然而,源于古希腊“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的欧美思想,突出“自我中心、自我优先”,强调主客对立,这种认知定势熏陶下的西方人,难以理解“韬光养晦”所植根的文化背景——“主客和合、和谐共处”哲学思想的目标是以谦和的行事方式换取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有利生存环境。立足于“自我中心、自我优先、主客对立”的文化理念,对于“韬光养晦”的解读,往往忽视通过自我约束收敛而换取和谐共处的目标,而片面夸大所谓“不外露”的一面,加上中国国力的快速上升,很容易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西方人向“阴谋论”的方向解读,最终滑向“中国威胁论”的误区。

国外有一些英文文献将“韬光养晦”译为“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隐藏能力、假装弱小);“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隐藏真实目的)。还有一些英文翻译是“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隐藏野心、收起爪子)。一些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的学者,竟然将“韬光养晦”与复仇色彩浓厚的“卧薪尝胆”典故相提并论。

对“韬光养晦”的含义和动机片面“解读”,会扭曲这一成语的文化内涵。换言之,中国式文化价值取向塑造的中国式认知方式背衬优先,在“韬光养晦”中只显示出低调“韬晦”的方式姿态,却未明确其目标,而西方文化“目标优先”的认知定势促使西方解读按照自我中心价值取向来补充、发挥“韬光养晦”未予明示的目标。“韬光养晦”建立在中国式“主客和合”的价值取向基础上,强调低调谦和,和平共处,不搞对抗,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韬光养晦”外交方针的出发点不是所谓“待机而动”,而是强调自我约束、和谐共处,推动世界友好合作、和平共赢。任何其他的解读,不管是来自中国还是国际,都是脱离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即便是中国的某些学者,也未必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深入了解。

一些中国学者或许对中国传统文化“主客和合”价值取向缺乏了解,对“韬光养晦”的翻译片

面夸大“等待时机”的引申义,却没有根据“主客和合”价值取向补充出其目标是致力于“以谦和的行事方式换取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有利生存环境”,导致西方受众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了解而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误读。一些典籍将“韬光养晦”解释为“一种为人的策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所对应的英文表述是“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这种解读,不仅夸大了所谓“等待合适的机会”的含义,而且没有明确指出其目的是致力于“以谦和的行事方式换取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有利生存环境”的“主客和合”文化内涵。西方解读者在目标优先认知方式的驱动下,对“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动机的认知因为在翻译中缺席,而被解读为“阴谋”。

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韬光养晦”的内涵。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在2008年的著作《后美国的世界》中,对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表述也引用了“韬光养晦”,他的英文翻译是“hiding its light”。这一译法源自《圣经》中的一段话:“Neither do men light a candle, and put it under a bushel, but on a candlestick; and it giveth light unto all that are in the house.”(注:giveth为古体英语,与give语义相同)中文可译为“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后人将上述典故引申为谚语“hide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意指不露锋芒,低调行事。即便如此,借用西方文化中众所周知的典故按西方认知方式翻译中国成语,必须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和认知方式的转换,所借用的西方典故能否准确诠释中国典籍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研究。总之,只有设法将“韬光养晦”含义中“keep a low profile”(保持低调)的目的是营造和谐共处的生存及和平发展环境的信息传达给西方受众,才能不给对方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错误地解读“韬光养晦”的真正内涵留下误读的空间。

以上案例说明,翻译“韬光养晦”这样涉及中国外交思想理念的词语,应将其背后的“主客和合”文化价值取向准确、到位地转换为植根于另一种文化土壤的目标语言,结合目标语言目标优先的认知方式,突出“韬光养晦”追求“以谦和的行事方式赢得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有利生存环境”的文化内涵和目标,实现中外语言、文化价值取向与认知方式的全方位转换对接,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传统文化的了解,维护并进一步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这就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式认知方式及其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

五、“分类调适、主客兼顾”的跨文化调适与对接原则

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一方面带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视角、认知方式的重新调适,同时也要求中国主动应对跨文化对话中中国与国际社会认知方式差异带来的挑战,在跨文化交往中根据认知方式差异的类型和特征重新调整认知方式。只有深入了解自身以及对方认知方式的差异,知己知彼,才能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对接,避免跨文化误解。

针对跨文化传播的复杂程度,以及容易引发误解的程度,中外认知方式转换对接的总体原则是“分类调适、主客兼顾”,主要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类,内涵较为丰富复杂,容易引发跨文化误解的内容,例如“一带一路”“韬光养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翻译,既要确保原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蕴含的丰富历史典故,又要兼顾西方目标优先的认知方式,将汉语背衬优先转换为目标优先,以贴近对方认知方式的翻译保持原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内涵,避免因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留下跨文化误解的空间。

第二类,对于那些不容易引发跨文化误解的翻译对象,例如姓名、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浓厚的学术典籍概念术语,尽量采用原汁原味的中国式认知方式进行翻译,以便最大程度确保民族尊严并确立学术标准话语权。

总之,在跨文化语境中根据原作的内涵、传播目标以及受众的文化特征和认知方式的差异,采取恰切的调适方式作出准确的翻译,一方面要确保对方准确理解中国语言文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还要保持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深度认知。这就涉及民族心理、文化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外交政策等多个领域综合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探索。从这个角度看,跨文化认知方式转换对接的理论探索和传播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ccommodation and Interface of Cognitive Pattern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en Zhong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Abstract: Whether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ies is understood correctly by foreign audience depends on whether Chinese and targeted country's cognitive patterns can be interfaced with each other. Chinese cognitive pattern, based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Oneness of Man and Nature" and "subject-object harmony", highlights the "object-oriented ground-preference" principle, while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value orientation of "subject-object opposition" originated in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of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emphasizes "ego-centered target-preference".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patterns shap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value orientations affect profoundly every field of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presentation, leading to a series of cross-cultural diversity in national psychology, narration styles and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d bringing about unexpected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languages. This new situation requires us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meet scientifically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ifferences of cross-cultural patterns, and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interface of cognitive pattern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avoid cross-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ognitive pattern; object-centered; ego-centered;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interface

责任编辑:孙昕光

空山新雨後
 清氣滿林樾
 明月松間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
 蓮動下漁舟
 野色無塵氣
 山光淨綠流
 但使願無違
 何須問田園

王维诗

张

山居秋暝(王维)

张家祥书

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6卷 第1期(总第294期)
1956年创刊(双月刊)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 办 山东大学
 编辑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济南文化东路88号 邮编 250014)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山东金邮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Vol.66 No.1(Serial No.294)
Since 1956 (Bimonthly)

Institution in Charge: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Wenhua Road, Jinan 250014,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782, Beijing, China)
 Printer: Shandong Jinyou Printing Co., Ltd.

ISSN 1001-5973



9 771001 597219

电话 (0531)86180064

网址 www.jstu.sdnu.edu.cn

刊号: ISSN 1001-5973
CN 37-1066/C

定价: 15.00元